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劉大中先生伉儷追思錄

續篇

鍾思亮  
  
敬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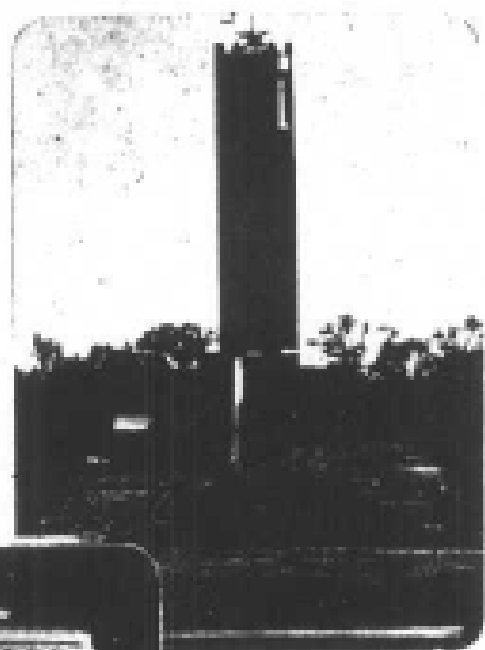


憶海天仙侶	彭歌	四四
劉大中先生的治學方法	費景漢	四六
永懷「國劇華友」劉大中博士	黃漢	五四
劉大中先生與美國票壇	鄒葦澄	五八
桌邊心語	劉咸思	六三
悼劉大中博士、戴亞昭夫人 <small>(調寄臨江仙)</small>	劉象山	八一
劉大中戴亞昭伉儷逝世週年之追憶	蔣碩傑	八二
追思大中先生伉儷	魯傳鼎	九七
輓劉大中先生	鄭彥棻	一〇〇
TA-CHUNG LIU, 1914-1975 . . . J. R. Klein, M. Nerlove, S. C. Tsang . . .		101
<b>特 載</b>		
劉大中先生遺作：遙想公瑾當年		一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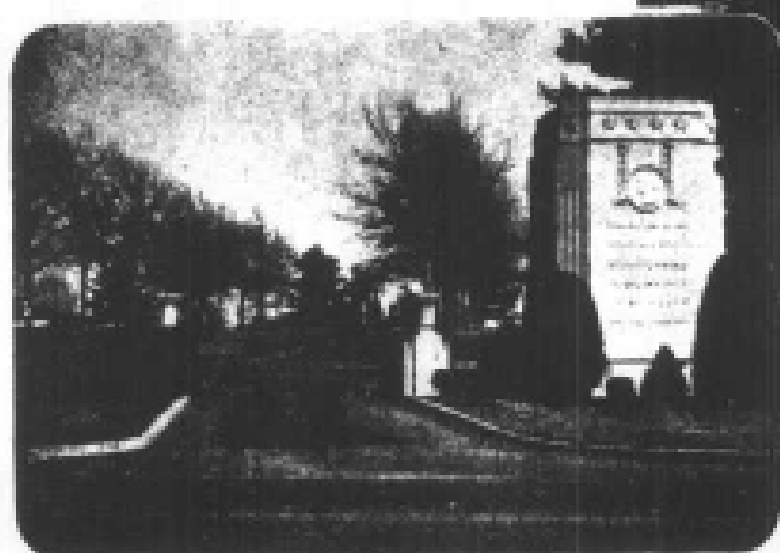
——關於歷史、詩詞、小說和國劇古的周喻



劉大中先生暨夫人戢亞昭女士合葬於美國紐約西州華盛頓紀念公墓 (George Washington Memorial Cemetery, Paramus, New Jersey, U.S.A.)。一代學人，從茲安息；黃泉不昧，默佑中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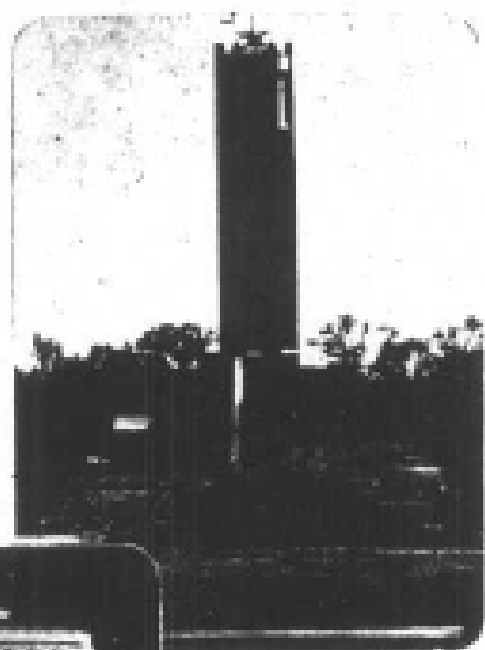


• 華盛頓紀念公墓大門 (右) 及紀念塔 (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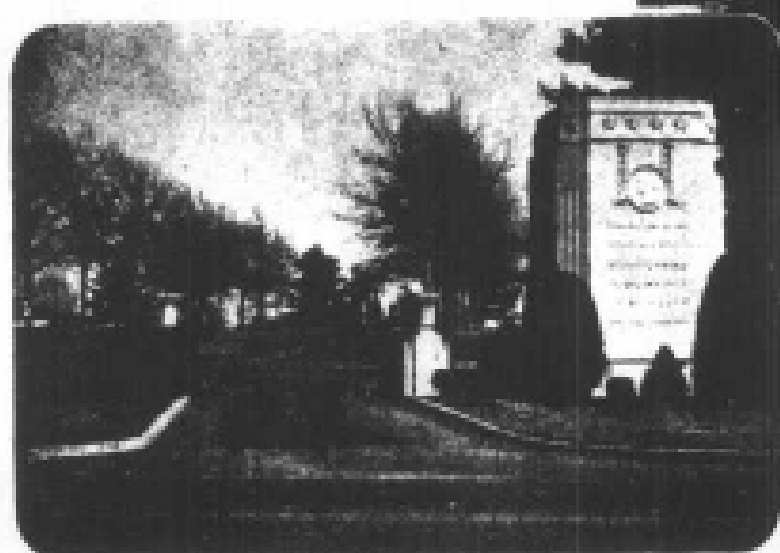




劉大中先生暨夫人戢亞昭女士合葬於美國紐澤西州華盛頓紀念公墓 (George Washington Memorial Cemetery, Paramus, New Jersey, U.S.A.)。一代學人，從茲安息；黃泉不昧，默佑中興。



• 華盛頓紀念公墓大門 (右) 及紀念塔 (上) •





美國康乃爾大學於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下午在校園內泰勒講堂，為劉大中先生伉  
儷舉行追思禮拜，出席者有大中先生生前友好  
、同事及學生百餘人。

劉大中先生伉儷追思錄



- ① 主禮牧師 Rev. D. Gossett
- ② 康大校長 Dr. Carson 夫婦
- ③ W. Galenson 教授夫婦
- ④ 荷蘭保教牧師 Mare Nijlove 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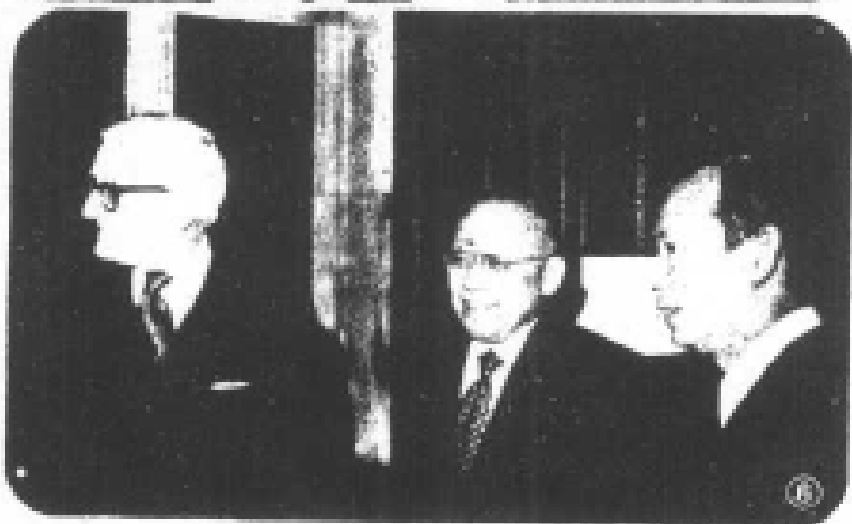
劉大中先生伉儷追思錄



⑤ 右起：駐美沈副駐公使代表張仁寧公使，孫國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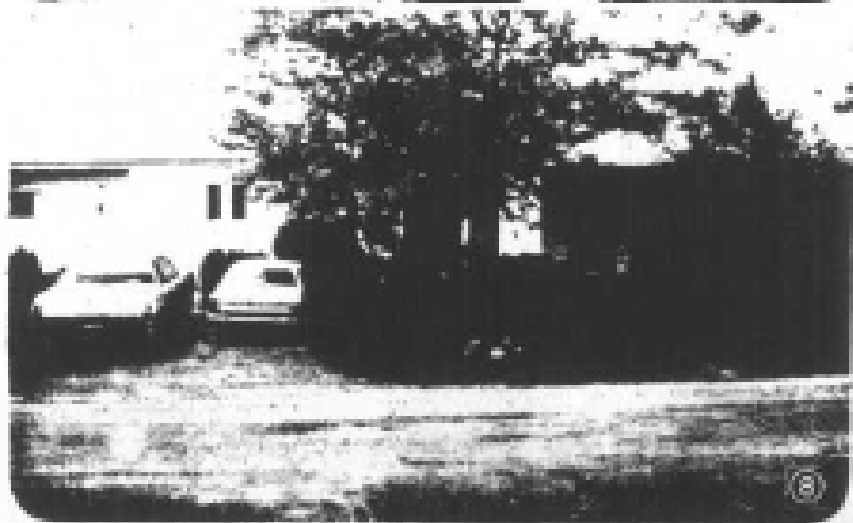
陳逸淵先生

④ 右起：鄭廷芬教授，孫國教授，G. Hildebrand 教授



③ 右起：鄭廷芬教授夫人，劉大中先生長公子壽華，顧慰華教授，沈中甫教授

② 劉大中先生葬墓 (624, Cayuga Heights Road, Ithaca, New York, U. S. A.)



# 燈前寄故人

王德箴

為劉大中兄嫂逝世週年而作

大中  
亞昭：

薄暮一場狂雨，炎暑頓消，打開左邊專放書札的抽屜，準備清還信債，燈影下一眼瞥見你倆去夏七月廿七日的來鴻，寫着：

「弟病之治療，並不順利。Chemotherapy因殺白血球過多，而對病無益，故改用 Immunotherapy。因發高燒及打擺子致身體極為衰弱，而於病似仍無補，現在家休養。下週再去照X光。」

「下週再去照X光」，想必現在已照過了，有無見效？我應該寫封信問問。是呀！應該問問。正待拿起筆，一個記憶湧上心頭，啊！你們不是已經去世將一年了嗎？我還向那裏寫信問？我怔了，怔了！兩行清淚不由落了下來。大中！亞昭！你們安息天國，是否還記得我這塵世朋友？在訣別一年後，却對着你們遺留的筆跡而傷感？

記得去年八月十七日聽到你們逝世的消息，外子九如從高雄參觀哭了回來。我去看令姊威思，她泣不成聲。可是我沒陪她哭，不知是感情麻木？還是內心悲痛，欲哭無淚？反正這多少年來，我是酸甜苦辣一齊向肚裏收，只有在風清月白之夜，才讓枕衾承擔我思親懷友的淚痕，我從不在人面前哭，難道這就是我徐州人的個性嗎？

我根本不相信你們真的走了！想到我第一次在立法院認識大中時，你是以賦稅改革委員會主任委



員身份向財政委員會提出報告——你出口成章，侃侃而談，予人以充滿自信而極有擔當的印象；後來看你晚間及週末都去辦公，遇有閑暇，不是和朋友吃小館，就是唱國劇爲樂，覺得你真如生龍活虎一般，誰會相信竟遽爾被癌症奪去生命？還有，亞昭你，是那樣溫文瀟灑，那樣喜愛朋友。記得去年一月間——你們最後一次來臺，我去員山大飯店和你共進午餐，你還談起臺北許多花邊新聞，祝福那些「臨老人花叢」的朋友們，你對人生有濃厚的興趣，誰會相信你竟陪大中吞下安眠藥？我不能相信。當時，那消息來的太突然，我不能感到悲傷，直到今天，我把你們來箋放在書案屜中。有時想到唱戲，還會自言自語：「大中來了就熱鬧了！亞昭還可陪我唱段『別姬』呢！」

可是你們不能再來了？這一年你們在天國享受平安、快樂！可知塵世依然荆棘遍地，憂患重重！大中生前忠勤謀國，一朝撒手，必有未了心願。讀亞昭致令姊遺書中說：「可憐大中仍有些工作未能完成……」足見你知夫之深，愛夫之切！不過，現在我可以奉告你，大中想作的事，都有人在作了。民國六十年的「英文統計年鑑」已經出版；「中華民國經濟發展」一書，已經着手編印。大中遺志，有人完成；大中對國家貢獻，無人忘記，你們不必再爲此牽掛。

你們當引爲牽掛的，倒是我們這些朋友對你們的追憶和懷念！回想論交之初，九如因愛大中的才華，凡大中有興趣的事，他也有興趣。大中愛唱戲，他就讓我學幾段青衣，以便有資格湊熱鬧，請你們來玩。想想那些恍如春夢的快樂場合，每次大中都是那麼起勁，一杯開水，一柄摺扇，你邊飲邊搖的先唱小生，再唱老生，別人唱青衣時，你還要拉胡琴，拉得那麼用力，每次都要拉斷幾根弦，就在這娛樂方面，也可以看出你辦事認真的精神！如今呢？筵席永散——往日歡笑何處尋？自你倆去後，我雖然每週還獨自跟琴師吊嗓子，可是從未有勇氣再約朋友來家玩！我僅僅要你們知道，爲酬知己，我是不會將所學的幾段戲荒廢的——雖然明知永遠唱不成腔。

在三小兒入康乃爾大學前兩個月——六十二年六月下旬，我去美國，和三小兒約好同日飛抵 Syracuse 機場，承亞昭來接——先接小兒再接我，後來又開了兩小時車到綺色佳府上。臨湖雅舍，如世外桃源，令人心曠神怡！次早亞昭準備好晨餐，剛要就坐，大中從臥室走出來說：「依利沙伯（我的英文名），你猜我這時想念誰？」我說：「我知道，九如。」你說：「對啦！如果九公同來多麼好！」真的，早知再無第二個機會，九如那年應該和我同去。難道人生一次會晤都有註定嗎？

在府上打擾三天，承你們多般招待，我離去不久，你們就來了臺北。大中彩排「羣英會」，我未在场，真是畢生遺憾！幸虧我到府上的當晚，大中就配着錄音機裏的胡琴唱給我聽了「羣英會」的全本。九月中我返臺，你們冬天重來，爲了我，大中再請中視轉播一次錄影實況，看你那撫琴舞劍、談笑中亦嘖亦傲的神情，誰不羨慕你這英俊小生？誰又會相信你這國際聞名、多才多藝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竟已身罹絕症而不自知？你平生景仰周郎，也演活了周郎，難道爲此你竟和他一樣未享天年？

六十四年初，你們爲大中接長新亞書院事去香港，回臺後大中說腹瀉，是吃多了油膩。因爲你愛吃小館，我們都不以爲意，只勸你檢查檢查。誰料你二月回美，四月卽來信說患了腸癌。但是你很樂觀，認爲「至多不過少活幾年。」又說：「自信此病必能治好。」我當時就很擔心，曾屢次電話令姊，暗示病情嚴重。令姊不知你已坦白告訴我們是癌症，還吞吞吐吐說不關緊要，後來才知她是怕九如焦急，你們姐弟是多麼能爲別人着想！經過四個月的音書慰問，看出大中對戰勝病魔漸漸失掉信心，你那一一直都堅持「只要醫生允許，新亞還可去」的意念，終於在七月廿七日信中不得不寫着：「弟已辭去香港新亞職務，下學期不教書，可以在家養病……我二人已受洗爲基督徒，心境更加平和……」可見你對生命如何珍惜，却爲何半個月後竟憤而結束它了呢？想來是支持不住了。在我讀你致徐柏園先生的遺書說：「已用出最後一兩奮鬥忍耐的力量，實在不能再撐下去了。」不禁黯然泣下，

想着你忍受病魔加予你所有的痛苦，依舊未能保留你的生命？天意究竟爲何？

這封最後給我們的信，最使我感動的是：「子岳（三小兒名）曾騎單車來舍，正值弟睡，但與亞昭暢談。彼近況甚佳？」可見你病中仍想到我們關心孩子的近狀，多麼真摯的友誼！病重如此，還有心願到別人，何其偉大！

尤其是亞昭，在致令姐的遺書中，還問候她的女工以及女工的女兒，足見出從容的風度。去冬胡祖望先生自美來臺，談及你倆的辭世，他說：「康乃爾大學剛放暑假時，我去校中接小兒，聽說大中病，打電話給亞昭想去探望，但她答以不能見客，第二天亞昭到旅館來看我，並贈小兒一條領帶。當時我想小兒暑假後還要回來的，爲什麼要送東西？現在才明白這是他們將要永訣的表示，他們真是事先有安排。」後來我把這事函告子岳，他說：「我也有一條，是劉伯母在去世前不久送到我實驗室來的，我當時也不知用意，現在看來劉伯母是特別留給我做紀念的。」

紀念品，你們留給朋友的太多了！上週我和九如去看李國鼎兄嫂，當我告訴國鼎嫂我所穿的衣料是亞昭所贈時，她說：「她也送給我幾件，他們對朋友太週到了。」我們相顧悽然！你們留給朋友這麼多足以懷念你們的物品，在天國中你們可有什麼禮物是我們餽贈的呢？

大中、亞昭，我們相識何其晚，你們仙遊何其速……這一年春花秋月，常使我對遺影而心酸！許多離情別緒，唯有他年在另一世界相聚時再當面傾訴。藉這封寄不出的信，祝你倆天國快樂！

# 紀念劉大中先生

李 幹

——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劉大中先生伉儷逝世百日紀念會中報告

劉大中先生原籍江蘇武進，民國三年農曆九月初九在北平出生，在當地小學中學就讀，國立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畢業，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學碩士、經濟學博士。民國二十九年入康校與同學駱亞昭女士結婚。

劉先生一生所任職務，按時間排列，舉其大要，為駐美大使館副商務參事，清華大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經濟專家，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教授，蘭德公司顧問，康乃爾大學史密斯講座教授兼經濟系主任。民國四十九年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五十七年三月至五十九年六月，任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先生對其所擔任之職務，均有極強烈之責任感，盡心盡力，成就亦宏。但公爾忘私，不自顧惜，近年來曾患白內障及胃潰瘍，本年初忽發現腸癌肝癌，終至不治，於民國六十四年八月十四日逝世，其夫人同殉，中外人士，知與不知，莫不震悼。

劉先生生平事蹟，散見報章，追思錄內記載尤詳，毋庸複述。我們今天在此地集會紀念劉先生百日忌辰，本人擬對劉先生一生貢獻，作概括的敘述。

劉先生來臺灣不下七、八次，有時停留一兩星期，最久的一次住了兩年，總計時間不算太長；可是他的思想和構想，憑著他深厚的學術基礎，憑著他表達的特殊能力，憑著他積極、樂觀和充滿熱忱的性格，對自由中國的學術、文化（包括國劇）和政府財經政策，都發生了極重大的衝擊，和極深遠的影響力。

劉先生工作的方式，是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他是國內總體經濟模型的倡導者，可是他深切了解，建立一個正確的模型，一定要有充分而且正確的統計資料；因此，他不厭其繁，協助有關機關從事改進編製國民所得統計等基本工作，並創設「財稅資料處理及考核中心」，創設各種訓練班，造就製訂經濟計畫所必需的人才。現時我國經濟計畫設計的幹部人員，幾乎每位都和劉先生有過接觸，以至受過他的薰陶。

劉先生認為若要達成穩定中求成長之目的，全國總產量之供需預算，必須平衡。全國每年所能生產之物資，有其最大的限度，如政府支出、投資及民間消費之總數，超過此一限度，則物價必將上漲，以致動搖穩定的經濟基礎。他重視賦稅改革，因為「政府要有非膨脹性的財源，才能推進經濟建設，而經濟的穩定和成長也才能實現。若是資源的分配不合理，經濟成長必受影響。若是人民的稅負不能公平，財富的分配不能合理，經濟發展就沒有穩定的社會基礎。」

劉先生每次返國，除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或其他學術性質會議以外，許多次是應今總統嚴公在行政院長及財政部長任內之邀請。劉先生曾向嚴先生迭次表示，將以教育為畢生事業，其他祇算臨時任務。劉先生對年青學人的培養、輔導、關心，可稱為無微不至。他的學生稱頌他為「一代師表」，可見其入人之深。

劉先生的成就，一半由於專志、用功，一半由於天賦。所謂天賦，不專指智慧而言，他生就無比的熱忱，使得他的性格富有磁性及號召力量。六十三年膾炙人口的六院士報告「今後臺灣財經政策的研討」，提示了很正確的方向。那個報告當然不由他一人主稿，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可是——我想在座的費景漢先生會同意——他提供了推動的力量，也是融化各家意見的原素。

關於劉先生在學術方面永恆的貢獻，我曾經請教於蔣碩傑、顧應昌兩先生，為保持真實面貌，茲

將蔣先生的中文原函，和顧先生的英文原函，報告如下：

蔣頌傑先生說：

一、大中兄爲計量經濟學豫測模型之倡導者及先驅者，遠在一九五五年彼即在 IMF Staff Papers 上發表美國每年 (Annual) 經濟豫測模型 (A Simple Forecasting Model of the U. S. Economy, IMF Staff Papers, Aug. 1955)，爲此類豫測模型最早者之一。其後爲一九六三年又在 *Econometrics* 雜誌上發表美國第一個每季 (Quarterly) 經濟豫測模型 (An Exploratory Quarterly Economic Model of Reflective Demand in the Postwar U. S. Economy, *Econometrics*, July 1963)。數年後，彼復提出每月 (Monthly) 經濟豫測模型可能性之商討一文，其時美國擁有大批人員鉅萬資金之研究機構，無敢作此嘗試者，而大中兄乃率一二學生助理潛心研究，終於一九七四年發表其「計量經濟學的美國每月經濟豫測模型」(A Monthly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U. S. Econom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June 1974)，允稱美國 (或全世界) 獨一無二者，以與美國現有其他豫測模型 (多爲每季的) 相比較，其豫測能力及準確性，在許多方面賽過極大規模之模型，如 FRB-MIT 模型，U. of Pennsylvania 模型等，而今彼竟不能繼續運用其模型按月豫測，以供各方準照參考，實堪痛惜也。

二、大中兄在計量經濟學方法論上亦有其貢獻，在一九六〇及一九六三年彼曾對當時風靡一時之「聯立方程式估計方法」(Simultaneous Equation Estimation Method) 之「E認定性」(Identifiability) 提出嚴重質問，引起一陣熱烈之學術上論戰，麻省理工學院 (MIT) 之教授 Franklin Fisher 曾著有 *The 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etrics* 一書，對大中兄之批判，即列爲一家之言，蓋目前是非，尙難肯定也。

三、大中兄與康大另一教授 George Hildebrand 曾合作對紐約州各生產事業之「生產函數」(

Production Function) 作一通盤估計，並由此算出各生產因素之邊際生產貢獻，亦是一大創舉也。其他零星貢獻則不勝枚舉矣。以上只就管見所及者略舉數項而已，實不能視作其學術貢獻之正確估價也。

顧應昌先生說：

Ta-Chung Liu's major interest and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 can be grouped into four categories.

1. Theoretical econometrics
2. Applied econometrics
3. The economy of China, and
4.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mere listing of his publications can hardly reflect his unique quality as a scholar, because T. C. was an economist of great foresight. His initial interest was in the area of microeconomic theory, but he saw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econometrics as early as the late forties when econometrics just began to emerge as an independent field in economics. He studied the subject on his own and made a distinct mark in the field.

T. C. was a scholar of great intellectual courage in raising questions on the accepted practices and approaches in econometric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of econometric theory in the recent past involves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estimation. Practically all the econometric models estimated by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approach up the late fifties were overidentified, the contention being that economic theory or *a priori* information would

require the exclusion of a sufficient number of variables. T. C. argued that the contrary is true because economic theory would require the inclusion of many more variables than those found in the existing econometric models so that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included in these models are likely to be under-identified.

His passion for comprehensive gathering of data and his meticulous way in checking them for plausibility and consistency are a legend. His volumes on the economy of China illustrate this spirit. Last but by no means least, T. C. should be remembered for his originality. In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recent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production functions, Marc Nerlove wrote "The Liu-Hildebrand results are most interesting...they suggest a production function which is neither the Cobb-Douglas nor its generalization, the CES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function, but which includes both as special cases."<sup>1)</sup>

One of his last interests wa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estimation of monthly econometric models. Because of the limited availability of monthly data, many question the feasibility of the approach. Again he was among the first few if not the first in the profession to break the path. The undertaking is not only useful to decisionmakers, but also intellectually challenging. It put his resourcefulness and ingenuity to a test and he met the challenges fully by completing the project.

1) Marc Nerlove, "Recent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CES and Related Production Functions," in M. Brown (ed.), *The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oduc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67, p. 75.



## 學人報國的範例

李國鼎

——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劉大中先生伉儷逝世百日紀念會中報告

在一個多月以前，有九位大中先生的朋友，利用暑假來看我們幾位財經首長，商景在劉大中先生暨夫人逝世百日的時候舉行一次紀念會，希望我來擔任主席的工作。本人與大中先生的公誼私交，義不容辭，尤其今天借用財政部財稅人員訓練所來舉行。有一點先值得一提的，可能今天在座的人，本人是唯一有機會跟大中先生和夫人見到最後一面的。在今天這本追思錄裏，各位看到有幾張照片（第十八頁的兩張照片，及第十九頁的一張照片），就是本人在六月間銜蔣院長之命赴歐訪問特別經過美國去問候他的病情，祝他能够早日康復時所攝的。當時，他和他的夫人還開車子到飛機場來接我，唯一不同的，就是他體重減輕二十磅，用一隻手杖扶着走；但是，他還說，他能開車子，他太太不願意他開車子。過去幾次我到美國都是住在他的家裏，這一次原想不應該再去打擾他，希望能住在旅館，但他堅決表示，無論如何要住在他家裏，一切跟平常一樣。他的精神使我感動得無法拒絕，結果仍舊住在他的家裏。

我在綺色佳，共盤桓了二十個小時，一到之後，就看到他桌上放了一封未寫完的信，是給我們財經小組五位首長的。信中說，現在時間非常迫切，美國社會科學委員會（Social Science Council）和全國學術委員會（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過去和中央研究院合作舉行的中美人文科學研討會，已經有兩年多沒有開了，希望能夠選擇適當題目繼續舉行，加強中美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的交流，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希望請幾位美國的有名經濟學家，對臺灣經濟發展的情況，寫一個客觀的報告

。這一個計畫已經在國內跟各方面商量，希望我們能夠幫忙實現，並對於這個計畫給予必要的支援。當時我說，我一定把大中先生和碩傑先生兩位的願望促成，因為這都是非常有意義的計畫。本人返國後和有關機關首長會商均表贊同，大家尤其因為大中先生在病中極力推動此事，深受感動。

在美國推動這兩個計畫的是康乃爾大學葛倫森博士 (Walter Galenson)，他也就是康大的經濟學教授。他到臺北來那一天，就是大中先生過世的消息由電視報告出來的那一天，也正是星期日。星期一，葛倫森教授到財政部來開會，會商對臺灣經濟發展一書美國進行的情形，及我方如何配合提供必要的資料。王雪艇先生指定本人主持這個會議，葛倫森先生說，他離開的時候，大中先生曾告訴他，你應該怎麼樣、怎麼樣的做。各位可以想像到，大中先生生前說話的神情——非常肯定，非常有層次。事實上在葛倫森先生未到之前，大中先生也有信給臺北的朋友，希望我們注意的事項，大中先生真是臨死之前猶盡了他的責任。

當時，大家來開會，心情實在很沈重，大家感覺祇有寫好這一本書來完成他的遺囑。葛倫森說當他接洽撰寫人時，起先還有點推脫，有的說年紀大了；譬如哈佛大學得諾貝爾獎曾經來過中華民國好幾次的顧茲耐教授 (Simon Kuznets)，他就是因為大中先生本人以身許國，他有義務完成他的遺囑，所以幫助寫這本書。

我回想過去十五年來，大中先生對國家的事情，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更積極更熱心，可以看出來，他的熱情是一天天的增加。最先是兩三年回來一次，後來每逢假期只要有機會，他一定回來；甚至短期的、很辛勞的工作，他也不辭勞苦。也因為他回來肯諒話，我們在此地看到的未能推動的事情，他可以不顧一切誹謗，他肯提出來，因此才有許多的改革。今天，這一本小小紀念冊子，雖然是匆忙中各位好友寫出來的，可以詳細看到他綜合性的對國家財經的貢獻，真是學人報國最具體的範例。

本人擔任經濟、財政工作，總是抱著一面作一面學的態度，幸而有這許許多多國內國外的學人給我指導，給我建議，不吝教誨，尤其是大中先生。大中先生的去世對本人來說，不僅失去一位朋友，也失去一位良師。本人以極沈重的心情，希望有更多的經濟學家來接替大中先生的工作精神，繼續來指導我們，無論是國內的，或是國外的。

我們常常發現社會上有一種心理，覺得國內經濟學家的意見不受重視，其實不然。今天在坐的國內經濟學家會提出若干建議，到一個成熟的時候，部會首長就會採取推行，六十三年一月穩定經濟方案就是經過這個程序草擬和核定的。個人的感覺國內的經濟學家有時不免有所顧慮，不便明白說的或批評的，而國外回來的人，比較顧慮少，可以直率的陳述，如果你今天罵我的話，反正我不靠你吃飯。大中先生在主持賦稅改革時，他有一個基本的哲學——兩年內，無論如何一定交卷。他想，他國外的的工作離開兩年已經很不容易，另一方面留在國內再長的話，人家一定罵得更厲害，現在在兩年內，人家怎麼罵他，他一面說明、一面忍耐，無論如何要把工作做完，完成報告，真是不眠不休的工作。在賦改會期間因他經常瀉肚，劉夫人已安排一同到榮總去檢查，結果到時因工作忙而取消了。大中先生這種精神，實在令人欽佩和追思。

明年經建六年計畫就要開始，國內有好多各方面的專才，國外有更大的人才庫，如何鼓勵國外的人才拿國內的問題做自己的問題，提出建議，相信對於我們以後的經濟發展、財經措施、工程技術各方面都可以有很多的貢獻。今天悼念大中先生，希望大中先生的精神能感動更多的人士，也能時時刻刻把國家的事情擺在他心上。大中先生他們幾位來信給我們首長，都是十分直率的，返國交換意見，我們有不對的地方，他們也當面提出，但是我們都感覺很難得有這種愛國的好友。我們要這種朋友、這種學者，給我們說。他們說的很可能跟我們現在所做的有所不同，這樣我們國家和社會才會有進步

，真理是愈辯愈明的。以財政部的工作而論，在世界先進國家當中，都有許多有名的經濟學家參加，像英國財政部工作的凱因斯 (J. M. Keynes)；上星期來我國的海耶克 (F. A. von Hayek)，他是在奧地利財政經濟部擔任工作。剛巧另外有一位管理學家杜魯克 (Peter Drucker)，前天早上跟他吃早飯，他說：「我父親做奧地利的財經部長時，看重年輕的海耶克，特別請他到財政經濟部工作，那時候我還小。今天有機會同一時候在臺北。」這話引起我特別希望更多國內國外的經濟學家都能够對今後財經方面提供意見，完成大中先生未完成的使命。

本人回憶當中，大中先生建議的還有兩樁事情，與實際很有關聯。一為分析物價與利率的關係，做成一個很簡單的圖表，在某天早餐的時候向蔣院長簡報，說明利率怎樣由一個自由市場來決定，與物價有很大的關係；另外他主張採取機動匯率，建立外匯市場，所以國內利率如何由市場來決定，為一先決問題。我們正在研究短期的貨幣市場，希望最近能够實施。機動匯率的問題也是現在國內學者各方面所關懷的問題，還沒有得到一致的意見。

昨天，還看到一位經濟學家送給我看的——一篇報告：在六十二年經濟過熱的時候，該有適當的貨幣升值，我們沒有升值；後來在世界經濟衰退的時候，該有適當的貨幣貶值，也沒有貶值。我們在這個情形下所受到的影響，該有分析。今天，我們悼念劉大中先生，這個問題還是值得我們研究的，我們的經濟學家能够做一個客觀超然的研究。我們應該在報紙上對匯率問題少討論、少揣測，以免影響穩定；但是我們客觀的研究和分析，仍然是有需要的，我相信大中先生如果仍健在的話，一定會自告奮勇來承擔這個任務的。大中先生既然離開我們，我希望我們應該鼓勵有更多的人能够繼續大中先生的精神，配合變化多端的國外國內的情況，深入分析，提供很多有積極性的建議，使得我們的經濟能够達到開發國家的境界。這是我個人的一點感想，請各位先生多多指教。

(劉芳濤紀錄)

## 劉大中先生對學術的貢獻

邢慕寰

——「劉大中院士經濟論文集」序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劉大中博士不幸於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八月十四日在美國行館逝世，其夫人戢亞昭女士亦以身殉，中外同悲。經濟計量學會第三屆世界大會適於同月下旬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出席者一千餘人無不因此一資深經濟計量學家之逝世而黯然神傷。劉先生至友、當代經濟計量學大師 Lawrence Klein 教授特在八月二十五日大會中致詞，讚揚劉先生對經濟計量學之卓越貢獻，並對彼在學術生命之巔峯溘然長逝，表示沈痛之惋惜與哀悼，由此可見劉先生在國際學術界所受之崇敬。

劉先生早年在國內交通大學修習土木工程，畢業後旋即赴美康乃爾大學造深，故其數學基礎極其深厚。因而在一九三七年獲得土木工程碩士學位後，步 Vilfredo Pareto 等經濟宗師之後塵轉而修習經濟學時，對此一需用數學思考之學科不久即能豁然貫通，終以三年之時間完成經濟學博士學位。以劉先生所具之工程學背景，彼對數理經濟學及經濟計量學發生特殊興趣原不足為奇。惟其時經濟計量學尚未定型，治此學科者必須暗中摸索，自闢蹊徑。劉先生秉穎異之資，鑽研不懈，以後數年終卓然有成。

一九四〇至四一年，劉先生曾任華盛頓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旋即轉任我國駐美大使館副商務參事；一九四六年返國，執教於清華大學。是時劉先生已因其著作在國外陸續發表而著令譽，但就其治學歷程而言，最重要之關鍵則為一九四八年再度赴美。是年劉先生開始任職於國際貨幣基金，次年即受約翰·霍浦金斯大學之聘兼授經濟計量學。當時美國各大學講授經濟計量學者寥寥可數，而劉先

生則爲其中少數先驅之一。此後十年之間，其門下名家輩出，蔚爲盛事。一九五八年，劉先生脫離國際貨幣基金，返母校康乃爾大學任教；自一九七〇年起，並兼任該校經濟系主任。近年來康乃爾大學經濟系聲譽日隆，儼然已成爲經濟計量學及數理經濟學之一重鎮，得力於劉先生之積極參與及精明領導者至多。除上述經歷外，劉先生又曾擔任多種其他職務，且均有重大貢獻，茲一併開列於其年表內（請參閱「劉大中院士經濟論文集」或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編印「劉大中先生伉儷追思錄」第三五至三八頁），以見其經驗之廣與閱歷之深。在此等職務之中，其貢獻最大者莫過於一九六八至七〇年返臺主持賦稅改革，書生報國，劉先生於此實已提供最佳之示範。

就劉先生之著作而論，其早年興趣主要似在國民所得之研究。在此方面，有兩部值得特別重視之著作：其一爲一國民所得表式之建立與國民所得之國際比較」（載於 *NBER,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8, 1946）；另一爲「一九三一至三六年中國國民所得」（*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46）。大略言之，此二著作實已決定劉先生日後治學之主要方向。蓋在一九四八年劉先生再度赴美後，不久即開始計算一九四六至四九年美國國民生產中若干構成部分之月份數值，並進而從事有關美國經濟之總體數量分析。由國民會計之研究進於總體數量分析，原爲極其自然之發展；但因劉先生對經濟計量學已有良好素養，故對美國經濟之總體數量分析自然而然出以證驗模型之形式。此一研究趨向，愈往後而愈見顯明。自一九六〇年後，劉先生發表一連串關於美國經濟模型之重要論文，備受國際經濟計量學家之重視；其有關經濟計量方法討論之著作（特別關於經濟計量學上最重要之「認定」問題），尤顯示劉先生對此一專門學問之高深造詣。

於此值得附帶指出者，爲劉先生治學興趣之廣與選題方面之多。極少人留意劉先生最早在國外發表之一篇論文，爲「中國外匯問題：一個解決建議」（*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41），而

在其發表於一九五四至六二年間之經濟計量論文中，竟有三篇涉及匯率、貨幣、與財政之討論，即「國際匯率機能之穩定」（與 J. J. Polak 合著）、「每人平均生產之增長與貨幣需要」、及「若干型類貨幣與財政政策之影響之經濟計量測量」（*Econometrica*, July 1954; April 1959; July 1962）。後三篇論文顯然與一九四八至五八年間劉先生在國際貨幣基金任職之經驗有密切關係。筆者之所以特別提及此事，乃因劉先生與蔣碩傑先生自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起即常應政府之邀聯袂返臺，向政府提供關於外匯、貨幣、與財政各方面政策之意見，一九六八至六九年劉先生且曾返臺主持賦稅改革，此不獨由於彼對政府之忠誠，抑且因其學問通達而有遠識，固非僅專精於經濟計量學而已也。

除上述代表性之著作外，劉先生又曾與 George H. Hildebrand 教授合著「一九五七年美國製造業生產函數——生產力之業際及州際比較」一書（一九六五年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印行），其中根據美國各州各製造業之證驗分析結果，對「固定代替彈性之生產函數」（CES production function）提出最有力之批評，亦為極受學術界重視之一大貢獻。

劉先生所發表之另一系列著作——中國大陸經濟之研究，不但使其同道讚佩其多采多姿之學術才華，而且驚歎其豐沛強旺之治學精力。實則自前引「一九三三至三六年中國國民所得」一書於一九四六年出版以後，劉先生對中國經濟之研究興趣有增無減，尤以一九五〇年後為然。其所著「一九五二至五九年中國大陸國民所得之初步估計」（*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59），明白顯示此一趨向；至其與葉孔嘉先生合著之「中國大陸經濟：一九三三至五九年國民所得與經濟發展」（一九六五年普林士頓大學出版社印行），則顯然為前二著作之整合與擴充。此書所包羅資料之豐富及其分析態度之謹嚴，當代研究中國經濟之其他著作無出其右。此外，劉先生又曾與 Walter Galenson 及 Alexander Eckstein 合編「共產中國之經濟趨向」（Aldine Press, 1968），並親自撰寫其中關於「數

量趨向」之第三章，亦為治中國經濟者必讀之作。

除英文著作以外，劉先生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任教於清華大學期間曾以中文撰寫論文數篇，分別發表於「清華學報」及「經濟評論」。惟其價值最大之中文著作，當推彼在一九六八至七〇年擔任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撰寫之報告（共八冊）。吾人讀此報告時，不但了解何以原有之賦稅制度不能應付臺灣經濟發展及其他現實情況之新需要，而必須有所更張；且可知每一種賦稅之問題根源及其解決對策。凡細讀此報告者，對其建議雖不盡同意，但對其鞭辟近裏之分析及其謹慎持平之態度，不能不由衷欽佩。吾人預見，此一報告之建議無論其能否完全見諸實行，其影響必將歷久而彌彰。

中央研究院哀悼劉先生逝世之餘，特籌議由經濟研究所彙編劉先生生平已發表之著作，以為永久紀念。但吾人認為劉先生之中文著作不能盡代表其對學術之貢獻，而其所著之專書及其所撰之賦稅改革報告，已各自成為完整之系統，似均不必勉強湊集。惟獨劉先生所著之英文論文先後散見於各種不同之學術期刊及專冊，而後者在國內圖書收藏最豐之研究或教學機構亦未必購備齊全，以致查閱時深感不便。吾人有鑑及此，乃決定將劉先生已發表之英文論文三十篇按性質分為兩大部分。依劉先生自定著作表之編排，吾人將其關於一般數量研究之論文歸入第一部分；而將其關於中國大陸經濟數量研究諸論文歸入第二部分，庶幾讀者手此論文集時，如與劉先生晤對，則其人將與其文同在，斯亦本論文集所以紀念劉先生之原意也。

凡人皆有死，惟立德立功立言者不朽。劉先生一生堅守原則，熱愛國家，友則感其誠而懷其義，妻則重其情而輕其生，然而吾不敢謂劉先生已立德立功矣，吾所敢言者，彼已立言矣。劉先生其不朽歟！

（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一日）



# 我 憐 亞 昭

孟 瑤

一直想表示一點對劉大中夫婦的哀思，但這一類的文章很多，且都出於與他倆有深交的朋友之手，使我不敢執筆。但數月來，衷心感觸迴蕩不去，好像不寫出來不行。

我和他們認識是從來臺灣才開始的，以大中先生交遊之廣，我自是排名最後。但由於有同好，每次見面總是盡歡而散。誰都知道，大中先生除是一位經濟專家，還是一位業餘資深的票友。我們第一次見面是他請客，而且名單中並沒有我。恰巧那天我在素琴大姐處閒聊，他驅車來迎，我便被硬拖了去，內容當然是吃吃唱唱。人說亞昭姐不會唱是錯誤的，那天她便即席唱了一段汾河灣。大中先生能拉能唱能打，所以人稱全材。我沒聽過他唱青衣，但老生小生全好。那天，他爲我拉了一段「搜孤」。另一次在朋友家，大家玩得更開心，我正想唱「罵曹」，他從朋友手中搶過胡琴說：「我會拉這齣。」誰都知道，這是齣難戲，尺寸太快，唱的人要好嗓子，拉的人要好指法。而他，真能勝任愉快。最後一次見面是今年初，也是他得痔的前夕，我正在美國孩子處歡度一年的休假。舊金山一批愛好皮黃的朋友，知道他剛從臺灣回來，便強留他在舊金山停兩天，大家玩玩。地話是夏道師博士家，他家在半山腰，鬧起來不吵別人，夏夫人燒得一手好菜，待客又殷勤，那天鑼鼓齊鳴，多少遠道的朋友都趕來一睹。大中夫婦忙，不吃飯，應酬後即起來，還是那樣精神抖擻，看不出有一點異狀。他先打、後唱、再拉。爲我拉了一段「打侄上墳」。這是我最愛的戲，也是我學余最得神會處，我運腔：「……六子有靠……」他百忙中還喊了一聲：「好！」

那天亞昭衣著淡素，靜靜地坐在那裏，含著笑、沈默著。見過她的人都知道，她永遠是含著笑、

沈默著的；也永遠像影子一樣，追隨於大中身後。那天在夏家的歡晤雖然午夜兩點始盡歡散去，大中は丟下檀板又拾胡琴地忙個不停；大家却不知道亞昭也會唱，所以沒人煩她，她也從不表露。我看她像是被冷落著，就上前與她閒聊。閒聊，這是我們之間唯一的一次。我因為預備三月裏返臺，就問她：「你們最近還會回臺灣麼？」她說：「會的，大中也和你一樣，今年休假，他要去香港中文大學，臺灣也有些事，那會跑得更勤。」（聽說上次他串羣英會成功極了，可惜我沒看到！）（後來我在電視上看到了，這種真正的小生戲，在臺灣還不易多觀。）她含笑低頭，輕輕地說：「他就是喜歡這些。」……舊事歷歷如繪，變成拂拭不去的懷念。

誰也沒有想到活潑歡跳的大中先生會以癌症聞，誰也更沒想到溫靜嫺淑的亞昭會默默相隨！所以每一個人從報紙上得到這消息，無不受到強烈的震動。就以我這相交不深的人說，數月來總是揮之不去，思之愴然。大家最震驚最感傷的莫過於亞昭的作爲，讀他們的來信，知道大中爲病魔所苦，的確有生不如死之感；亞昭的去雖然由於同命之約，但千古艱難唯一死，實踐起來，要靠相當的勇氣！大家只看見她柔弱的一面，接著又被她的堅強驚倒，人說女人是弱者，爲母則強；我們也可以說，女人是弱者，爲愛則強！亞昭可以不朽了。

朋友們在惋惜聲中，常愛討論這件事：亞昭何以能鼓足了勇氣毅然追隨於地下？除了承認他們相愛太深，又都以為大中は亞昭的整個世界，失去大中就是失去整個世界，當然不能活！這又讓我想起一件舊事，非常湊巧，某天我在臺中候車北上，正剪票入月臺，一位女士匆匆趕來，她上前和我握手，並且含笑著說：「我是大中的太太！」那次大概只是我們第二次見面，她怕我忘記，便忙著這樣介紹自己，這該是近十年的舊事了，還忘不掉那溫靜的笑。我當時問：「你們在臺中？」「不，大中は臺北，我是來看爸爸的！」大概大中太忙，她又孺慕老父，所以落了單！記得她那份倉皇，的確像條

失落的影子在忙著找尋她的本體。如今本體失去，她便毅然追隨。這都是大家所看到也承認的事實，只有一點，被大家遺落：戚思姐的哀悼文字中曾提到他們夫婦同命之約的理由是：「到老了忽然剩下一個，……你叫我們和誰住在一起？」從這裏使我想到了「老」該是今天很嚴重的社會問題，雖然已有許多人談到它。

我們傳統文化中有一個「孝」字，大同篇的理想也是「老有所終」。過去人老了，並不是太難堪的境界，道德律規範著，大家庭保護著，五世同堂，含飴弄孫，為老年人的孤寂，抹上了相當的光彩。對兒孫輩也不是沈重的負擔，生存競爭不烈，活動空間又大，食住不逼人，晨昏定省是不難做到的。現在社會轉型了，生存競爭激烈了，活動空間狹窄了，衣租食稅都成過去，食住逼人，孩子羽翼一豐，都連翩飛去，剩下老的一代，只有彼此相依為命；若相戀太深，自是不忍獨活。

這種事情在西方也是問題，但是並不嚴重，因為他們西方人在觀念上心理上都有準備：人老了，就該是這樣，蹣跚著去公園散步，沈默著在椅子上曬太陽。孩子們，有自己的世界！而且他們有養老金，簡單的生活總是不發愁的。只有我們今天的老人不同，從「五世同堂」的美景裏被打落下來，不僅個人生命已由絢爛歸於平淡，而且整個環境的空氣，也是一種青黃不接的稀薄。眼望著連翩飛去的孩子，心理上還沒有西方人那樣能處之泰然；再眼望著逼人而來的衰老，又怎能不驚惶失措！雖然今天生兒育女的人，還頗識得時務，不準備、也不敢向兒女索討什麼，但也有在事實上出不得人的地方。譬如我輩，念書時在抗戰中長大，一直顛沛流離著，到臺灣才算安定下來。但這一段日子中又忙於生兒育女，常常夫妻參商不相見，為生活奔走，等到兒女相繼長成，喘過一口氣來，回顧四周，已是環堵蕭然。這時不得不仰望兒女的反哺，是一件可悲憫的事，不是落伍，也不應該受批評。像亞昭，當然無所求於兒女，但這突然留下來的空虛，她受得了麼？想到這裏，亞昭的殉情，是突然，也是必

然的了。一個在中國社會受教育而又在美國社會求生存的人，舊日大家庭的溫馨繼續不去，今日新社會的落寞不堪承受，我憐亞昭！

（轉載六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聯合報）

## 相敬如賓的劉大中博士夫婦

姜竹華

對於劉大中博士夫婦的同時棄世，我並不感到震驚；我只是覺得：他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間，太早了一些。

我認爲劉先生夫婦的同時仰藥殉情，並不出乎意外，因爲自我認識他們這四年來，我所看到的他們夫婦間那種恩愛，就使我感覺到——這兩個人是否已合而爲一，他們不忍須臾分離！

生離的滋味，他們兩人都願嘗到，死別那種痛苦，又豈是他們所堪忍受？

去年劉大中博士票戲那天，當劉先生在臺上神采奕奕地唱做時，我總是不忘看着身旁的劉夫人戰亞昭女士，因爲我好沈迷於劉夫人臉上洋溢的滿足與欣悅。我從劉夫人的眼神裏看出來，劉夫人彷彿自己也附着在劉先生的身上，那樣專注地舉手投足。

劉先生排戲之時，經常用一把大摺扇，都是掌管在劉夫人的皮包裹。每當劉先生排戲時，劉夫人必定取出備妥，而在排戲完畢後，不管劉先生將摺扇放置何處，劉夫人從不會忘掉去收拾起來。

因此，我感覺到，劉夫人無時無刻不活在劉先生的精神裏，而劉先生也未嘗片刻忽略了劉夫人的生活細節。

我每次和劉先生夫婦一起共餐，都發覺到我沒有爲劉夫人服務的機會。因爲從拉椅子，擦拭碗筷到揀菜，劉先生一直不停地爲他太太做着，別人只能艷羨地注視，却沒有插手的餘地。

劉先生喝水不喜歡過熱或過涼，劉夫人曉得他這個習慣，因此每當劉先生喝水時，他的杯子永遠先在劉夫人的手裏，她要爲他先嘗一下，過熱了，她就端着讓它涼一點；過涼了，她就爲他更換。

我們開始與劉博士夫婦認識時，覺得劉博士夫婦間的親愛，好得超出常情，但多與他們接觸以後，就會覺得並不希奇。

果然不錯，到了後來，我們知道了劉先生夫婦間的感情就像是一泓溪水，永遠涓涓的流着。他們從來是發乎情，止乎禮，他們不需要熱烈的擁抱，光是那脈脈的眼神，就已經讓人心醉了。

我老是感覺到，我與劉博士夫婦在國內相聚的那一段時間，令我更深切體會到國劇中描寫傳統夫婦間恩愛的那種情形。什麼叫相敬如賓？什麼叫此情不渝？在那時候我有了更深切的概念。

後來，曾隨國劇團兩度訪美，每次去到劉先生夫婦的寓所，都發覺倆人的感情有增無減。我參加劉先生夫婦的追悼會，內心深處禱祝他們魂靈安息，願他們來世仍然比翼雙飛。

（轉載六十四年十月一日大成雜誌第二十三期）

## 劉大中先生教育文化基金籌設經過

徐柏園

——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劉大中先生伉儷逝世百日紀念會中報告

本人今天以萬分沈重的心情來參加劉大中博士伉儷逝世百日紀念會，會中決議創設劉大中先生教育文化紀念基金會，其目的為紀念劉大中先生生前對我國財經學術之貢獻，以其基金之孳息獎助及發揚財經學術之研究為主，意義至為深遠。本人被推選為基金會之董事長，事前曾承于宗先、徐育珠、劉泰英、華嚴等四位教授親臨舍間商談，本人建議應商請財經首長五人小組，如李部長、俞總裁五位中任何一位較為適當。嗣于教授等再度過訪，並說明李部長竭力支持，仍以斯職見囑，由於大中兄與我深厚的交誼，實未便堅却，祇得勉承其乏。

依照規定本基金會應辦財團法人登記手續，必須先有捐助人，由捐助人會議通過組織章程後，另推選董事，始符合申請財團法人登記之程序。

現請劉芳瑤小姐宣讀基金會組織章程草案。（經全場人士無意見通過）

謹提名：李榦、蔣碩傑、劉瑤、華嚴、張繼正、劉泰英、梁國樹、王紀五、劉濤華、嚴慶齡、徐有庠、辜振甫、徐育珠、于宗先、費景漢、張則堯、陳勉修、吳幼林、徐柏園等十九位為捐助人。（經全場人士一致通過）

所有各項籌設劉大中先生教育文化紀念基金會事宜，當即進行。本基金已洽蒙臺北市銀行同業公會、產物保險同業公會暨人壽保險同業公會各認捐新臺幣壹百萬元、柒拾萬元、叁拾萬元不等，謹此中謝。

附：財團法人劉大中先生教育文化紀念基金會捐助及組織章程

第一條 中華民國學術工商各界爲紀念劉大中先生對我財經學術之貢獻，特捐助新臺幣伍拾叁萬陸仟貳佰壹拾柒元叁角整，創設劉大中先生教育文化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

第二條 本基金會以獎助財經教育及其學術之研究與發展爲主，其使用限於本基金會之孳息。

第三條 本基金會設董事會管理之（以下簡稱董事會）。

第四條 董事會設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現爲臺北市。

第五條 董事會之職責如左：

一、關於基金之保管運用事項。

二、關於獎學金核給與講座之設置事項。

三、關於基金收支預算決算之審定事項。

四、關於董事會職員之聘任事項。

五、其他有關基金管理事項。

第六條 董事會設董事五人，原始董事由捐助人會推選組織之，均爲無給職，任期無定。如遇出缺或因故離職，由其餘董事提名，經半數之贊同補充之。（例如：董事五人中一人出缺，其餘董事過半數應爲三人，如遇二人同時出缺，則過半數應爲二人，餘類推。）

第七條 董事會設董事長一人，由董事互選之，任期爲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董事長出缺應先依照第六條補選董事長，再依前項補選董事長，以補足前任任期爲止。

第八條 董事會每半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均由董事長召集之，並主持會議。董事



長因故不能召集或不能主持會議時，由經董事長指定之董事代理其職務。

第九條 董事會議，以全體董事三分之二出席為法定人數，其決議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贊同為之。

第十條 董事會議為審議學術著作或申請案件得設置各種審議委員會審議之，其審議費用由董事會核定之。

第十一條 董事會設秘書、會計各一人，辦理經常事務，得酌支交通費，其數額由董事會定之。

第十二條 本基金會於解散清算後，其剩餘財產，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於任何個人或私人企業，只得移歸教育部接收，作為獎學金之用。

第十三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辦理。

第十四條 本章程經捐助人會通過，交由董事執行；修改時須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為之。

# 劉大中伉儷偕殉史詩簿註

張九如

予雖知詩可以興觀羣怨，然未嘗學習，尤未試作。雖隴昌黎銘劉君弘冀聲沈筆揚之當，然資毗陽剛，難循其則；雖不以商隱繁縟晦隱之詠爲然，然隸事屬辭，無可盡免；雖已兩爲文辭悼念哲人，然悲猶未已，遂試賦此詩以抒之。溢氣忿涌，錯落無章，固未追計其工拙，審其究爲幾首古風或近體、及是否以文爲詩也。其尚非語無倫次，辭近溢美，則有仿文心雕龍書記篇之簿註可證。

元首旁求與復策，計然善策綸音張。河汾北面皆人傑，賜宴月池喜贊襄。

蔣總統自國都暫遷臺灣後，日籌興復之道，致力生聚教訓之政。民國四十三年，大中夫婦初次返國，卽信託之以財經革新大計，急命時任財經金融首長者如尹仲容等三人至陽明山莊，聆其講述財經主義政策方略二時許，三人皆財經俊傑，殆如溫彥博、杜如晦、魏徵、李靖、王珪諸賢之北面受書於文中子，樂受無疑。劉亦當仁不讓，本其計量經濟之造詣，總體經濟之立場，暢陳所見，同於春秋時善計算、精研覈、號曰「計然」之辛文子之於越王。越行其十策之五而成滅吳復國之業，蔣公期之於劉者，亦此物此志也。

尤令人崇敬者，一爲嘗於宴劉夫婦翌日之晨，親以電話垂詢李國鼎是否已爲劉備妥膳宿處，其於劉禮遇之隆，關切之周，猶過於越王之於文子。方諸唐高祖鎮太原時，引張復胤爲客，以經授秦王，及太宗卽位，賜宴月池，自誇翼贊得人，跡亦相若。證以大中溘逝後，予從某方面訪悉總統之長公子經國先生之於大中，亦如秦王之於張復胤，嘗於某歲元旦，偕其夫人爲劉賀年

一事，則尤信而可證矣。二爲劉於五十七年八月七日曾舉當時財經方面亟待改進六大點，與賦改會委員蔣碩傑聯名簽請察核。蔣公卽於是月廿五日在其摘要簽上親批「所陳意見大體皆應照辦，且無甚困難，應由行政院及中央黨部分別督導，如期完成」；並就各項逐一眉批「此應照辦」「照辦」「應速辦」「應照辦」「應卽辦」此少數專家應卽由行政院從速遴選實施，並與大中主任辦理。」從善如流，無一置疑。

自四十七年四月實施之外匯貿易改革方案及由複式匯率改爲單一匯率，成爲近十餘年來外銷拓展、經濟繁榮之樞素，固賴朝野之勳力，而其丕基實奠定於劉之建議。卽自此以後所有財政金融及經濟建設之設計，與賦稅制度之建立，稅務行政之革新，亦本於劉之擘畫。而六十二年七月，正值國際金融及經濟發生劇變，世界性通貨膨脹到處波及，我國經濟亦遭衝擊之嚴重時期，又借蔣碩傑等專家應邀返國，提出現正由央行及財政部逐步實施之發行國庫券，樹立貨幣市場等建議及方案。凡此遺大投艱之精籌，方諸越國廿年生聚教訓之成功及其成功之因素，幾如出一轍。周諮博訪超山海，解惑辨難如探囊。三道九思夕惕若，標本兼治報殷望。

劉在國外時，亦常與國內財經官員函商或電談問題，不以山海遙阻而止。在國內時，除親赴各縣市實地觀察，不以簡報爲已足外，又常邀請各界發表賦改意見，日不暇給。解答問題，若決江河，不稍遲疑。雖侃侃而談，理直氣壯，絕不盛氣凌人，尤不立岸崖，不自矜伐。魯論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及「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劉氏有焉。

廿年生聚加教訓，濟會風雲照廟堂。國力今躋廿國上，思源一度一迴腸。

曾任美國國務院官員及中央情報局副局長柯林博士，最近出版其名爲「世界國力研判」之新著，依人口、經濟力量與軍事能力爲基礎，參酌戰略目的與國家意志，研判世界七十八個國家之國力，列我國爲二十七個首要國家中之一；而其有形國力相乘之積，卽真實國力，在世界一百五六十個國家中則升至第十四位。其研判方法，係根據具體資料及其所謂「廣泛感覺」之抽象原則，爲運用計量經濟學之結晶。計量經濟學注重「樣本數」與「變異數」，然後求得「預測變異數之平均數」，其中「觀察值」具有高度客觀性，亦帶有高度客觀所產生之主觀判斷，此亦大中博士所最擅長者。假令劉尚在，柯林氏予臺灣地區之人口與土地以兩個單位，經濟能力亦然，軍事力量則四個單位，及其解釋中華民國有現代經濟措施，較進步之技術，勤勞之國民，臺灣人民所享受之福祉，在中共赤區之三倍以上，必將表示同感。此一我國國力新價位之發現及其成因，實則爲國盡瘁二十餘年之劉氏與有力焉，中庸謂「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劉之謂也。

方期仲夏言旋後，百尺竿頭掃披猖。北定中原還故里，欣然家祭告爹娘。

曩昔劉至吾家，多次表示甚念家鄉常州之天寧寺與文筆塔，此與其在抗戰勝利時曾回常州老家，取劉氏宗譜攜至美國之深厚家族宗族觀念，同一情操。凡對於國家社會宗教之敬愛，而趨出於利害觀念之上，甘爲之犧牲生命而不辭，如世所謂愚忠愚孝，幾若鳳毛麟角而不可多得者，皆此種情操之結晶體也。劉夫婦之爲純愛而互殉，亦若是耳。

猶憶其今春赴美時，在臺北機場客室中對我言，八月底到香港接新亞書院院長前，先來臺灣商談一下財經方面要務，不久卽有歡聚機會。又認爲經濟力量爲全部國力之母，軍事攻守之資，今軌道已鋪就，前途必可觀。又至央行俞總裁座旁，坐於其椅之扶手上，耳語多時，始與送行者一一握手而別。歸途細味其所言，覺其對祖國前途頗樂觀，一若光復神州，祭告先塋，已有日益

發展之經濟力量可爲佐證然。是其純愛程度之深厚廣大，實隨時隨地皆可見也。耗音突自美京至，初聞涕淚流滿裳。四德兼優殊少匹，一朝偕殉世驚傷。如何同赴玉樓召，如影隨形如追亡。想悟修文猶盡瘁，事亡如在素懷償。

六十四年六月間，親友接劉書，驚悉其腸癌已深入，卽已痛斷其不治。惟突聞其夫人亦隨之仰藥以殉，則無不錯愕感喟。其後接蔣碩傑博士覆我書，謂大中夫婦之「骨灰已由其長公子壽華奉歸其寓所附近一公墓安葬，並遵其遺囑，將兩人骨灰併存一罈之中，亦足見其伉儷情深，雖死猶願連理也。」反覆凝視，不忍卒讀，而又不忍不讀。因是想起劉夫人前曾向我表示其夫忙勞得不顧生命，則我之所謂修文仍勞瘁云云，實亦有所本也。劉夫人溫文爾雅，追隨馳驅，體貼入微，世所少見，固猶較易爲者，而竟與其夫共生死，則決非常人所能幾及矣。心傷巫醫毒攻毒，窮狗痲瘋過虎狼。猶道膏肓竄二豎，華陀再世亦徬徨。

大中送往羅查斯特醫院化學治療，因醫藥費極鉅，往返又不易，卽在五天之內，連打六針。據其夫人七月八日致大中之姊戚思函：「打第二針，反應就厲害多了，一離醫院就會全身發抖，很像寒疾，接着發高燒至一〇四度。」不久又致臺北親友函：「連打八天擺子，發燒發抖，幾乎把他那一把硬骨頭給抖散。」蕭青萍先生之女，家居康大附近，曾往慰問，劉爲言及醫生注入癌細胞藥針，痛苦萬分，癌已竄徧肝肺腸胃矣。

大中夫婦留致蔣碩傑夫婦並轉臺北張繼正夫婦之遺書中，仍祇寫出「等你們看過這信件，我們已攤手雙雙離開這個世界了。大中近幾個月的痛苦，遠在你們所知以上，肺上早已有癌，最近呼吸短促，咳嗽甚烈，近兩天腸胃又發痛了，可能癌又到了腸胃，西醫早已束手，中醫只能治標，等到呼吸短促不停，肺也完了，人也完了。」又另有由其夫婦署名致康大同事蔣碩傑等五人

遺書中，亦祇言「弟之肺胃腸肝自前日起均突轉烈，呼吸急促，至不能說話，只能吃米湯，而大便又不能出，其痛苦已非弟半年痛苦元氣大傷之後所能忍受，弟已用去最後一分抵抗力。」「這幾天大中醫情惡化之快，真未想到，反正已不能醫治，不如解決了，免得受罪。」無一詞提及西醫以病人爲新藥物之試驗品問題，可敬可哀極矣。其不怨天，不尤人，一切盡其在我之心情一如平日。故劉於六月十八日致張繼正、孫乾方、鄭有儀之書中祇言：「弟覺此症刁頑，可能時好時壞。不至七月底後，弟亦不作必好之想法，惟有儘量保持平靜樂觀之心境，盡力與病魔搏鬥。」「弟及亞昭均心境平和，沈着靜養，以慰諸君之懷念。」七月八日，其夫人致大中之姊書亦祇言：「總之，大中的病不輕，他現在已不是一月間你們看見的生龍活虎的大中了，是一個乾瘦的老頭兒了，病魔真能磨人。所幸精神還不太壞，和朋友談天，還感興趣。」七月三十一日之函亦言：「大中祇有九十七磅了，但我二人心境安定，請勿念。」

端情約言生死共，共同奮鬥氣更王。心安理得了無憾，萬事安排自周詳。

尤可敬且哀者，早在五月十八日致張繼正書中言：「弟一方面正極樂觀，另一方面覺六十年來家庭之幸福，親友之盛情隆意，均遠越恆常。弟對於國家、教育、學術雖無貢獻，但確已盡心盡力，卽或萬一，亦無遺憾。」並於致其姊之書言：「總之，弟之一生，父慈、母慈、姊慈、妻賢淑，兩子均已自立，對國家、教育、學術雖少貢獻，但已盡力而爲，所以已無一事使弟抱憾。但這些都是廢話，因爲弟至少還有幾年可活，並且要在這有限的時日裏，積極做點一向做而未能夠抽出時間來做好的工作。」

劉致蔣頌傑之遺書中，又謂「一月以來，幾乎每日痛苦，最近加重後，我已用出最後一點力量去奮鬥和忍耐，現在元氣已消耗完了，無可再用的了。我們早已約定，這個世界不是一個單身

老人所能住的，六十也罷，七十也罷，八十也罷。我們所以早就決定雙雙的攜手而去，現在不過早了一點，也無大的遺憾。唯一可憾的，是與我們許多的好朋友不能再見一面，收到很多信未能一一回復，見面請代道歉，並祝他們幸福。希望熙靜好好休息，有許多事只可麻煩碩傑了。」又爲劉夫人致康大同事夫人如上述之遺書中，曾謂「我二人有約，一人如得絕症，兩人同歸於盡，因有此打算，所以這半年來我纔能支持。」「我們要火葬，已曾與殯儀館電話中打聽過，等孩子來了可以進行。我要穿的衣服及黑鞋，放在我帶至汽車旅館的小箱中（一件淡紫色的長袍），請交與吾媳，其實我應當放在家中，走時纔倉促（臨時決定）就將它放入箱中了。」「我們不要葬禮及任何儀式，只要兩兒兩孫參加，請答應我這最後的要求。火葬後運至N墓地。」「我們結婚三十五年，也不算太短了，現在雖然將離開這世界，心境極安定，請不必悲傷。」「最後再謝謝你們對我二人之照料。」

再參證之以其姊悼念大中夫婦之文一大中的兩兒雖在美國長大，因在大中、亞昭教育之下，仍具有中國傳統的孝思和美德，長媳頗有婆母之風，兩個孫兒又非常可愛，所以他們能這樣的安心而去。一卽更可窺見其在個人方面，毫無遺憾，而其所憾者爲元氣損耗無可爲國家續効其用耳。如此不願遽死而竟死之心聲，凡讀其遺書而不一掬同情之淚者，非人也。

書至此，不能不對生平向不喜宣傳大中夫婦在天之靈，及碩傑、繼正兩兒臺前，並致歉意。前當繼正兄出示此函印本時，曾囑母子發表，後奉碩傑兄影印本及覆書，雖無此囑，然未商經同意而卽摘要公開，於心仍不安也。

不惑不憂亦不懼，捨生取義便平常。首丘溝瀆無多異，懸別端看久要章。  
生有所為死有說，蘇韓縱筆弔英皇。未知生又焉知死，孔聖之言義諦長。

時論於劉夫人之自盡，或有微詞，吾已撰「死生亦大矣」一短文，載諸九月十二日中央日報副刊中，推言其故。子路問成人，孔子嘗降格爲言「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即可合格。際此羣倫詭詐、國際背信之季，有心人或亦哀其遇而嘉其志歟。孔子又嘗以「未知生，焉知死」答子路之問，以示生死之未易驟明。蘇軾銘潮州韓文公碑，開首卽言「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結尾且嘉歎娥皇、女英隨舜遠巡而死於中道一事，復可概其所見。國父孫先生在軍人精神教育訓詞中，更極言「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拔之根基」，以勗國人。誠明及此，或更可曉然於死分輕重之造端何在歟！

國人甚尊崇捨生取義，殺身成仁，慨歎千古艱難惟一死，實則義者宜也，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誠能設身處地，瞭解大中夫婦最後所考慮者，厥爲於己已無生存之樂，而祇有生存之苦，於國家社會已無繼續効勞之餘力，而祇有增加國家社會關念彼輩之痛，在此公私皆不利之情勢下，惟有出於採行一了百了總解決之一途，方是仁至義盡之舉，則不惟可以同情其伉儷之所爲，尤同洞曉歷史上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之死，皆平常之至矣。

一死堪延萬古祀，聖明垂訓此苞桑。人生自古誰無死，鴻毛泰嶽仔細商。

賈生屈子不同科，川端海明各有當。獨闢徑蹊心原苦，典型存廢俟穹蒼。

劉之自殺，由於自知病已不治而卽將死，如再掙扎，徒增加己身與其夫人更甚之痛楚。劉夫人之自殺，則由於痛感其夫之遭此荼毒，而半年多來，多次往返醫院家庭百十里之勞，目擊呻吟轉側之狀，早已體痺心碎，無可留戀，而今後之悼念尤無可以已。且劉性外向，苟尙有可與病魔作戰到底之一分力量及一線希望，必不甘放棄。劉夫人性近內向，既一切絕望，萬念俱灰，自更無所留戀。故其伉儷之自殺，實皆陷於不得不然之境，卽令無前約，亦必出此及時解脫之一途，



顯與楚屈原、漢賈誼及美國海明威、日本川端康成之自殺或自傷致死之因素，均不相類，其情之誠且苦，其途之艱且窮，惟天可表。若復求全責備，亦惟有爲呼一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一而已。死生突破時空界，不斷昇高似谷筮。相矢追求真價值，弱水三千一瓢航。

人到悟徹時，永無生死，孔氏「朝聞道，夕死可矣」，固是此義。佛家命終稱涅槃或圓寂，辭尤透澈。孔佛二氏所念茲在茲者，無非教人徹悟人生最高之意義與價值，不在形骸之永存，而在心靈之昇華，精神之不滅。文天祥正氣歌所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最能闡明真諦。此外如賈寶玉與林黛玉纏綿排測之愛情，一到攤牌時刻，即使剖心相示，亦難表明，於是又直接又便捷之幾句參禪對話：「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至「禪心已作沾泥絮，休向東風舞鶻鴞」，亦已不待煩言而共喻矣。是則劉哉夫婦生死與共之故，參以前文之解釋，則好向東風啼鶻鴞者，亦可以隅反矣。

倘謂彈味太玄，則例諸孟子以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道，崇述往聖；莊生以一吾喪我」之犧牲小我爲實現真我必經之途，喚起迷夢；東坡以取捨仕隱皆率其真之情，稱譽陶淵明；及西哲麥爾頓所言之「吾人雖似墮入無底深淵，而進入絕對之門則永遠敞開在吾儕之身旁，在此寂寥之中，吾儕已掌握到永恆」數語，以提醒世人。質言之，則爲真我必須透過小我之消失而始全現，乃成聖成神之通則。簡言之，則僅「返璞歸真」四字，即可豁然貫通，已無剩義。淺言之，則決不應以一般價值標準衡量大中夫婦之逝。大中夫婦之相處及其處已處人處事，無一不真不誠，此則無論識與不識，皆無間言者也。

吾所以反覆發明生死之真諦，於詩與註皆居全文十之三者，蓋目擊心傷好貨財、私妻子、百

計謀託命於海外者，日有所聞，以視大中夫婦之雖死猶生，恰相背反故也。河魚縱或忘治本，國計慎為瞑眩方。足食足兵民信立，翩然揮扇下大荒。

劉患腹疾已多年，大便頻數，視為習慣。五十八年九月間，請其夫婦至吾家啖常州家鄉糟扣肉時，曾勸其至醫院診治。劉謂醫生必東看西查，若有其事，如此將影響我之精神與工作。又從衣袋中掏出一小瓶中之藥片，笑向我言，此即我之醫藥，每服數片，即告病除，何須多費時間。如此遷延至今春由臺返美後，方知已患腸癌，雖經兩度割治，實未根除，不久即蔓延及於肝肺矣。但其病雖至不起，而其為國家創立使用電子計算機以處理財稅資料、稽核各稅遞納之制度，則已使稅務上久治不愈之全身癌症，日趨康復。計至上年度止，追徵逃漏稅款已達新臺幣二十億元左右，縱為蛀商蠹民所嫉視，實已達成公平課稅之目標，提高足食足兵之宏效，豈非書「說民」篇所謂「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者耶。靈爽不昧，當必含笑地下，且可想見其生前輒攜巨扇訪友時之瀟灑歡娛情態，復翩然陟降於臺澎金馬間也。

試看人去音容在，赤壁眼前又戰場。橫槊賦詩長已矣，劉郎志氣託周郎。

劉七八歲時，即迷嗜國劇，十五歲時在故都就學，已登台票戲，文武崑亂不擋，皆得前輩名伶親傳。票劇為其唯一娛樂，曾在紐約公開演唱七次，在其他各地飾「羣英會」中之周瑜者計亦七次。任賦改會主委時，有周郎癖者羣愆愆其在臺北登臺，終以其身為國家特任官，不便出此。六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始應中華文藝復興會之邀，教育、國防兩部之支援，飾演周瑜於國軍文藝活動中心之戲劇廳，極一時之盛。劉於登臺前三月，雖眼疾未愈，醫生禁其閱書，猶由其夫人之助，歷兩月之久，寫極大之字，撰成「遙想公瑾當年」一長文，然後帶回臺灣，刊諸七月二十六日之中央日報。其所以如此努力其事，且特喜飾周公瑾者，無他，殆自況也。故其文引史衡情

，稱公瑾「文武兼資，孤忠奮鬥，倜儻不凡」；「彬彬有禮，涵養極深」；指「其最大之成就，在莊敬自強，遇人數最多之敵人，絲毫不懼」；強調「三國局面之造成，周瑜乃最具決定性之人物，若無其堅主破敵，孫權與劉備均可能為曹操所解決。」並言及飾演周瑜者，「不應將其演得太偏激急躁，必須保持其儒雅英斷、彬彬有禮之風格。」劉於財經革新工作之儒雅英斷，終能令反對其所為者逐漸贊成，一如其敘述年高資深之東吳大將程普，「見周調兵遣將後，終於心服」，且向大言，「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謂非自況而何？

劉於今春離國前，曾表示秋間回國後，將飾演其並皆擅長之「奇雙會」與「得意緣」兩齣，以饗同好，詎意天喪斯文，竟離人世。此中視公司之所以於其淹逝後之廿五日，急為播映此劇攝影錄音中之一片段，聊以償各方之望，察各方之痛也。而其雄姿英發，聲調慷慨，一如其在世之時。即其夫人當時出入前後臺，殷勤照料，含笑欣賞之狀，亦一一活現眼前。為之唏噓一室、掩淚不已者，就聞見所及，幾徧臺澎各區。其視橫槊賦詩，不可一世，而終不免為世唾棄之詞，顯有流芳遺臭之別，則其尚不及阿瞞萬一者之終局何似，尤令人感慨系之矣。

鈞天廣樂寤秦繆，世界舞臺翔鳳凰。所至騰聲繼敬仲，弄簫仙去白雲鄉。

劉曾多次演唱國劇於海外，備受僑胞激賞，美歐人士之通曉我國文藝者，復欣佩我民族之優雅文化，足以調補西化之缺失。殆與秦繆公、趙簡子之病不知人，數日而寤，寤後語人以天帝饗以其所甚樂之鈞天廣樂，同一寤境。尤巧合者，一為左傳莊二十二年，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猶敬仲夫妻之相隨適齊，卓著聲譽，大中夫婦所至各處，亦多相似。二為列仙傳載，蕭史善吹簫，作鳳鸞之響，秦穆公有女弄玉亦如之，遂以妻之。史即教玉作鳳鳴，居十數年，鳳凰來儀，公為作鳳臺，夫妻止其上，如魚得水，歡好無匹。又數年，玉

乘鳳，史乘龍，相偕仙去。大中夫婦自結縞至溘逝之志同道合，如響斯應，亦復如是。至於劉極珍重其由家鄉常州攜至美國之宗譜，並曾對吾表示其時念祖宗坟墓之意，則其魂魄常繞親舍所在白雲之下，又可知也。

生平鄙薄而鈴曲，心折虞兮蔡向陽。漆室私憂見語默，魯連志節兩心藏。

唐明皇作雨霖鈴曲悼念貴妃，與楚霸王之歌虞兮，迥然不同。貴妃之死是被殺，虞姬則爲不願獨生，貴妃死得慘冤，虞姬死得悲壯。劉夫人之以身殉夫，殆虞姬之流亞也。至其是否亦如春秋時魯國漆室邑村女之倚柱而嘯，私憂魯國之患，自非他人所能悉；惟其與劉憂樂相共，則海內外知之者不少。中共統戰份子，曾百計勾引，誘劉回大陸觀光，爲劉毅然拒絕後，卽又唆使美國左傾份子，予以各種打擊，並散佈謠言，謂劉已接受彼等之邀請返回大陸，冀以蠱惑世人，損劉聲譽。劉皆一笑置之，及劉復來臺灣，謠言更不攻自破。

其尤爲有力之反擊，則在其不但爲堅決反共之鬥士，並爲少數敵情經濟專家，極爲對方所畏。例如五十六年四月，美國參衆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舉行大陸經濟聽證會，劉爲被邀請專家之一。當時發現美國政府對共方經濟發展之評估，不無揄揚之處，且與所引用之統計資料自相矛盾，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外，並提出自己之估計，以消滅美國左派人士爲共張目之企圖，收效甚大。魯仲連義不帝秦，尙費許多唇舌，劉則於共方對其個人施展之種種伎倆，付之一笑；獨於其欺世之所爲，不憚辭費，是其行誼之高於魯連，及其夫人之甘與同殉，謂非蓄之有素，持之有故，不可得也。

歸遼神鶴知棲止，起陸龍蛇徧郊隍。定作鬼雄臨碧落，計量經濟決興衰。

丁令威化鶴以歸，不歸他處而歸遼，自有其故。劉夫婦爲國馳驅廿餘年，貢獻永留人世，而

其靈必陟降臺澎金馬間，一如縉鸞黃鳥之知其所止，亦理所必然。會稽終必來多士，忠直史魚宣聖揚。似語貞元朝野士，留將氣力昌家邦。

劉爲著名世界之計量經濟專家，並爲誨人不倦之教育家。三十六年返國，任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三十七年赴美，任國際貨幣基金經濟專家，兼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教授。四十七年起，任康乃爾大學史密斯講座教授，兼比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暨數量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五十九年起，復兼經濟學系主任，先後作育人才極衆。五十六年六月，政府接受其建議，邀約美一流經濟學家來臺，參加臺灣經濟發展會議，並訪問我國經濟發展實況，對增進美國學術界人士對我之了解與友誼，頗多助益。又建議籌設臺大經濟學博士班，以培育高級經濟研究人才，爲效尤大。而其在賦改會工作完成之年，所建議考選大學研究所畢業生施以稽徵賦稅訓練之成果，則已初步見諸追徵逃漏鉅額稅款方面。

較此尤堪欽敬者，則一爲在其今春去美間，聞其曾建議財經首長應常選邀在國外之財經新秀返國工作。二爲今年八月十二日，亦卽其逝世之前二日，言談雖已喫力，但仍不忘約見加州大學葛倫森教授，面告以訪臺應注意及應討論之事項，極爲詳盡而周到。葛教授來臺之使命，則爲助成劉在國內建議急應實行之要務。蓋自我國退出聯合國後，聯合國所出版之各項統計年報及月報，已不再刊載我國資料，爲使國際人士對我國經濟發展情形有所認識，曾建議仿照聯合國統計年報方式，編印「中華民國英文統計提要」，今年一月已訂定編輯方式，且已徵得若干國際知名經濟學者同意，撰寫「中華民國經濟發展」一書，以學術立場分析我國經濟發展之成功，將來在美出版。劉之一息尙存，猶不忘此事之如何實現，固堪媲美於諸葛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精神；而其重視培育及延攬後起人才之積極態度，實猶在史魚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始有停柩尸

諫之上。至其伉儷於致親友之遺書中，皆望母悲其夫婦之同死，則其所殷望者何在，又盡在不言中矣。

行年八一幾陵谷，弔尹泣劉兩廢觴。為國惜才如惜命，刪詩應有毛宗岡。

五十一年尹仲容病逝日，適值吾家宴請美國駐華新聞處處長夫婦共度夏曆大除夕之時，耗音傳來，余爲落箸而泣，不能進食。本年大中夫婦之同逝，又值余與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同人在臺南及高雄考察賦改方案實施進度之八月十七至十九之時，迭閱日報，驚痛之極，廢宴兩次，急返臺北，冀慰其姊戚思女士於其家。

余生八十一年來，陵谷幾變，已不勝悲，而今年四月初，一身繫天下國家安危之總統蔣公復告崩殂，繼之而至者，大中夫婦又以同殉聞。基於惜才重於惜命之良知良能，雖皆爲文以抒痛，而仍不能不暗自飲泣，是詩之試作，實不得已也。

憶劉在時，嘗言及蜀吳魏三國人才之特多，而其愛飾「羣英會」中公瑾一角動機之一，亦在於此。又想及國人愛閱羅貫中所著之「三國演義」，而其中之文字詩詞，嘗經清康熙年間毛宗岡之修正。毛爲金聖歎門人，故能使此書臻於盡善盡美，成爲名著，我之嗶引，倘荷才如宗岡者不吝斧政，豈僅私幸。至叙劉事繁絮如此者，亦錢大昕於「萬先生傳」中所謂「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可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云爾。

（轉載六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大成雜誌第二十四期）

## 憶海天仙侶

彭 歌

劉大中先生與戢亞昭女士於去歲八月十四日雙雙辭世，轉眼將屆週年，劉氏伉儷生前有神仙眷侶之目，爲友朋豔羨；他們死後乃格外令人悼惜與懷念。

有人說：「物求可以入畫，人求可以入詩。一能入畫則美，能入詩則雅。劉氏伉儷的生與死，真是可以既入畫又入詩的。生死大限，本屬至無可如何之事；過了一年，死亡的震撼感漸漸淡了——從寧靜與沈哀中，有幾句動心的話不能不說。

第一、大中先生一代學人，但他從不以學術上的成就而崖岸自高；待人親切謙和，有守有爲。對國家更是一片精誠，皎然如日月。回想他回國主持賦稅改革之初，正是國際局勢大變之時，多少旅居海外的中國人，對國家大事噤若寒蟬；更有二三無恥之徒，競逐於華府北平道上，尾隨着尼克森、周恩來的節奏而揚塵舞蹈。劉先生則始終堅持着書生報國的凜然大節，爲苦難的祖國奉獻心力。知識分子的志節高下，真有判若雲泥者。在我個人的私念中，劉先生不惟是用他的專長知識爲國家解決了重大問題，他的出處進退，更爲這一代知識分子爭回了莫大榮譽。在一個天下大亂的時代中，「仗義偏多屠狗輩，負心每是讀書人」。有劉先生這一型的讀書人挺身而出，才見得出真知識與真道義的可貴處。

其次、學人從政，有其先天上的困難。有的是專談理論，不務實際；有的是既不能令，亦不受命；或則蜻蜓點水，淺嘗輒止。像大中先生這樣專心壹志，鍥而不舍，發憤把一件工作順利完成的例子並不多。學人也能辦事，這是他特別令人懷念不置的。

第三、他對人生情趣，體會甚深，最後的一場「羣英會」，我有幸作座上觀，那篇「遙想公瑾當年」的大文，我曾幫他斟酌題目；我在「花甲劉郎」的短評中對他扮演的周郎赤壁有讚美、也有批評，事後承他謬許為知言。他那種對藝術的一絲不苟的熱愛，使我深深敬服，一個人能有所成就，確非偶然。

第四、大中先生因癌症而不起，實是國家的損失；而亞昭夫人隨之仰藥，尤有一種壯烈的沈痛。她可以不死，甚至是不應該走這條絕路；然而她畢竟一死殉情——所痛有甚於死者。其事之是非得失，非局外人所能置一辭；因為這已是超乎是非得失以上的大事。此刻回想，這毋寧是從極缺憾中求致極圓滿——在當時是人人認為可傷的事；但在多少年之後，這樣的結束生命反而成爲一種更美的完成。人反正遲早都不免一死，同生同死，說說是容易的，真正作到又能有幾人？我平素不太相信神鬼之說；「未知生，焉知死」，但我猜想，像大中先生伉儷這樣，作完了他們所能作的事，於人間已無所依戀，雙雙而去，他們的靈魂應已無所遺憾了。

（轉載六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聯合報）



## 劉大中先生的治學方法

費景漢

——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劉大中先生伉儷逝世百日紀念會中報告

現在大中和亞昭已經離開我們，過去三個月，在報章雜誌上常可見許多紀念他們兩人的文章，其中寫得最長、最親切的一篇，就是大中的令姐劉咸思女士在聯合報連續發表的文章，題目叫「海天仙侶」，顧名思義，好像說他們已經成仙了。也許在宗教立場上，從這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就是「成仙」；可是，今天我們在紀念他們的時候，就不能想他們是神，而要想他們是人。大中的確是一個很不平凡的人，就像大中的姐姐說的：「他是一個活蹦亂跳的人。」其實，說他活蹦亂跳，就是說，他的個性很強烈，如英文說的有強烈的 *Passion for life*，是一個很喜愛生命、充滿了生命活力和熱情的人。如果我們要談他的治學方法和學術思想，必然要從他的個性去尋找線索，如果這樣的話，一定要知道，他是一個強烈的喜愛生命和富有活動力的人。

過去報章雜誌上又說，大中是一個非常淵博的人，因為看到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和在國劇方面的愛好，所以說他是一個非常淵博的人。其實，用「淵博」兩個字來形容大中，不是非常確切的。譬如以他的生活情趣來說，雖然他在美國住了那麼些年，可是對於美國的一般性的娛樂，像打橋牌、跳舞、打高爾夫球等等，他完全不能欣賞。就是拿最好的百老匯的戲劇、最有名的西洋文學、最好的名山大川讓大中看，他也不大能欣賞。然而中國的玩兒法，如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他也不是很愛好。他所喜歡的就祇一樣：平劇。所以說，他的興趣不是很淵博。

可是他所喜歡的一件事情，就喜歡得很深，很入迷，肯下苦功。拿他的國劇來說，國劇裏講究的

是唱唸、做打。在美國時，他喜歡辯論的一個問題，就是「唱唸」和「做打」那個重要？從心理學來講，學習肌肉的動作遠比學習噪音的動作難得多，所以許多票友只會「唱唸」而不會「做打」，而大中呢，「唱唸」、「做打」全會，並且六場通透，崑弋不擋。可以想見，他從小就迷這個，從小就下過苦功夫練過這個。所以我說，他的個性是能够在一個他所喜愛的部門下苦功，而不願把他的精神分散到許多部門去，這是他的一個主要個性。

談到學問方面，我們知道當代的經濟學有兩個主要的理論部門，就是「總體經濟學」和「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研究經濟的穩定問題；個體經濟學研究市場制度的效率問題。可以說，這兩個重頭理論課程，大中都不是很愛好的。舉兩個例子來說：第一、從他的著作去看，大中進入了學術界以後，差不多十五、六年的樣子，他就發表過十四、五篇主要的論文和兩本書。從數量上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們知道，像寫他那樣的論文，從構想、蒐集材料、計算、到寫出來，起碼要兩年的工夫，而他在十五、六年中，寫出十四、五篇論文和兩本書，可以證明——他畢生一直在苦幹中。可是在這些論文裏却看不見關於總體和個體經濟學的理论。

第二、從他教書的性質上，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大中是一個非常好的教授。舉一個例子，現在在美國最有名的計量經濟學家諾樂夫 (Marc Nerlove) 就是大中的學生，大中是一個口才非常好的教師。可是他並不想教他不擅長教的書，也許大中是在所有康乃爾大學經濟系中教書最少的一個教授。我不知道，他是否教過總體經濟學，我知道他教過一個很短時間的個體經濟學，不過後來他就放棄了。他做事情就要尋找一個完美性 (Desire for perfection)，如果他不能做得「最好」的話，他寧可不教，也可以說，他是一個很要强的人。

說起他的成就，我自然要提到他的計量經濟學。關於計量經濟學，我們知道可以分成兩個主要的

部門，一個是方法的計量經濟學，一個是實用的計量經濟學。主要的成就是在實用的計量經濟學。所謂方法的計量經濟學，是在用的計量經濟學，就是用這種方法來解決實際的問題。所以他的

我們要談大中的成就，必須從兩個角度去看，一個是看過土中個人的環境。從計量經濟學發展史這個角度去看，我們知道，後才興起的方法。在第二次大戰前都是些零星的方法，第二次才散見於報章雜誌，東一篇西一篇，很零碎地發表。我舉兩個例子，一本是金特諾 (Tinbergen) 寫的，一本是克萊恩 (Klein) 寫的一個實際的例子，而不是用抽象的方法講計量經濟學的法則，還談諸談話，我問他：「你爲什麼不多寫一點，讓大家都瞭解一點計寫一點，也許要多寫十大本，才能够把計量經濟學說清楚。」其間，而是說他沒有學問。因爲本來就用不着十大本，要把計量經就可以寫完。

大中大概在三十五歲到四十四歲時，在國際貨幣基金會做事性和體系還沒有充分建立，所以他是在暗中摸索學習，這種功夫麼喫力，才能抓到計量經濟學的大意和綱領。拿我個人來說，學，可是遭遇到困難沒有學成，一直到今天，對於計量經濟學還是意味着誰都學不成。可是我可以完全體會他經過的那一段辛苦

其次，大中在學習計量經濟學的時候，他已經在國際貨幣基

的環境，非常安適，是一個鐵飯碗，又像是吃「海關飯」（至少是從前的「海關飯」），只要按部就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就可以過一個很好的日子。除此以外，像國際貨幣基金會、國際勞工組織，這種國際組織，並不鼓勵人做純理論、純學術的研究，而壓迫你做比較「實際的」工作。可以說，大中在三十五歲到四十四歲在國際貨幣基金會工作的時候，他的環境並不鼓勵他做純學術性的研究工作，可是他沒有向環境低頭，他仍舊一面苦心的鑽研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另一方面把這方法在霍浦金斯 (John's Hopkins) 大學教書 (造就了諾樂夫)。所以大中的確是「富貴不能淫」，他不願祇抱着「樂天知命」的精神，而是願盡全力，把他做人的價值充份發揮出來。我想，他在那個時候的成就，實在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他還沒有出名以前的那段苦功，就是他最大的成就。

我們談他實用計量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大致上可以提出兩個主要的部門：第一、研究美國的經濟穩定問題。這個研究，他是美國研究這方面的創始人和最有成就的人。關於這門學問的功夫，說實話，是一種苦功，是一種很有系統地組織材料的能力，是一種有很大的胸襟把這種材料組織起來夜以繼日的累積知識，他是「這樣的」一個工作者。他在這方面的研究，從「每年的不穩定」研究，進一步研究「每一季的不穩定」研究，到臨死前研究「每一個月的不穩定」。這就是說明他在這種下苦功、組織材料、組織數字的工作上，是越做越深。

他的實用研究的第二個方向，就是美國工業結構的研究。這個問題大致是這樣，因為在一個工業部門，主要的生產因素是勞工和資本。在學術上有一個問題，就是兩個生產因素的取代性。拿白話來說，假如工資不斷的提高，而利率不斷的下降，是不是企業家對這種生產因素的價格有強烈的反應或敏感，於是就以資本來取代勞工，也就是工業對工資變化敏感度的研究。這種研究是他的創舉，是一種實際有用的研究，又是需要一種龐大有組織和苦功的研究。

他在這兩方面的研究，得到什麼樣的成績？大致可以這樣說，也許在全世界、至少在美國於實用計量經濟學方面，他大概不出頭二三人。也就是說，他在三十五歲至四十四歲下的那番苦功，終於得到學術界的承認。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可是他的確曾下過那番苦功，得到所應得的報酬和重視。

關於他的計量經濟學方法論的貢獻，我必須提出一本書來，就是由大中的學生諾樂夫（就是剛才我提到的今日美國最有希望的計量經濟學家）編輯的一本書，收集了二十二篇論文，是在過去三十年來對計量經濟學最有影響的二十二篇論文，其中有一篇是大中的論文，這也許是大中在學術界最能夠得到長期影響的一篇論文。因為在實用的經濟學方面，如果時過境遷、問題改變時，人家就會把實用的論文忘記，可是純方法論抽象的論文是可以讓我們永久懷念他。於是我就向于宗先兄借用這本書，在過去幾個晚上看，雖不能說，「開卷有益，面對古人」，至少可以說：「開卷有益，音容宛在」，還可以看到他說話的樣子。然後默默的讀他的書，知道這篇論文是他留給後世學者最重大的影響。

這篇論文核心思想有關於計量經濟學主流的所謂「認定的問題」。談到他的貢獻是什麼？可以打一個譬喻來說，到森林裏面看見兩種動物，譬如狐狸和兔子，我們要研究狐狸和兔子的入口（或者說「狐口」和「兔口」）。第一點，我們必須有一個理論，假如說，狐狸的數目太多，兔子就要減少，因為狐狸把兔子給吃了；如果兔子的數字減低，狐狸的數字也要減低，因為狐狸就沒有糧食了，於是兔子又可以繁殖。從這兩個關係上，我們看出，經濟學的現象，常常是互為因果的。從數學方法說，就是一個聯立方程式的現象。聯立方程式實在是社會科學、經濟理論主要的一個特質。聯立的現象之中，又有所謂數量化的傾向，拿物理來說，譬如增加熱度，金屬就會膨脹，有一個膨脹係數。在計量經濟學也有所謂各色各樣的係數。拿前例來說，狐狸一天可以捕捉多少兔子，是狐狸的「生產係數」；要維持狐狸的生命，一天必須吃幾隻兔子，是狐狸的「消費係數」。瞭解這個數量化的傾向，我們

才能瞭解什麼是計量經濟學，什麼是大中的貢獻。

計量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是，如何估計這些係數。在自然科學有試驗的可能，以試驗的方法來求得係數，可是在社會科學往往沒有試驗的可能，必須用觀察來間接測定那些係數，這個問題就變成計量經濟學的核心。雖然，我們知道大中在臺北時也許看見他各方面的活動，可是在他內心中數十年如一日的活動，就是活動在那種「天地」裏，那種「乾坤」之中，如果他在別的方面受到挫折，能夠讓他重新得到力量的，就是回到他的計量經濟學方法論的世界裏。

談起大中論文的貢獻，還須談到經濟學另外兩個特質，就是所謂內在變數和外在變數的區別。拿我剛才舉的例子來說，狐狸跟兔子的人口不但受生產和消費係數的影響，也許要受到很多外在變數的影響，譬如說獵人數目或雨量，這些都不是一個理論本身所要解決的現象，但能夠影響本理論研究的現象，這些都是外在的變數，而在經濟學裏實在充滿了這些外在變數，這些外在變數常是些或然的現象。瞭解這一個問題的時候，就可以瞭解大中這篇論文所謂認定性的問題。

所謂認定性的問題，就是說，假如外在的那些變數很多，所謂多少係針對內在的係數而言（例如剛剛所說的生產函數和消費函數共有兩個），如果外在變數太多，因而不能計算那些係數，研究這個問題就是他在學術上基本的貢獻。在他的書上舉例告訴我們說：影響投資的也許有十七、八個變數，可是某某經濟學家只用了六、七個變數，實在如果用了許多外在的變數，就不能夠計算或認定那些常數。在這種情況下，甚麼是比較合理的計量經濟學的方法。這就是他在後世留名的主要貢獻。

我們現在談這些大經濟學家時，也許要問：「他能不能在將來的世界歷史上留名？」我們要問這個問題時，只有針對很大的經濟學家才能問這個問題。因為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我們還能記得幾個呢？我想這個問題對大中個人的成就不是要緊的，而主要是在過去三十年所提出的計量經濟學前途的問

題。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譬如當代最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 (Keynes)，在他死前就說過：「世界將來是要被計量經濟學統治的」，極端推崇計量經濟學。而同時和凱恩斯引起辯論的，上週到我國來的海耶克 (Hayek) 教授就對計量經濟學的前途沒有什麼信心。所以我們知道，大中在將來學術和歷史上的地位，可以這樣說，只要現在所發展的計量經濟學的外型可以保持住，仍然產生他所觀察到的那些問題，他的名字就會永遠留在歷史上。這就是我們應該記住他的貢獻的核心。

大中另一方面的貢獻，就是所謂中國大陸經濟學。從這個經濟學上我們知道，又是一種苦功，就是有能力來組織很多的數字，來計算中國大陸的國民所得。在這工作上，大中無疑是個美國研究大陸經濟學的領導人物。

最後，我要說大中的個性，因為在研究計量經濟學的小世界裏日子一久，常常會使大經濟學家喪失興趣，譬如說：上個月在美國得到諾貝爾獎金的古柏曼 (Koopmans) 就是把計量經濟學整理起來的一位名家，古柏曼在最近七、八年對計量經濟學完全喪失興趣。因為對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論方面，活動的餘地比較小，所以大中後來這幾年和許多經濟學家一樣越來越把很多精力放到研究計量經濟學以外的地方。就我們所熟悉的，如返國參加政府的工作，和最後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聘請去當校長。這一件事又一次說明，他實在不甘於讓他自己發展受到限制，而是要用各式各樣辦法把他的潛在能力完全發揮出來，這就是他的基本個性。

他在學術界以外的活動，在康乃爾大學時做過系主任和很好的教員。康乃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是很好的學校，在第二次大戰以後，學校有一點落伍，就是因為有些保守的教員不注重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結果。後來大中加入康乃爾以後，他在康乃爾是一朵牡丹花。許多大學要把大學建立起來，須要先找出大的經濟學家，就是找一朵牡丹花，然後把許多別的大學的好經濟學家吸引過來。

大中從國際貨幣基金會加入康乃爾時，就是一朵牡丹花。由於他的加入康乃爾，果然，過了幾年，康乃爾又變成一個在美國有名的學府。學校爲酬答他的功德，就給他一個「講座教授」，是學校最高的榮譽。大中是康乃爾好幾千個教員之中，薪水和榮譽都是最高的教員。

最後我們紀念大中，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很富於感情的人，也許他對人有時有一種所謂大氣磅礴的大將之風；可是，我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容易受傷、感情非常衝動的人。有一次，他在家裏養一條狗，康乃爾大學在綺色佳，所以把他的狗叫「綺色佳」，後來「綺色佳」得心臟病，必須讓獸醫給牠處死。有一天，大中帶着狗最後一次去看獸醫，狗一直喘氣，那時，我看見大中手摸着狗頭，流下眼淚，讓我看到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大中，原來他是感情非常豐富的人。所以，我們要紀念大中時，應當紀念他是一個願把自己做人的個性充份發揮出來的人，一個感情非常豐富的人，一個苦行的學者，是西洋經濟學傳到中國以後，第一個在國際上出名的經濟學家。

(劉芳濤紀錄)



## 永懷「國劇摯友」劉大中博士

黃 漢

——為追念劉大中博士夫婦逝世一週年而作

已經快一年了，在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的國劇廳內，還有人不時談起大中先生和他的夫人亞昭女士，昔年坐在國劇廳內看戲時的音容笑貌，以及他為致力振興國劇所掬獻的光與熱。

劉大中先生熱愛國劇近五十年，他是一位在國劇藝術上造詣極高的資深票友，很多人都知道他不僅擅唱小生，也精通武生和老生戲，更撫得一手好胡琴，說他是位全能票友，真是一點也不過譽。因為他太喜愛國劇，所以在治學和從公之餘，就把唱戲和聽戲，作為他調劑緊張生活、恢復身心疲勞的唯一公餘活動，而我和大中先生從結識到相交，多少也和「有志一同」有些關聯。猶記大中先生於民國五十七年應政府禮聘，回國主持賦稅改革工作之際，他在國內居留的兩年時間內，幾乎是從早到晚、永無休止的工作，那時我正兼作他的發言人，接觸的機會很多。我發現唯一能夠讓他稍獲輕鬆的時間，就是他和亞昭夫人，相偕坐在當時的今日公司麒麟國劇院，和國藝中心國劇廳看戲的時候。以後幾年他重返康乃爾大學執教，每年寒暑假應邀返國時，還是一樣的忙個不停，但總會忙裏偷閒，不忘看戲。

大中先生看戲時，永遠表現出最好的風度，和一種平易近人的書生本色。他進場從來很少遲於開戲時間，且不管戲演得好壞，一定從頭到尾看完，直到謝幕後才走。演員凡是有出色的表演時，必定鼓掌讚美，偶有錯失，也從不批評指摘，即使聽到旁人有所批評時，他也常會用寬容的口吻代為解釋，真是一位最忠實的「國劇之友」。他常喜歡在散戲後，偕同夫人到後臺走走，一則與相識者握手言

歡，同時也把親切的勉勵與指導，帶給表現好、有前途的新秀。因此在國劇圈中，成年的演員，多把他看作是位知音的好友；年青一輩的，則尊崇他是位深具愛心的長輩和良師，而頗多和他結爲忘年之交，像姜竹華、楊蓮英……等人都是。

大中先生古道熱腸，對推動振興國劇的工作從不後人，貢獻至偉。他對年青一輩的國劇演員，鼓勵和指導之外，更竭盡所能的給予照拂和提攜。國劇團兩度訪美，大中先生提供最精誠的助力，組團期間，他提出最切實際的建設性意見，劇團在美訪問演出時期，更盡其所能的給以協助和照拂。對於年青一輩的團員，每視同子弟一般的愛護，這種發自精誠的愛心與熱忱，是每一位團員永遠不能忘懷的。

去歲大中先生在美撙疾臥病的消息傳到國內後，與他相交的國劇界朋友，不管老少，莫不流露着深深的關切，並慶祝他早日康復。不意八月十七日，竟傳來這一雙志同道合、相愛彌堅的海天仙侶，雙雙撒手塵寰的消息，這是多麼令人震驚而沈痛的事。這一突然而來的不幸消息，使得和大中先生相交甚深的部份國劇界朋友，簡直不敢相信真有其事。他們在爭相探詢時，無不搖頭嘆息，惋惜國家喪失一位最忠誠的鬥士，學術文化界喪失一位最權威的學者，國劇界從此失去一位最精誠、最有助力的友人。八月廿六日，各界人士在臺北市新生南路懷恩堂，爲大中先生和亞昭女士舉行追思禮拜，以悼念這位國內外知名的學人。國劇界的部份友好如哈元章、周正榮等人也趕來參加。宗教儀式結束後，在場的劉泰英、徐育珠、于宗先、鄭有儀諸兄倡議爲大中先生籌募文化學術紀念基金，俾使他的精神和志業長昭於後世。這一芻議立即獲得大家的贊助，都願竭盡棉薄，共襄其事，並懇望舉辦一次國劇聯演，用整體的心力，來紀念這位令人敬愛的學人。

聯演的籌劃和準備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各方都給以充分的合作與支持，個中最有力的應該是王

上將化行先生，他是大中先生先前的知友，不僅深敬大中先生的學術事功，和在贊襄國家財經大計上所作的宏偉貢獻，更尊崇他在熱愛國劇、進而大力推動振興國劇工作上，所表現的一股盡其在我的精神。王將軍以爲大中先生的忠愛國家，必定與他的熱愛國劇有密切的關聯，因爲國劇中所扮演的，儘多是忠臣孝子、大義凜然的事蹟。

在王主任的全力支持下，軍中各國劇隊、校、班，對於三場聯演無不各盡全力，有關戲碼的安排，和演員的調配，都在充分合作中解決。在戲碼安排上，我們選擇劉先生畢生最喜愛、也是他最擅長的戲，像羣英會、得意緣、奇雙會等都是。特別是羣英會一戲，大中先生曾於六十三年七月在國藝中心登臺彩鑾過，這次選擇這齣戲，並擺在第一場演出，自然具有深長的紀念意義。同時也深體劉先生生前喜見新秀出頭的願望，把三軍國劇校班的新秀精英際會在一起，合演十二「五花洞」，這樣的安排恰和劉先生當年登臺時的戲碼完全一樣。所不同者是像大鵬劇校的七科新秀王鳳雲等人，在劉先生演戲時，尙都在校學藝，去歲則已崛起菊壇，成爲最有希望的新秀，雖然劉先生未能親睹她們的出色表現，但他一直樂見多出新人的願望，畢竟是達到了。

籌募「劉大中博士教育文化紀念基金」的三場聯演戲，於六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起，一連三晚在國軍文藝中心舉行，感謝新聞界給予最有力的宣揚，雖然三晚都逢大雨，但各界人士支持與協助的熱情却毫不稍減，特別是參加演出和支援演出的所有前後臺人員，都表現出最高熱忱，獻出最好的技藝，使演出獲致理想的績效。這種當仁不讓的精神，劉先生天國有知，必感無限欣慰。

三場聯演所得，於支付必要的費用外，都早經繳交「劉大中先生教育文化紀念基金董事會」，基金會就將伊同另外籌募的款項，研訂辦法，作爲獎助在文化學術上，有優良成就或表現者之用，其中各國劇校班的優秀學生也將得到澤惠。

大中先生和亞昭夫人離開我們就將屆滿一年了，多少人都不時興起無盡的追思與懷念，這裏面自然包括國劇界的朋友們，他們唯一可以告慰劉先生於天國的，是他生前喜愛的國劇，在正確領導、熱心人士的策助，以及從業人員的努力下，仍在繼續不斷的求發展。一年以來，有新戲上演，也有新人出頭，這些自都作爲一位戲迷博士，並曾盡瘁國劇五十年的大中先生，在天國中樂於知道的事。

## 劉大中先生與美國票壇

鄒韋澄

說起來也許你不相信，被稱爲國劇的京戲，在大陸上由盛行到被摧毀，也不過百來年的壽命；可是在遙遠的美國，除了梅蘭芳訪問演出不算外，單講在美國土生土長，前後算來，倒也有三十六年的悠久歷史了。當然，美國從來沒有過長川的內行戲班，這裏所談的，是指票友們對國劇的活動而言。它從少數幾位先進的倡導，和繼起者不斷努力，慘淡經營，三十幾年來，現在已劇社林立，蔚爲大觀，稱得起是海外的一支國劇勁旅，爲整個劇壇放一異彩，而劉大中先生可算是美國票壇的拓荒者！有人說：「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中國文化」，真是一點不錯！

### 在美最初演出的兩臺票友戲

那是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的事，地點是康乃爾大學，現在還服務於聯合國的趙世輝君（前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先生哲嗣）與當代經濟學權威名教授劉大中二人，那時他倆還是該校研究院的同學，爲了響應祖國抗戰，籌款救濟難胞，臨時結合了幾位同好，在是年十二月開始演出了在美國的第一臺票友戲，劇目是「坐宮」和「羣英會」，中間插入了一齣英文的「打漁殺家」。當時人數既不够，戲裏應用的東西，更是一無所有，頭上戴的、身上穿的、以及應用道具，除了自己能做的，都由趙世輝夫人慕蘭女士，漿漿洗洗、縫縫聯聯不分晝夜地趕製外，其餘向紐約博物館情商借得幾件古裝衣服，才算湊合解決了行頭問題。最苦的是文武場面，只有另一同學時之俊君，稍能拉兩下胡琴權充文場，而精通武場的，除了當時在紐約中國銀行服務的盧毅侯君一人以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位了。萬般無

奈，只有遠道將盧君請來，將大鑼掛起，鐃鉞放在桌上，由盧君一人打小鼓，再兼管大鑼鐃鉞。這份能耐，就是內行打鼓看了，亦將要自嘆不如！打場面的人算是這樣解決了，可是沒有響器，亦是枉然！這玩意就是自己做亦不管用啊，真是天無絕人之路，他們居然在一家外國人的古董舖裏，找到了他們勉強可用的東西，總算又解決了一個困難問題，但是，出臺的角色方面呢？

「坐宮」連丫環才三個人，已有人擔任，不成問題。可是「羣英會」問題就大了，這齣戲至少亦得十幾個才行，現在只有劉大中與趙世輝二人，說什麼也搞不起來啊。幸而又在同學裏找到了一位李君，扮演劇中魯肅，可是這位李君只會唱一段「空城計」裏的「兩國交鋒龍虎鬥」，要現學別的，怎麼都來不及，於是沒辦法，祇好讓「羣英會」裏的魯肅，就唱「空城計」孔明的唱詞罷。最苦惱的是，這樣一齣大戲，一共只有三人，隨便摘取其中那一段演，是無法精采的，於是他們耍了一手絕招，好在劉大中樣樣都拿得起來，就由他扮演劇中「黃蓋」，加了一場「趟馬」，外帶耍了一路棍，於是躲在幕後的盧毅侯就打打敲敲，臺上亦蹦蹦跳跳，居然把這臺戲弄得有聲有色，熱熱鬧鬧，得到觀眾不斷的掌聲。最妙的是，京戲裏角色在坐的時候，遇到突發事件時，例必稍起身再馬上坐下，以示驚慌，同時場面上亦必有大鑼一擊，配合音響效果。那天趙世輝的劇中「周瑜」，亦有這一下，當他起身再坐下時，「匡」的一聲，引起外國觀眾大笑，以為他屁股上有特別裝置，才能轟然一響。其實這是盧毅侯技術高明，一鑼打個正着，天衣無縫，好像這聲音發自趙君身上。據說這臺戲，還真的募得不少錢寄回中國，作為抗日經費。

在這次演出後的第二年（一九三九）二月，他們又在巴鐵麻福建同鄉會晚會上演過一次「秦瓊賣馬」，情形比上次更慘。一百另一位的本要幕後場面，還是盧毅侯一人，祇操琴的換了蔡國英教授。臺上演出的，却只有飾秦瓊的劉大中一個光桿，操琴的蔡國英教授還得穿上店家衣服，在秦瓊不唱之

時出場與秦瓊搭話，秦瓊要唱時又溜回幕後去拉，這樣來回折騰，真是够他受的。

別看這兩臺戲，因陋就簡，但意義却非常重大。第一、引起了中外人士對國劇的注意與興趣，尤其在「羣英會」裏，雖僅三人，却有遷就現狀的適當安排，將國劇裏的歌唱、舞蹈、音樂，甚至臉譜，都作了簡單的介紹，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聰明的辦法。第二、消息傳播，使散居各地的同好，見獵心喜，紛起倣效，很自然地漸通聲氣，相互結合，由散漫而結成集團，由集團而形成力量。今天美國票壇，有如此光華燦爛的景象，你能說不是他們當初播下了這顆種子的成果嗎？

劉大中、盧毅侯、趙世輝三位真是不折不扣可以算得上國劇在美國的開山祖師，將來配享「精忠廟」我說亦是應該。下面的那闕「滿庭芳」，是趙世輝爲紀念他們在美國開創國劇三十週年而作，照錄於後，亦可作爲將來票壇文獻：

湖上秋高，山頭葉老，故人閒話當年。良辰美景，把袂續前歡。難得情同管鮑，鬢霜濃，彌久彌堅。蒼松質，悠游丹戟，睥睨傲前賢。殊鄉同浪跡，舊鷗今雨，歌倒狂瀾。菊壇稱韻事，吾輩獨先。回首錦茵繡幔，平添了無限縈牽。重陽近，黃橙紫蟹，杯酒共盤桓。

### 成立最早的票社——國劇雅集

美國的正式票社，成立得最早的，要算是「國劇雅集」。它是由崑曲名宿項馨吾、蔣中一教授以及名琴票卓孚來先生等發起組織的，並得到過去金融業鉅子王孟鍾先生的贊助與支持。（按：王孟老者年碩德，對國劇向來愛護備至，提倡不遺餘力，本身在年輕時，亦常與夏山樓主韓慎先等交游，故對譚派亦深有研究，當年齊如山先生所辦之「國劇傳習所」，他是實際出資的贊助人之一。已故名票趙培鑫之由馬派改習余派，亦完全出諸他的鼓勵與支持，他現在還是「國劇雅集」的名譽會長。）「雅

集」於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二）十二月在紐約成立，到四十二年始假座紐約復敦大學禮堂作首次公演，戲碼是「汾河灣」「奇雙會」兩齣，選擇這兩齣戲的原因，是爲了行頭方面比較簡單。但即使如此，全部做起來也煞費苦心了。擺場及旦角的行頭需要繡花的，儘可能用繡花被面來改製，生角用的蟒、官衣、馬褂等，大家都用手畫。別小看這些手畫的行頭，其中還有名畫家王季遷先生的大手筆在內呢。頭上帶的，且角方面還好辦，其他角色的東西，就得紮的紮、糊的糊，倒也弄得似模似樣，脚上穿的薄底不成問題，厚底靴就只好拿高統橡膠雨鞋，塗上白底爲代替，粗看倒也還充得過去。至於演員方面，陣容之強，就比最早的兩臺戲大不相同了。除了劉大中、趙世輝、盧毅侯三位開山祖師，當然有份，又加上了過去在票壇上已早享盛譽的名票如蕭明、何靈琰、杜天鄉、程維菊等，文武場方面，亦一應俱全，不再像最早時僅盧毅侯一人了。最妙的是「汾河灣」裏劉大中的薛禮出場，頭上光耀奪目，好像裝了電燈一樣，當時滿場驚異，細看之下，原來那時因沒有鞭帽，改戴風帽，而前面「眞容」（南方叫面牌）上的大絨球，在美國沒處可買，就拿聖誕樹上的大玻璃泡穿上，所以閃閃生光，他臺風本來就好，經此一來更博得滿堂彩聲。其實眞的在頭上裝一乾電燈，亦並非毫無根據，五十年前小達子（即李少春之父李桂春）在頭本「狸貓換太子」裏陳琳出場，不就是這樣嗎？

據圈內人告，那天情況之熱烈，得未曾見，有不少觀眾還熱淚盈眶。當然，絕不是爲了戲演得好而哭，完全是因爲觀眾多年離鄉背井，飄泊異域，一旦在翠帷繡幕間，重見漢家威儀，傳統文化，引起祖國的懷念，而流出了興奮與激動的熱情之淚。

這臺戲雖然服裝方面，還在簡陋階段，可是演員們都是票壇頂尖兒的人物，即使放在國內來講，亦該屬於第一流的演出，所以從此引起了觀眾的信心，進而熱心支持，以後即正式置辦行頭，藝事方面更精益求精，演出次數亦年增無已，盛況迄今勿衰。



## 票友第一人——劉大中

劉大可在學術界是位名學者，在票界又是位能拉能打、允文允武、六場通透的奇才。他生長北平，幼時即從伶界諸名宿游，本工是小生，更對余派老生、楊派武生有深切研究，奇就奇在這裏。名教授楊聯陞先生對國劇亦深有研究，他與筆者論藝時，就盛讚他為國內外教授圈裏的票友第一人。我認為這樣推許，還有點委曲他。根據筆者見聞所及，我認為本工小生，又兼擅余派老生及楊派武生，且博而能精者，還未見有過第二人，所以我認為置諸全體票友中，也屬第一人無疑。這並非筆者妄加溢美，俗語說：「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從他在「八大錘」中的陸文龍，你就可見出他的腰腿功夫，而又如何的凝煉邊式，相信內行的讀者，憑此一斑，就可知全豹的他真能吃幾碗飯了（梨園行說真能吃幾碗飯，就是真有兩下子的意思）。本來麼，舞臺上的玩意兒，有的說得天花亂墜，到了臺上就一無是處多的是，所以光憑嘴說是不行的，必定要到臺上，才見真章。筆者曾親見他在一旅美一和胡鴻燕的「頭二本虹霓關」，快槍的乾淨利落，槍架子的美觀大方，確實內行中亦不多見。普通小生演王伯黨，十九帶有脂粉氣，看起來總有軟的感覺，而他則另有英俊挺拔之氣，那就是他兼擅楊派武生戲的好處了。聽說本年秋季他又將在「雅集」演出小樓名劇「全本連環套」，屆時五把椅、亮鑲、拜山諸節的小樓絕活，當重現紅氍毹上，又不知要風靡多少戲迷呢！

另外比地票社，演員方面雖亦時常互通有無，但各該社的挑樑支柱，為了撐持自己的門面，很少有到他社演出的，只有他藝孚衆望，常被四大票社（即國劇雅集、業餘平劇研究社、中國平劇學會、和旅美國劇聯誼會）輪流邀請，這點又可見他地位之超然了。

（節錄六十三年七月明報月刊第九卷第七期）

# 桌邊心語

劉威思

——告慰大中之在天之靈

多少次，心裏一有問題，我就會想：等你回來，我一定要搞個清楚，問個明白，以解我心中的疑團。可是，不消一刻，我就被一聲驚雷嚇醒：「到那裏去問他？他還會回來嗎？」

我想問你的事情很多，但全不是有關經濟的。一個家族裏能生出一個有經濟頭腦的子孫也就够了。你的姐不僅沒有經濟「頭腦」，而且有經濟「頭痛」。一遇到有關經濟的問題，越繞越糊塗，越想越頭痛。我常認爲：「雙親對我倆後天的教養，非常公平，但先天的孕育，却太過偏心。」你聽了，一定笑容可掬的，又搖頭，又點頭。就像有幾次，我告訴你的朋友說，你擅長辭令，能把死人給說活回來（樂活的）；我則正好相反，能把活人給說死過去（氣死的）。你那又得意、又不好意思的樣子，還是和我們坐在故都故居東廂那張八仙桌旁，面對面談心時，同樣可愛。那時雖然總是你說話的時候多，至少我也跟着笑一笑，或是插上一兩個字，總還可稱得上是雙簧或相聲。現在，我憋足了快一年的悄悄話，要對你說，要對你說，你能不讓我一個人自彈自拉自唱嗎？和你談天，我用不着多加思索。一來因爲我不怕你生氣，二來因爲我知道你決不會生我的氣：你很清楚，好話經過你姐的嘴都是不中聽的。好，現在讓我想起什麼就說什麼吧。

\*

\*

\*

\*

\*

一九七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賽門·顧志耐博士夫婦，於今年四月七日來到我國訪問。

顧志耐博士說，他是應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邀請，將蒐集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力資源運用的有關資料，與其他中外學者合撰「中華民國經濟發展」一書。

以上的新聞報導，使我想起去年在你倆的追思禮拜上，張繼正先生說的：「……劉大中先生在兩次開刀前後，仍不斷與此間通信，商討有關撰寫『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專書事宜。最後一封信是八月八日所寫，信中對於葛倫森教授應邀來臺商討如何籌備寫書，我方應注意和準備之事項，一一提及。葛倫森教授八月十七日到臺，據告在八月十二日，即去世的前二日，劉先生身體已很虛弱，說話亦已感困難，但還約他去談話，面告他訪臺應注意和討論的事項，極為周詳。葛倫森教授可能是劉先生去世前所接見的最後一人，而寫『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專書這件事，亦是劉先生最後的心願。」我在此又引述張先生這段話，是要讓你安心。你雖然已經走了，你的這點心願——使國際人士對我國多年來之經濟建設有更深入的認識——自有你的好友們接着來完成，你儘可以在天堂過着毫無憂慮、毫無痛苦、毫不緊張的生活。

你知道嗎？六十四年中華民國英文統計年鑑已經出版了。我現在將周宏濤先生序文裏的幾段，唸給你聽：

「……六十四年八月逝世的美國康乃爾大學經濟系高登文·史密斯講座教授劉大中博士，曾建議政府籌備出版英文統計年鑑，以使別國關心中華民國經濟發展成就之學者，尤其是從事國際比較研究之人士，可以得一方便、可靠而包羅廣博的統計資料來源。」

「政府立即接受他的建議，並請他於六十四年一月來臺，協助策劃。他在該年二月返美之前，以他充沛的精力、卓越的領導，組織了一羣學者，進行此項計畫。若不是由於他的大力推動，這計畫決

不能進行得如此快速，且有如此豐富之成果。因此，謹將本書題獻給劉博士……」

聽到周先生這麼推崇你，又看到這本年鑑可以作為將來出版「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專書的資料來源時，看你，又慚愧又欣慰起來了。忍着點，忍着點，不要讓眼淚掉下來啊！

\*

\*

\*

\*

\*

今年五月中旬報上有一篇標題「政府借重經濟學者意見，制訂未來經濟建設藍圖」的報導中說：「……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中研院六院士劉大中、蔣碩傑、費景漢、鄒至莊、顧應昌、邢慕寰在參加臺灣經濟問題座談會後，曾向政府提出『今後臺灣財經政策的研討』建議，並公開發表，頗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

另有一段新聞「中研院定期召開經濟發展研討會」中說：「中央研究院決定，八月初在南港召開臺灣經濟發展方向及策略研討會，會期兩天。中研院表示，今年元月臺灣人口與經濟發展會議結束後，行政院財經五人小組曾商請該院財經方面院士蔣碩傑、費景漢、鄒至莊、顧應昌、邢慕寰等五位，於今夏院士會議結束後留在國內數週，為臺灣經濟發展計畫提供意見。……」

「根據中研院的消息，決定參加這項會議的，除劉大中博士已逝世外，包括其他五位院士及國內外財經方面的專家學者。」

這些新聞，尤其是「除劉大中博士已逝世外」，對於我是千萬把匕首；對於你，却是無上的安慰。你自己也知道，你的忽然羽化登仙而去，對國家並沒有太大的損失；學術界和政府中你的好友，以及很多位青年才俊，一定做得比有你的時候還要好，對國家的貢獻也會更大。我相信，在開會期間，你在天之靈，一定會凌虛御風，雲遊會場，俯視你的好友們在絞腦汁，很想參加一點意見吧！祇可

憐，也可嘆，你現在已心餘力拙，無法貢獻於國家了！

\*

\*

\*

\*

\*

前些日子接到張耀東先生來信：「……財政部稽核組刻有六十名稽核人員，地區稽核組也將擴編到總員額（四個組加起來）將近一百名。這些人在精神上均是劉先生的學生，一定會就他過去所要求的工作精神及標準保持不變。所以大姐，您要記住，稽核組這裏您還有將近一百六十名奮發有為年青的小弟弟爲財稅問題而奮鬥中。我們在精神上也永遠把您視爲我們的「大姐姐」。這麽親切的詞句是從一位我還素昧平生的先生寫來的，你該爲你的工作精神、待人接物的誠懇態度感到安慰，而我又該如何感謝這位尙未謀面的張先生，以及這些奮發有爲的青年啊！」

\*

\*

\*

\*

\*

轉眼將屆你們的週年（八月十四日），此間友好，又擬爲你們開一個紀念會，聽說還要再爲你們出一本紀念冊，登載上次追思錄上沒有來得及刊出的文章。鄭有儀、許東方等先生又要於繁重的公務之外，再度爲你們忙碌了。你們在遺囑上曾經寫着千萬不要驚動朋友，並不是看輕友情，而是怕麻煩他們。可曾料到，你們這麼驟然而逝，悄然而去，留給你們好友的，除了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麻煩事情之外，精神是如何沮喪，心靈是如何悲痛嗎？

自你們走後，你我雙方的好友給我的安慰和幫助，且不必說。許多位素昧平生的人，也寫信或打電話來致唁。以前見過、不太熟諳的朋友，現在對我都非常親切。我很感激他們的「愛屋及烏」。我們這個自由世界真太可愛、太可留戀了。你們爲什麼要離開得這麼倉促、這麼早？爲什麼不再多多享

受一下這美麗可愛的世界上、濃得化不開、讓人從心底感到熱烘烘的友情呢？

二

亞昭最後一封信上說：「可憐大中仍有些工作未能完成。他要整理自己所出的文集，又想寫自傳，都來不及了。……」

她這些話深深刺痛我。誰也沒有料到你的生命會這麼短促。即使在已知得病之初，你自己仍以爲一定還有幾年可活？連我也都認爲如此。果真那樣，你就可以完成你的心願。誰知「化學治療」會這麼快就奪走了你！除了歸諸天命，還有什麼話可以解釋呢？

現在可以告慰你的是：你發表在各學術雜誌上有關經濟方面、以英文寫的論文，都已由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長于宗先先生整理完竣，彙編成集，已在七月底印行問世。

「……仍有些工作未能完成……」大約總是你對祖國經濟方面的工作，前面已經說過：你的這個心願和未完成的工作，自有你的友好和青年才俊接着完成，而且一定會比你做得更完善，你也儘可放心。

唯一可憾的是你的「自傳」。你雖學的土木工程，又改學經濟。你的中文根柢却還不錯。假如真能由你寫你自己的事，一定會比你寫周瑜的事更生動引人。但誰也沒有想到你會走得這麼倉促，給你自己和我，以及友好們來了個措手不及。爲你寫傳的這個重擔，自然而然就落在我的肩頭。前面已經說過，我不僅沒有絲毫經濟頭腦，而且還有經濟頭痛。你能稍有貢獻於國家，完全在你學了經濟之後，即使能有資料，我也不敢下筆：一字之差，謬以千里。我所能寫的祇有你從幼年到出國前的那一階段，你一生中最平凡的那個階段：上學讀書，回家溫課，吃飯睡覺，外帶聽平劇、看電影、吃館子、

逛公園。這麼刻板、平凡、安樂的流水賬，叫我怎麼寫得出讓人看了不膩煩的東西來？我們有幸生在一一個自由自主國家的承平盛世，從來沒有像居禮夫人那樣過過一天憂心忡忡、被壓迫民族的生活；我們更有幸生在一個中產階層的家庭。雖僅中產，但因物價低廉，我們從來沒有像居禮夫人那樣過過一天愁吃愁穿、困苦飢餓的日子。要想去描述一個在這麼安逸平凡生活中茁長的平凡人物，一定是一件很難做到令人滿意的工作，我實在膽怯得不敢負起這個責任。但是張佛老（佛子先生），在他「一燈小記」中的「海天仙侶」拾遺」內，開始時曾說：

「劉大中先生今年一月最後一次返國，在天廚邀宴，給我介紹他的姐姐劉咸思女士：『我的姐姐也是作家。』劉女士笑責其『亂說』。（你本來就是亂說嘛！）不料我讀劉女士的第一篇作品，竟是哀悼她的這位唯一愛弟之文——『海天仙侶』。……」

佛老在最後一段又說：「大中先生是一個大天才。他學土木工程得到康乃爾大學碩士，改行學經濟，……三年即得博士，終成經濟權威。我想，假如他專攻藝術文學，也必然可以大成。他的品德也完滿無缺。求學有成不負父母之望，……他同姐姐的友于之愛，至深至篤。他對朋友，真如史稱：『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他的學問事功，自應有專家紀述。而他的多采多姿、富於情趣的生活，也應該留下更多的紀錄。這一工作，只有劉女士才能做好，古人謂：『情能生文，文能生情。』以劉女士對愛弟之情，與善於表達之文，必能彌補大中先生要寫自傳而未能的遺憾。」

佛老的鼓勵使我惶恐之至。你一定知道你的姐是多麼疏懶。近十幾年來，我幾乎沒寫一個字，所以才會使佛老讀到我第一篇作品竟就是哀悼你的文字，多慘！也正可以證明我是多懶。你一定更知道，你的姐，腦拙、心拙、眼拙、口拙、筆更拙（完全和你相反）。而且做任何事全憑自己的興趣，尤其是寫作，興趣之外，還得加上靈感。本來就無才的我，早已「劉姐才盡」。「海天仙侶」是在既無

興趣、又無靈感的情形下，硬掙出來的，何曾能够表達我滿腔悲痛於萬一。不過，無論如何，我要竭力來完成你的心願，不管寫得壞到如何令人不忍卒讀。因爲，假如我不能把你這段最平凡的生活寫出來、寫完成，便無顏去請求你的好友們把你出國以後的種種，以及幾次回國的工作詳情——你一生中貢獻最多的階段（你如不是走得這麼早，可能還有更多的貢獻）——爲你作一個完整的紀錄。我不拋出這塊磚，那有膽量去引來許多「寶玉」呢！

但有一點，我要先在此向你告個罪：由於你的突然仙逝，使我對任何事情都不敢寄望於「明天」。萬一我也像你一樣，忽然消失，未能完成你的心願，還請你原諒則個！

### 三

在臺灣和美國兩地的友好，都爲你成立了獎學基金會，降情厚誼，實在可感。在臺灣的獎學金，我希望能分一名給交通大學。因爲一來，交大是你的母校；二來，在民國初年至十幾年之間，北平、唐山、上海三所交大尙未合併、也未改隸於教育部之時，父親在交通部主管這三所交通大學一切事項。這由父親的「交遊日錄」裏，經常和上海交大的唐蔚芝太老師書信往還，可以猜到就是商討校務問題。憑著畢業生的成績，選派優秀學生分發各交通機構服務，或出國進修，當年父親培育出來的青年才俊，早都已是交通界知名的前輩了。（我最記得，在你得到交通部官費之後，唐太老師寫給父親的信：「……此乃賢弟十餘年培育交通人才應得之酬。……」）何況父親自己也曾就讀交通大學前身的南洋公學，後來又和二舅、四舅擔任北平交大的教授。你和你姐夫都畢業於唐山交大，更不必說。祇有我，高中畢業那年，北平交大還未招收女生，又因那時北伐尙未成功，南北交通全靠水路。父親已先潛赴南京，任職國民政府交通部，母親留守北平。雙親都不放心我隻身赴滬投考上海交大，（你還



記得，你在廿一年考上唐山交大，還是由你雁文中學、經常陪你唱曹操或教師爺的李同學護送到唐，回北平後，還特地到家來向母親銷差的嗎？）所以我才被摒於交大門外。我的母校並不亞於交大，但我自覺對於交大有一種源遠流長、無法形容的特殊感情，更何況原來交大的校訓就是「飲水思源」。你覺得對嗎？

\*

\*

\*

\*

\*

臺灣軍中四劇團曾聯合義務演出三天平劇，籌募了十多萬元，送交基金會，真是令人感動。

第一天的羣英會，除了以劉玉麟、曹復永兩位先生代替你分飾周瑜之外，其餘仍是你演出那次的全班人馬。我本來不敢去看的，可是我請的幾位客人祇有那天有空，我不得不陪他們去。你一定體會得出我坐在那裏的心情。

第二天的「得意緣」，孫麗虹、郭小莊兩位女士演「教鏢」，高蕙蘭、姜竹華兩位演「說破、下山」。他們演得都非常傳神。你給麗虹說的幾個身段，她一絲都沒忘，很討俏。這雖然也是你愛演的戲，最近我沒看你演過，所以我還可以坐在那裏很入神的欣賞。

第三天的「奇雙會」，我實在沒有勇氣再去看了。這本來就是你預定要和潘祖琪女士合演的一齣戲啊！你在金山街寓所的那年，祇要公餘有暇，就把趙寵的身段唱腔「掏心窩子」教給麗虹，還為竹蕪和她連天排演。你雖工作很累，為她們說戲排戲，正等於讓你休息思考經濟問題的腦力，這是你唯一的愛好，所以你一點不覺疲倦。亞昭還預備各種不同的點心，為她們和我們這些觀眾消夜呢！你一定沒忘吧？

#### 四

說也奇怪，到現在我才夢見過你兩次。第一次是午睡的時候，我們又歡聚了。你那娃娃般的笑臉，你那活潑可愛的態度，清清楚楚，一模一樣。本來嘛，我到現在仍覺得，你還是住在地球的那一面呢！可能，你們和雙親、阿姐，真的都團聚在那個永無痛苦憂愁的天堂裏，難怪你笑得那麼美、那麼得意！

第二次是五月十九夜裏。依稀中，我和你及亞昭一起出去玩。亞昭指着前面對我說：

「姐姐，你遠望出去，這風景有多美！」

我順着她的手兒瞧，真是此景祇應天上有！原來你們是住在如此美麗的仙境！我感到你也在我身邊，可是你和我並沒說什麼。倒是亞昭一直在和我說話。我似乎還看見了我的小壯丁——小定，他還是三十多年前夭折時一歲多那麼點大。在天上，年歲永遠不會一年一年增加的吧？他有個「小磁人」的外號。一出世就帶來一頭濃密的頭髮。我把一塊大絲方巾兜在他頭上，在下巴底下繫個蝴蝶結，任誰都以爲他是個小囡。他娟秀、白皙又乖巧。從來不哭，也從來不鬧着要人抱。給他一塊餅乾，他用小手拿起咬一口，把剩餘的放在他坐的小車前的橫板上，閉着嘴唇咀嚼。真奇怪，並沒有人教給他吃東西時不可以張着嘴、嚼出聲音。等他口裏的嚼完嚥盡，他才又用小手拿起橫板上那大半塊餅乾咬一口，又放回橫板上，就這樣文文靜靜、一口一口、慢慢的把一塊餅乾、閉着嘴唇吃完。有時小指頭上沾了一點屑屑，他就會把小指頭伸到我面前：「噫噫噫！」要我爲他擦乾淨。那時他還是一個沒到一歲、不會說話的小男孩。他生於陽曆二月廿三日，是我洗了三床床單催下來的。農曆却是正月初九，無論在本省或外省，那都是一位神仙的誕辰。他真似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小神仙，所以很早就回到

他的來處去作神仙了。認識你的我的同事，都說他很像舅舅，故此特地爲你把他形容一下。他比壽華大半歲多。父親於壽華出生後寫信給我：「一年間連得兩匹小馬，可喜之至。」因爲他老人家自己也是屬馬的。但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從前見過我的老朋友們都說我脫胎換骨，瘦得連骨骼都小了，我的頸項像雞頸子那麼長。你能想得出我那樣子嗎？可憐我這一年多的心血，祇換回了痛苦的回憶。

小定出生三個星期，你姐夫就隨他的老師深入緬甸。到小定三個多月的時候，他從緬甸逃難，徒步爬山涉水，走了十五天，才回到雲南的祥雲和我相聚。小定天折後，他才想起：在緬甸時，有一位和他同住一間宿舍不過三四天的朋友，在離開緬甸要回雲南、上車時對他說：「我和您相識不久，您的過去我一無所知。敢請問您，有沒有小孩？」

「有一個。」

「我現在就要離開您了，以後是否能夠再見，也不可。請您不要見怪，恕我直言：您的子息很少。」那人說完，和姐夫握手，登車而去。當時，姐夫心想：「反正我已經有了一個了。」後來，他才悟出，那位會看相的朋友，當時可能就已看出他連這一個也保不住，祇是沒好意思直說而已。

提到看相，使我想起二八九年間，你姐夫的同班同學孫源楷先生從大陸來臺，住在我家。有一天，鄉兄王洸（道之）先生來訪。他和孫先生素昧平生，經介紹後，道之兄立刻向孫先生道喜：「恭喜您就要外放了。」

孫先生一楞：「您怎麼知道的？」

當時道之兄如何回答，我已忘了。我祇記得道之兄走後，孫先生說：

「他真有兩下子。我已內定爲第幾（我已忘記）區工程處主任了。」那時他服務於省公路局。

我爲什麼要提這兩次看相的事呢？你一定還記得，你和亞昭最後一次去港回臺的飛機上，遇到一

位韓國旅客。他盛讚你的相好。你還請他看看亞昭，他說也很好。就是那次，你回臺北之後，就腹泄腹痛起來。祇不過七八個月的時間，你們就不在凡塵受罪了。我至今懷疑，那時他是不是已經看出你將得重病，無法救治？當然，在那以前，你倆的相的確都不錯。假如他能像姐夫那位朋友那麼直言暗示一下，你也許會提高警覺，及早治療。我當然不是怨他，祇覺得可惜而已。我也不是迷信，到了我們這種年歲，還看什麼勁兒的相？

有一年，我的「母難」之日，海音姐因為我沒有下一代，要以她女兒祖藏——我的乾女兒——的名義，爲我慶祝，經我再三婉謝，她才算了。兩批互不相熟的朋友分兩天來我家，適巧你那時應邀回臺，都參加了，爲我增添不少喜慶的色彩。第三天親戚的歡聚，你因有他約，沒能再來。

前年我去美國時，正值你十足的六十歲，又值亞昭的農曆（虛）六十歲。我本想去一個特別的商店買一種栽植在玻璃球內的並蒂玫瑰，祝你們「永遠鮮豔」。但是任何不會開車的人到了美加等國，兩腿就等於癱瘓了。假如你們住在鬧區，我還可以步行去買點東西，偏偏你們住在郊區的公路邊，沒有人敢在那裏行走。我告訴你們我想買那樣的玫瑰，你們立刻就猜到了我的用意，聯合起來「欺負」你「癱瘓」了的姐，誰也不肯開車送我到特有的商店去買。我祇能學「秀才人情紙半張」，買了一張賀卡：正面是兩隻翱翔晴空的燕子；內面，一羣小燕子跟在後面學飛，用來祝賀你們「比翼雙飛」。怎料到，你們真的是比翼雙飛，飛上九霄了。

記得有一次我幫着亞昭，把烘乾機裏的衣褲掛在繩子上。亞昭忽然很不好意思似的說：

「在美國家裏，大中就穿破的內衣褲，好的都留着到臺北去穿。」

到臺北來，你們的衣服有人代爲洗滌，不好意思穿破的。其實一套內衣褲所值無幾，你們都不捨得丟棄，真是勤儉持家。

\*

\*

\*

\*

\*

你們爲戢姻伯製備「壽衣」也煞費苦心。因爲怕他老人家知道了會生氣，所以亞昭將三百元美金分批先寄給我，再輾轉間接交去。誰又料得到，戢姻伯穿壽衣的時間，比你們穿的時間還來得晚呢！

## 五

去年年底，好心眼兒的唐舜君姐好幾次電話約我去她的清音雅集散散心。從前在北平，你會說我的嗓子祇能讓前五排的人聽得見。你說得還算很客氣的；我的嗓子連我自己都聽不見。但爲不辜負舜君的好意，在一個比較暖和的日子我去了（天一冷，我就變成蟲子，必須冬眠起來）。他們的雅集，僅有十來個人。但每個人都是多才多藝、個中翹楚：胡琴、二胡、月琴、鼓板，幾乎樣樣都會。舜君現在越唱越好，已經達到頂峯。胡大嫂也已從張派改成梅派了。在她們唱的時候，幾位伴奏的名琴票渾然忘我，樂在其中，越拉越得意。他們不是「傍」角，而是一種享受。她們兩位能由這幾位琴票伴奏，托得嚴絲合縫，唱得自由如意，也是一種享受。坐在旁邊靜聽的我，就更是雙重享受了。在那種場合，你若是去了，不知會有多開心。

我第一次去時，正值蔣碩傑兄來臺參加臺灣人口與經濟發展會議。假如你仍住在地球的那一面，

你會不回來參加這個會議嗎？假如你真的又能回臺參加這個會議，你會不去參加舜君這個小雅集嗎？自從你和亞昭走了之後，那還是我第一次參加這種場合。舜君原爲讓我散散心，我却觸景傷情，無法自抑。那些和你們共同歡樂的日子再也無處追尋了。舜君說：「你要哭就痛快的哭吧，千萬別憋着。」我不忍把我錐心的哀痛感染他們，我還是竭力壓抑住了。

我的「荒腔、走板、一順邊、三條腿」，外帶譚（痰）派青衣，你是早已久仰的了。再加上差不多兩年沒有張嘴，我不是在「過門兒」拉完了還不開口，就是還沒到該張嘴的時候已出了聲。「拳不離手、曲不離口」，你一定也有這種經驗。就在那種情形之下，戢姻伯又在臺中仙逝，我會去送葬。可以告慰你們的是，一直到最後，他老人家始終不知道你們已先行一步，在天堂迎候他。那一陣子，我的心境是那麼沈重，情緒是那麼低落，所以更加唱不成聲。早已不像有你在了一起玩的許多許多次那麼興趣濃厚了。舜君三番五次的寬慰我：「我們祇是爲自己消遣，唱得好不好，絲毫沒有關係。」她又教給我怎樣「運」腔、「換」氣。我的嗓音還沒吊到圓潤，怎能「運」腔呢？我雖非「英雄」，却總「氣短」，從來找不着「氣口」，也許我用的字眼都是外行話，你是不是又要笑我了？不許你笑！

記得前年八九月，你們和我以及碩傑兄嫂，開車從綺色佳城到羅查斯特城——就是你割膽結石、治療癌症的醫院的所在地——你的一位醫生朋友府上。你爲他太太拉了一齣戲後，又替我拉兩段西皮散板，我告訴你：「慢一點。」當時你照辦了。回綺色佳後，你對我說：「姐，不管胡琴拉的快慢，你祇要照你的速度唱，胡琴自然會跟着你走。你一請人家『快點』或『慢點』，就顯得你外行了。」我本來是外行嘛。你不想想，我連讀書都不求甚解、從不深入研究，何況是祇爲消遣的平劇呢？其實我們從小也沒少看電影，不知你後來爲什麼會專門迷上平劇，而那麼討厭電影？我則對於平劇、電影、話劇，以及現在的雲門舞集，都感興趣。那有時間像你那樣專精一門去研究平劇？這大約就是爲什

麼你之能够成爲「你」，而我永遠不過是「我」而已的緣故吧。

去了幾次小雅集，好不容易才把嗓子吊出了一點點，老天又讓我傳染上感冒，幾星期的苦練又白費了。嗓子的刺耳，連我自己都不忍卒聽，難爲那些位寬宏大量的朋友都容忍下去了。今天本來應該去的，我又第五次染上感冒，特地向舜君團主請了假（不請假，不僅要算「曠唱」，而且會影響年終考績），躲在家裏，和你談心。

孟瑤姐也曾去過一次。一看見她，我的心就刺痛起來。你最後一次回臺，過舊金山，曾爲她操琴，拉了一整齣戲，一直拉到凌晨四時才散。你一回臺，就津津樂道，又說又笑又比劃。當時你那份過癮的勁兒，立刻又活躍在我眼前。一陣酸楚從我心尖襲上鼻尖。她無言的重重拍了我一下，和我緊緊的握了一陣手。

俞博生先生也加入了。他又使我把淚水嚥回肚裏。你一定還記得：好多年前你回臺，在胡大嫂府上晚餐，俞先生曾放送你和胡鴻燕女士在美國彩唱「得意緣」的錄音帶給你自己和我們大家聽。這次承他慨允，在百忙中，從上千件錄音帶裏，找出你那「得意緣」送給了我。當我硬起心腸聽的時候，你那剛中帶柔、柔中帶剛、沙沙啞啞的小生嗓子，雖然十分悅耳，但尾音和高音，似乎都使不上勁。你的老生嗓子本來不够好，所以才改唱小生，想不到小生嗓子也這麼沒有衷氣。也許是最近我聽賈雲樵教授那又亮又高又有韻味的小生太過癮了。賈、唐、胡以及其他幾位的嗓子，就像是魔術師要變的鈔票，隨時向空中一抓，就抓來了一大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喜歡唱戲而沒有一本錢，真是一件可憾的事。爲要濫習幾段戲，以免總是「荒腔、走板、忘辭」，把舊錄音帶放了一些來聽。又聽到你在松江路寓所吊的「羣英會」全齣。那時你的嗓子還不錯，你體內的痛細胞可能還沒有活動。可嘆的是，替你操琴的郭應龍先生，三十來歲的人，早就先你而走了。

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以前你每次爲王撫洲（公儉）先生操琴，調門總是定得很低，還請他不要用力唱。現在儉公每星期登山二次，有時一次走六小時，身體已經非常強健。吊嗓時，調門不但高了，還可以連唱二三齣不覺累。這一定是你最高興聽而最感安慰的吧。

我走路一向都是頭重腳輕。最近在街上來了三四次「搶背」，扭了腳頸子，變成了「瞎子逛燈」。

第一次跌跤後回到家，因爲我缺乏醫學常識，用熱水泡腳之後，還用紅花油使勁揉搓，以致越發紅腫疼痛。在被窩裏，額頭發燙，渾身發抖，抖得並不厲害，却已十分難過。當時我就想起你第二次被免疫治療（Immune therapy），每天發抖，震得腹胃肌肉疼痛異常，須蓋三床毛毯。隨即又發高燒到一〇四度，頭部須放冰袋。後據友人輾轉傳來，說你會因化學治療、痛得整夜在地上打滾（究竟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化學治療，我沒追問，因我一聽此話，心已碎了）。你却還有勇氣連續接受這種治療達八天之久。我懂得你：祇要有一絲希望能够戰勝萬惡的癌，多大的痛苦你也會咬緊牙關去忍受。我真佩服你這種堅強的和癌症搏鬥的毅力。等到你清楚的知道，你白白忍受了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接受了兩種化學治療，祇不過等於做了醫學界研究（但却失敗了）治癌的藥物和方法的試驗品。西醫束手之後，你還不死心，又向中醫求治，爲時已晚。你是一個很爽快的人，任何事不做便罷，要做必定做到徹底。既然中西各法都不能使你拼個「癌死我活」，你就知道已無生望，於是乾乾脆脆、安安樂樂的結束了你這燦爛的一生。這點，和因不堪治療痛苦而自求解脫，完全不同。看你，又笑了，「知弟莫若姐」，對不對？

說着說着，我就說溜了嘴。現在還是回頭來談談我的「瞎子逛燈」吧。每達到清音雅集，步行出去簡簡單單吃一頓時，舜君總是扶着我。我們常要橫過一條不知什麼工場的小鐵路，她總讓我走枕木



，她自己走石磴，一脚高一脚低，她也曾歪了一下，幸虧她的腳踝不像我的那麼無力，並沒把她扭傷，我才稍稍安心。記得二十多年前，你們和我一起遊日月潭，在上船的時候，我就滑了一跤。於是一邊一個弟弟，一邊一個弟婦，我走一步，你們扶一步。現在你們雖然離開了我，你們的好朋友們仍然會像你們一樣的照顧我，也許還更細心週到。舜君約我參加雅集，三分是出於她的同情心，同情我失去了這麼一對好弟弟和弟婦；七分還是出於她的愛心。到雅集去了很多很多次，我才能慢慢適應這種熱鬧快樂的氣氛。現在舜君不但吊回了我的嗓子（不過我的嗓子很野，幾乎「天天不回家」），吊回了我的興趣，也從沈痛的深淵中稍稍吊回了我的心。她的愛心終於得到了報償。你們一定也會為我感謝她吧！

想起每次你回臺，朋友歡迎你的清唱場合裏，你當然是賓客方面的中心。在主人方面，大半由舜君把氣氛控制得又活潑又熱鬧。你聽到這裏，該會想起她那甜而爽的嗓兒，風趣脫俗的辭兒，和穿花蝴蝶般瀟灑的樣兒吧？她姓唐是姓對了，但似乎還該加個米字旁。你說對不？看你，打從心眼兒裏笑出來了，要舉雙手贊成了吧！

## 六

父親還在漢口之時，每星期總有兩三個晚上，陪我到國劇研究社去消遣。你沒忘父親每天得過江到武昌的徐家棚辦公，而我則在漢口上班吧？所以我下班總比父親早到家幾十分鐘。我就利用這幾十分鐘，在父親兩間相連的臥室和書房裏練「趟馬」。有一次，父親回來後，跑下樓來，很驚奇的問我：

「什麼將官操演兵馬來着？」

「操演兵馬？」我倒楞住了。

「樓上我房裏那麼許多脚印子！」工友擦得乾乾淨淨的地板，被我的「馬」踏得一塌糊塗。父親不但不生氣，還這麼風趣的問我：「到底是什麼大官哪？」

「和官也。」

父親大笑。我真奇怪：下江人（江浙一帶的人）為什麼總愛替孩子起乳名叫什麼官、什麼官的？大約都是「官」迷。我的「和官」一點也沒有「和氣生財」。你的「明官」倒是起對了：你言行光明；思惟慎明；胸臆清明。對不對？你又在笑了！看！看！何必不好意思呢？

壽華把父親的日記寄來了，我翻看了幾本。看到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九日他老人家帶我們去看尚小雲、王又宸、小翠花的「五龍祚」。你還記得嗎？那就是劉知遠和「李三娘磨房產子」的故事。本來是一元一張戲票，進了戲園，臺前貼出啓事，特領李萬春演「咬臍郎」（原來的廣告上沒有他），當場臨時每人加收一角。等到李萬春出場的時候，二十來個娃娃兵，每人手上一面寫着「劉」字的小旗子。你我二人，一邊吃着吉祥戲園特有的五香栗子，一邊看着滿臺飛揚的「劉」字，好不過癮。那年你才十歲，想想看，我們那些歡樂的日子是怎樣溜走的啊！

\*

\*

\*

\*

\*

撿起父親的日記，真使我後悔。他老人家在漢口時的那兩本，本來一直是在我身邊，卅七年三月，我和你姐夫從浙贛鐵路局調到臺灣鐵路局工作，原說定祇借調三個月，所以我把最有紀念性的東西——父親的兩本日記；雙親在日本的結婚照片，以及和三位舅舅的合影；我們一家四口、從小到大的幾十張合家歡——都留在杭州，拜託一位朋友代為保管。這是我永遠無法贖回的過錯，永遠無法彌補

的遺憾。

\*

\*

\*

\*

\*

電視臺的錄影錄音帶，據說過一段時間就要洗掉的。別人的洗了可以再錄，你的洗了怎麼辦？九公（張九如鄉長）爲此特地拜託他們永久保存。他老人家現在健康逾昔，步履仍是那麼輕快。這一定也是你最感安慰的。我有時和德篋姐約着看看戲、吃吃小館。不過我現在對於平劇，無論是唱或看，都不像以前那麼又瘋又傻了。

\*

\*

\*

\*

\*

一定是慙得太久了，本來很不健談的我，一口氣說了這麼多，好像心裏還有很多話沒說呢。因爲是和你談，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很有點顛三倒四，語無倫次。你到底聽見了沒有嘛？怎麼一聲也不哼？真讓我自彈自拉自唱嗎？這真有點反常。本來就是反常嘛！本來應該我先走的嘛！怎麼倒是你先走了？假如真的有來生，我希望來生我倆還是手足。你一定也願意吧？我更希望能多有幾個像你這樣的手足。雖然現在流行「兩個就夠」，你一走，扔下我，好孤單啲！

# 悼劉大中博士、戢亞昭夫人

(調寄臨江仙)

劉象山

無分同生偏共死，哀音淒動人寰。錦衣玉貌想當年，小喬初嫁了，美眷豔如仙。撒手懸崖空  
去住，層霄縹緲龍鸞。彌天志業齋重泉，人間千萬事，都作戲中看。

## 劉大中 伉儷逝世週年之追憶

蔣碩傑

劉大中先生和他的夫人戢亞昭女士於去（六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深夜雙雙仰藥自盡以來，轉瞬已將一整年。當時這樁悲劇給我極強烈的打擊，精神很難鎮定下來，加以那時又有種種後事須替他料理，所以國內友好要替他們刊印一冊追思錄，向我徵索一篇紀念文的時候，也不能及時交卷，真是遺憾之至。如今將屆週年，再不能不寫一篇文章，記述我和內子跟他們夫婦的一段差不多二十年的友情了。何況別的朋友們時常戲言大中和我好像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我怎麼能不談一談我們兩人多年來合作的經過呢。

我和大中相識，是在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同在北平教書的時候（那時大中在清華，我在北大）。但是我初次聽到他的大名，則是早在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還在英國唸書的時候。那時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劍橋大學的 Marshall 圖書館讀書。該館所訂的「美國經濟學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的一九四一年六月份的那一期到達的時候，發見其中載有一篇討論中國戰時外匯問題的文章，署名為 Ta-Chung Liu。那篇文章批評當時政府將匯率固定在二十元法幣等於一美元的外匯政策，並提出改革的方案，分析得盡情盡理，令人十分欽佩。當時在劍橋攻讀經濟的朋友（有徐毓枬、陳仲秀、馬潤庠、吳元黎、滕茂桐諸兄），都互相討論這篇文章，並研究這位作者是何許人。有人認為也許就是那時已經籍籍有名的劉大鈞先生；但大家又認為「鈞」字不當拼作 Chung。最後還是滕茂桐兄說，他有一位在北平匯文中學時的同班同學，名叫劉大中，異常聰明，在匯文時雖然喜歡唱戲

而不甚用功讀書，可是總是名列前茅。後來聽說去康乃爾大學進修土木工程，又轉系改讀經濟；想必是他。因此我對「劉大中」其人頗為傾慕。

嗣後，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我去北大教書時，即聽說清華新聘了一位劉大中教授，所以極想一見，但是遲遲不見他到來，直到次年春間才聽說他從美國回來了。這回沒有等我找着一個機會出城去清華園拜訪他，一天他突然其然的就到北大紅樓來找我。雖然初次見面，但是一談十分投機；彼此相見恨晚。他聽說我來北大以前曾為張公權先生在東北經濟委員會服務，就說公權先生也曾邀他去東北，最近又曾要保舉他做天津交通銀行經理，但是他決心來清華教書，所以也沒有接受。那時公權先生好像新受命任中央銀行總裁不久，他就建議我們兩人聯名寫一封信去道賀，並堅持要我起草。我那時還以為他因是教會中學出身，不慣用中文寫信，所以也不推托，就動筆起草。寫完後兩人互相推敲修改了一下，他又推說他的字寫的不好，要我清繕，然後一同署名寄出，更使我懷疑他的國學根柢不太高明。但不久即發現是大錯，原來他是武進書香世家出身，對陽湖派古文夙有庭訓，又曾在駐美商務參事處服務多年，對公文及報告的草擬，又有多年的磨練，所以文筆極為簡鍊，雖然他那筆字的確是不敢恭維的。他那時想是聽說我是從中學就出洋的，所以特地來考我一下中文，更不料此後幾乎三十年中我們兩人共同的函牘、報告、建議等，很多都是如此合作寫成的。

那時北大和清華有一個聯合研討會，每月舉行一次討論學術或經濟現狀及政策等問題，因此時常聽到他的議論。我們又同時為「經濟評論」撰寫文章，交換意見的機會很多。不久錢乙藜（昌照）先生（時任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揚言願出資辦一獨立性的雜誌。他和大中在美就相識，又知道他現在在經濟學界的名望，所以就央請大中作主編。乙藜先生早年一從英國留學歸來，即擔任政府要職，不久就膺任資源委員會這麼重要機構的副首長。但是勝利之後不知何故變得很消極，竟想要以社會賢

達自居，所以來北平聯絡學術界人士，成立一個超然獨立的團體。這雜誌命名為「新路」，以示在「國」「共」之外，開闢一條新出路的意思。這雜誌的經費究竟是他私人荷包所出，還是資源委員會的公款，我到現在還不大明白。不過大中主編這雜誌，完全是以公正的學術態度來評論時事，並以提出建設性的方案為目標，決未刊出一篇惡意的漫罵，或煽動性的鼓吹。這雜誌成為北平教授們討論經濟問題的論壇，大中和我都是它的基本投稿者，過從也因此日密。

這一段在北平教書和辦雜誌的時期，是大中兄自認為一生中最痛快的時期。北平是他自幼生長的家鄉，這裏有他喜歡的親友、戲園、和各種飲食遊樂的場所，清華園的讀書環境又是那麼清幽。那時學術研究的空氣，憑良心說還是相當自由的，比起現在大陸上的情況真有天壤之別了。可是好景不長，共黨的叛亂日益猖獗，在東北方面國軍節節失利，平津也逐漸受到威脅，同時政府在財經方面的措施也有些失策的地方。民國三十七年政府決心大改幣制，廢去貶值到極不方便的程度的法幣，而另改用金圓券。初行的時候，頗為人民信任，物價曾因此穩定了一段時期，但不久政府突然要強迫的以金圓券收購民間所有的黃金與外幣，金圓券因之無限制的大量出籠，物價亦因之迅速猛漲。政府那時的對策，完全不在貨幣供給的控制上想辦法，而只企圖硬性的管制幾樣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以為這幾樣價格不漲，別的物品就不會漲了。那知在金圓券泛濫之下，要想硬性管制幾樣物價，只有使那幾種商品盡被隱匿而流入黑市，事實上硬性物價管制，也只能在大都市裏雷厲執行，結果四鄉的糧食供給，反而因此不往都市裏來了。於是北平的小民，要想買一日之口糧，即令從天未亮時就在糧食店門口排隊，也不易買得着，以致怨聲載道。我那時就在「新路」上寫了一篇討論「金圓券的善後」的文章，指出政府政策上的錯誤，不該這麼快就將金圓券搞垮了，並且提出具體的善後辦法。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看了這篇文章，頗為讚許，曾經嘆息着對我說，他的老朋友翁詠霓先生（時任行政

院院長)對經濟學實在太外行了，所以搞出這麼大的紕漏出來。不多久在一個秋高氣爽的十月下旬的某天，胡先生突然打來電話找我，問我下午有沒有空，說要帶我去看看他的老朋友翁先生。原來，蔣總統那時親去東北指揮錦州、葫蘆島一帶的戰局，又抽空到北平來視察平津一帶的政事，並安撫傅作義部隊的軍心。翁先生也隨同來平視察。我當時欣然答應。到了時候，就搭胡先生的車子同去資委會駐平辦事處去看翁先生。大中也被胡先生打電話約去那裏碰頭。翁先生我雖然聞名已久，但還是初次見面，初見的印象，却令我很失望。原來翁先生那時精神顯得很頹喪，胡先生見面之後，就坦率的指摘金圓券的崩潰，物價的猛漲，及限價之後商品購買不到，對人民生活及華北民心影響之大。請他快拿出善後的辦法來。胡先生接着又說，經濟政策恐怕需要經濟專家來幫同決策；「如果你同意的話，這兩位青年經濟學家我可以勸他們短期間跟你去南京處理此事。」翁先生對他的建議一概漫不經心的應以「好！好！」最後突然很沈重的將上身向沙發椅背上一靠，長嘆一口氣說道：「想不到這付爛擔子會落在我翁某人肩膀上。」說完之後，閉目半晌不語，才起身坐起來。雖然如今已事隔二十八年之久，但是翁先生這句話，和那時的神情，我還記得清清楚楚的。因為他和胡先生真是一對太強烈的對照了。一個是不在其位的人，却是那麼積極，那麼熱心；一個是身居首揆的人，却是那麼消極，那麼頹喪。翁先生那時好像是已經心如死灰；胡先生那時却還是不表悲觀，總是積極的在找出路，因此很多外國新聞記者都稱他爲 The incurable optimist，即「不可救藥的樂觀者」的意思。當天下午，因爲翁先生那樣不起勁，自然也沒有什麼可討論的，大中和我都很失望地各自回去。可是過一兩天，我們忽然收到 總統的請帖，約於十月廿四日在後圓恩寺總統行邸晚餐，使我們都大吃一驚。原來 總統本就準備設宴招待北平教育界的領袖們的，胡先生却借此機會將我們兩人名字也推薦上去了。胡先生此舉是有用意的，那晚席間，胡先生就直接向 總統陳述經濟問題對民心向背的重要，並即席推



薦吳景超（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劉大中和我三人隨翁先生回南京去，研討穩定金圓券的方案。總統立表採納，就轉身問翁先生意見如何。翁先生自然也表贊同。總統就命侍從人員將此消息轉告在行邸等候採訪消息的新聞記者，讓他們發出去了。第二天，各報紙都在頭條新聞裏將這消息刊登出來。

可是以後的發展是胡先生無法可以料想到的。胡先生要吳景超先生和我們同去南京，想是因為我們兩人都還年輕，閱歷不多，去南京這麼複雜的環境中，恐怕會暈頭轉向，不知何所適從，所以要以一位年事較長、有政治經驗的人做嚮導。吳先生在抗戰時期在翁先生下面做經濟部參事多年，現在又和我們同是「新路」的編輯委員，應該是最合適的人了。那知吳先生雖然跟翁先生做事多年，却對翁先生非常不滿。當天晚上他就和大中說，翁先生這人他無法服侍，此時去南京一定毫無用處。他很容易的就說服了大中，第二天一早，大中就打電話來說他們兩人已決定不去南京，如果我願意去的話，就一人去好了。我和胡先生商量以後，也只好決定不去。因為翁先生那天下午的態度，使我也深信他本人並沒有意思接受我們作顧問，如果我們貿然前去，他却不顧也不問，那我們還是一籌莫展自討沒趣的。這件曾經 總統當面接受並宣佈的事，就這樣毫無下文的不了了之了。翁先生以後也再沒有來信催促或問詢過。現在在臺灣的朋友多以為大中和我給政府做顧問工作，是政府遷臺以後的事，却不知道在大陸時候， 總統就對我們有這麼一次徵召的，只可惜因為那時翁院長態度冷漠，沒有實現罷了。

以後我們兩人對國事都相當灰心，華北的軍事日益不利，北平漸成危城，大中就進行去國際貨幣基金服務的事。幸得我國駐該基金的理事顧季高先生的援引，並且湊巧那時美國的理事薩色德(Frank Southard, Jr.) 又是他在康乃爾大學教國際貿易的老師，所以很順利的就成功了。我則因為內子已隨其雙親來臺灣，所以決定到臺灣來避難。兩人約定各自設法買機票，到上海後再謀一聚。結果兩人以

一天之差，先後離平，到上海後還見了一面，然後分道揚鑣。大中到了基金以後，即將基金的職位申請書給我寄來。不過他說目前因為大陸政局變色，基金及其他聯合國機構，都凍結中國籍的職員，所以希望不大；你且試試看再說，最好要找一位對基金有力量的外國人士推薦，才有成功希望云云。我想了一想，記起我在倫敦大學師長中有一位 Lionel Robbins（後封及身而止的男爵），是英國參加布列頓森林會議（Breton Woods Conference，即籌設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的大會）的三位代表中之一，他的推薦或許對基金還有一些份量，於是寫信請他介紹。但亦只是姑且一試，沒有寄以很大的期望，不料兩三個月之後，基金居然就將聘書寄來，頗出意料之外。如此我們在華盛頓又重新聚首，這回住處又近，工作地點又相同，上下班可以同車，所以比在北平時更加親近了。

這回我們都覺得國事不是我們所能為力的了，所以一切討論國事的文章都不再寫，只想埋頭把這幾年荒疏了的學問好好補習起來，並迎頭趕上最近的新發展。大中對那時遠在新開關中的計量經濟學大感興趣，認為這門學問大有前途，所以埋頭獨自研習這門新學問，並且還鼓勵我也學習此門功課。我因為數學根基較差，不禁望之却步，因此在那方面至今沒有成就，只能在自己舊日的園地裏繼續耕耘。而大中却在苦修了一年之後，即卓然有成，居然就被霍浦金斯（Johns Hopkins）大學聘為客座教授，講授這門新課程，並且以後在這方面還有許多獨創的見解和發明貢獻世界，成為當代計量經濟學名家之一，足見他克服困難的堅強毅力，和過人的天資。年輕一輩的朋友每以為計量經濟學就是大中大學研讀的專門學科，豈知他那時候大學裏還沒有這門功課呢。他的成就完全是自修得來的。

大中讀書和做事的精力，實在令人佩服。他一人總像能做兩個人的事似的，並且還有一股拼命蠻幹的精神。所以如果有需要，他一人做三人的事也可以撐得下去。他說話和演講的時候，似乎能將自己的精神，放射到聽衆身上，使聽者也振起精神來，這也許和他唱戲的訓練有關。凡是看過他最後一

次在臺北彩排「羣英會」的人，一定還記得他在臺上如何將周瑜的「雄姿英發」的氣概，放射到臺下觀眾的眼裏。他演講的時候也有這種能耐，他在霍浦金斯大學兼課的時候，是全校出名的善於講書的教授。據說那時有別系的學生，雖然所學與經濟學毫無淵源，也混入他的教室偷偷領略一下他講書的神情。他在那一段時期教授出來的學生，已有好幾位成爲世界聞名的學者了，如 Marc Nerlove, Robert Eisner, Murray Kemp 等人。這些高足對他們老師都念念不忘，聽到他的噩耗時，都自動寫信給家屬道唁，並慷慨捐款幫助設立紀念獎金，或志願擔任紀念文集的編輯。其尊師的風義，殊不亞於國人。

大中在霍浦金斯大學兼課後不多久，又接受了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委託研究中共經濟情況的契約。蘭德公司是一個私立的研究機構，可是專門接受美國政府的委託契約，替政府做各種機密的研究。那時中共經濟的研究極爲時髦，許多投機的美國學者，中國字既識得不多，資料亦不知何處去找，却會嚮壁虛構，將中共描寫得天花亂墜。大中痛恨這般投機份子，更不願他們浮誇的估計成爲美國政府決策的根據，所以覺得義不容辭，就擔任下這項研究。他憑他從前研究中國國民所得的經驗，做出一套踏實的科學估計，和那些浮誇的數字來對抗。他有與葉孔嘉兄合著的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59" 成爲這方面的權威著作。以後美國國會討論中共問題時，他常被找去作諮詢。

可是那幾年之內，他一人而兼三份工作，儘管他有過人的精力，也不免神經過份緊張，以至失眠而養成長期服用安眠藥的習慣。同時得了一種神經性的皮膚炎，發作時混身奇癢難熬。那時醫生也沒有什麼良藥可以治療，只叫他用澱粉和水，發作時用布蘸濕塗敷癢處，這下可給他夫人亞昭又添了麻煩。那幾年內大中出門，他的夫人必須帶着一罐子的澱粉湯隨侍在側，以備隨時應用。大中還說他的

神經緊張能發洩在皮毛之上，還算是幸運的了，因為別人可能發作在胃潰瘍或心臟病上的。但是他那長年的腹瀉是否那時種的因，就不可知了。他這種奮不顧身、拼命蠻幹的精神，也是後來耽誤了醫治癌症機會的基本原因。

這裏我不能不提一提亞昭夫人對大中的幫助。凡是見過亞昭的人，都覺得她為人謙和克己，平易近人。她治家更是一切內外雜務都由她自己承當。在美國住家，裏裏外外的事都需要男女主人躬親處理的，室內的烹飪、打掃、洗衣不去說，室外的如春夏剪草，秋天掃葉，冬季剷雪，一年四季的整理庭園，清除垃圾，通常都是男主人份內的事，而都是很費時間的。亞昭爲着讓大中有充份的時間去研究學問，把所有家務事都由她一人擔當下來。室外粗重的工作她自己做不了的，也由她負責去找鄰居孩子來做，汽車的保養和修理也由她負責送取，許多不重要的社交信件都由她代筆，可說是一人而兼廚子、老媽、車夫、園丁、書記、會計等職。這是在國內的小姐太太們不大容易想像到的，更難得的是她本是富貴家庭出身的小姐（她的尊翁戢翼翹先生曾任東北軍參謀長、國府委員等要職），而且相貌又極端美，在燕京有校花之稱，連大中在基金時的一位女書記都稱之爲她一生所見之最美麗的女子。普通的女士，在富貴與美麗之間，能得其一就不免有些驕矜了。亞昭兩者兼而有之，可是一點也不驕傲，也無嬌生慣養的惡習。她讓大中专心作勞心的工作，自己擔任一切勞力的工作，一點不怨不艾。難怪大中自己也說，他的家庭幸福是一超踰恆常的了。真的，如果沒有亞昭這樣的賢內助，大中的工作效率起碼要打對折的。

大中第二次來美後，既已決定不問國事了，怎樣後來又屢次回臺貢獻意見，又擔任重要工作呢？這事起初也許是由於尹仲容、霍亞民兩位先生的援引和推薦，但是在後期却是 總統對大中特達之知遇，和絕對的信任所使然。大中和我初次來臺貢獻意見的經過，我在悼念霍亞民先生的文章裏，已經

提過，不必再談了。

大中受總統特殊的賞識是在民國五十六年的七月，我們回來臺灣參加他自己擘劃組織的中美學人經濟發展討論會。總統對此會頗為重視，除用茶會招待全體與會學人之外，並命大中、顧應昌、費景漢和我四人會後多留臺兩星期，進一步對財經各方面提供意見。我們就會同起草了一篇意見書，陳述當時臺灣之稅制應如何加以改革。總統即邀我們去梨山，當面詳談，由李國鼎先生陪同晉見。大中即本其做事徹底、準備週到的作風，豫先請經合會的同人替他繪製一套他自己設計的全國總生產的分配與利用的圖解，準備向總統進講一課深出淺入的總體經濟學及財政政策。他將圖解裝在一個長筒裏，自己搨着上山，路上還開玩笑說，希望安全人員不要誤會他扛着迫擊砲上山。當日傍晚到達梨山即被安置在行館前的梨山賓館裏。當我們正在洗臉更衣時，忽然聽見敲門的聲音，啓門一看，竟是總統親自走來問我們房間舒適否，山上空氣是否太涼（梨山的海拔約七千英尺，比大陸上的廬山牯嶺還高一倍），並每人各贈一件榮民製作的棉夾克，其慈祥關懷之情，至使人感動。當晚即蒙賜宴，餐後即聽取了我們的意見書，並垂詢了許多問題。問畢之後，大中就說我們還預備了一點資料，如果總統明天還有空，願意有一個機會再向總統陳述。次日總統就約我們同去參觀福壽山農場，即在該農場繼續討論。那天天氣晴朗，總統命人在農場草坪上安排藤椅，在高山上煦和的陽光中聆取報告。大中就將他所準備的圖解，一一鋪在草地上，自己拿着一支木桿逐一指點着，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講演。他講書的本領，我在前面已提過，在美國都是有名的，如今用本國文字來講，更是字字分明，頭頭是道，尤其是他混身的精神似乎能放射出來，達到聽衆身上。總統不時發問，不時領首，聽完之後，大為讚賞，立刻表示政府可以採納我們的意見。以後我國政府每年都做全國生產總需求的估計，以作編製總預算的依據，就是這樣開始的。

總統自從那次親聆大中講解總體經濟學原理之後，顯然覺得他不僅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並且是一位傑出的政治人材，所以對他特別器重。次年政府按照我們的建議設置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時，就聘大中爲主任委員，政府財經各部首長爲委員。他接受這項任務之前，就表明他決不願意像歐美一般學者參加政府特設的專家委員會一樣，只寫一部報告書交卷就算了事，而願能實際推行改革的工作，務使自己能親見改革之付諸實行，然後功成身退。總統也破格的授予他執行的權力，並命政府財經首長盡力協助與之配合。他得到總統的絕對信任和全力支持，所以一開始就敢放膽訂出龐大驚人的預算，除羅致國內外專家從事稅制稅法的修正外，光租電子計算機一項每年就花三十餘萬美元。又創設運用電腦處理財稅資料人員的訓練班，和利用電腦以從事稅務稽核人員的訓練班等等。因此賦改會和財稅資料處理及考核中心的編制，相當龐大。在華府的一位比較年長的老朋友吳光清先生（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部主任），聽見此事，大爲駭然。不禁以老大哥口吻一半開着玩笑的說道：「大中怎樣如此膽大妄爲！」其實膽大則有之，妄爲則不然。他以一介書生能有如此大魄力推動這樣一件大改革，在短短的兩年期內就使它上了軌道，然後將其一手締造的一切機構和盤托出，交給財政部併入其正規編制，真可謂功成身退而不居了。

但是他爲報答總統對他信任之專，不免又拿出奮不顧身、拼命蠻幹的精神出來，他那長期的腹瀉的毛病可能在那時就已惡化而被耽誤了。那時期他的腹瀉加劇，安眠藥的服用量又因工作太緊張而更增加。爲他健康而焦急的亞昭曾替他在榮民總醫院約定了日期去住院做兩天的大檢查，但是到時候大中却說工作太忙實在走不開，反叫沒有毛病的亞昭頂替他去接受檢查。這可能是致命的疏忽。因爲據醫生推測，他那已有十多年歷史的腹瀉到那時可能已惡化成癌了，但可能還未從腸內散佈出去，如果那時就被發現而及時割治，就可能治癒的。

大中爲了治病可說受盡了折磨，而亞昭也可說同時在一起受難。去年三月二十七日他第一次去羅哲斯德 (Rochester) 的 Genesee 醫院割除膽石的時候，亞昭就一同去羅城，住在醫院附近的旅館內，以便照顧。當外科醫生很順利的割去充滿了結石的膽囊之後，發現他肝上有可疑的癍點，就刮下少許送病理專家檢驗，結果竟是癌。據外科醫生檢視，肝的內部並沒有病狀，肝上的癍點顯似別處傳播來的初期癍狀，這個發現却是異常嚴重的。因爲癌疾一開始散播，就很難醫治了。外科醫生於手術後就坦白的告訴亞昭，他認爲大中只有三個月至六個月的生命了，這對亞昭是多麼大的打擊。醫生勸她暫時勿告病人，以免耽誤傷口的癒合。因此她還得在大中面前強顏爲笑，支吾隱瞞。後來我們問主治的腸胃科醫生，爲什麼起初他沒有想到是癌，他說大中帶去的在綺色佳本地醫院所照的腹部X光照片，顯示沒有癌的癍象。同時他說：「劉先生的精神那麼飽滿，使我不能想像他是長期性的癌症患者，所以判斷他的腹部絞痛的原因是X光照片上明白顯出的膽石，長期腹瀉則可能是東方人常有的不能消化牛乳類食物的緣故。」唉，大中那說話時精神射人的本領，這次却誤了他了。

大中手術之後經過良好，他聽醫生說手術後要有適當的運動才能恢復的快。所以他在手術後第二天，就拖着注射葡萄糖水的管子，由亞昭扶着，並替他推着掛葡萄糖水瓶的架子，就在醫院走廊裏散步起來。我們去看他時，也幫着扶着推着，同他一面散步一面談話。他那付好強好勝的脾氣，還是一如平素。他回家不久就覺腹部絞痛，並沒有因膽石割去而消退，長年的腹瀉也沒有因戒絕乳製食品而停止。但是亞昭還不敢將壞消息告訴他。他自己仍舊充滿信心，仍積極的準備去香港擔任新亞校長的事。第二次去羅哲斯德檢查時，才發現小腸與大腸相接處有癌瘤，且幾乎將腸道的百分之八十阻塞，所以在四月二十七日又動手術。這回亞昭得到醫生的許可，就一同入院，睡在病房中一張沙發上，以便晝夜的看護。這次手術本身的結果也非常良好，他不久就能恢復飲食，而且多年來的腹瀉，從此霍

然而癒，腹部的絞痛也完全停止，食慾也很好。所以六月間張耀東先生來探望他的時候，他還能陪他出去大啖牛排。如果他的毛病只在腸上一處，那就可以從此痊癒了。可惜此時已太晚，他的肝和肺上的癥點日漸增加，他的食慾逐漸消失，咳嗽較多，混身說不出的不舒服。他於是又去羅城接受還在試驗中的化學藥療及免疫療法，據說異常痛苦，每次都由亞昭陪同住院，照護一切，每次都眼見他痛苦得呻吟轉側，終夜不休，她受的罪也和大中差不多了。但是如此猛藥似乎也不能阻止癌細胞的蔓延，只進一步的摧殘他的元氣，使他的黑頭髮幾乎脫盡，只剩稀疏的幾莖灰白頭髮，體重減輕到只有九十磅，完全成爲一個瘦削的老叟，和去羅城作第一次手術時已判若兩人了。

最後大中怕自己元氣被這些試驗性的猛藥摧殘殆盡，決心不再治療。他那時對生死已看開，覺得他一生六十年內，玩也玩够了，家庭幸福也享够了，事業也有足以自豪的成就，所以死亦無憾。可是比他在學術上和政治上的成就更令他滿意的，竟是他前（六十三）年夏間在臺北彩排演出「羣英會」這件事。他病重時，時常將那時錄下來的錄音帶一再的傾聽，並且常和我們說着玩：「幸虧那時排演了這齣戲，以後再想演唱，可沒有這勁了。一聽了令人心酸，忍淚不住。」

那時我和內人幾乎每天去看大中和亞昭，和他們閒談些時，希望能給他們一點精神上的安慰，但是又自覺無能爲力，所以勸他們接受宗教，以得到靈的支持，臺北方面有許多好友也如此勸他。他們於是經我們的介紹請了此地公理會教會的牧師到家裏來給他們施洗，皈依基督。他們兩人將宗教的書籍看了不少，並且每日祈禱，所以對死的恐懼，更爲淡薄了。

那時內人的身體也不好，醫生主張開刀割治爲妙，內人遲疑不決。大中聽說立刻鄭重的說：「這事不能拖延，我自己就是誤了，你千萬不要再誤了。」於是催着她去約定日期。熙靜於是決定八月十二日入羅哲斯德大學醫院，十三日行手術。十一日傍晚亞昭還特別打電話來邀我們去談談，談話時不



勝歛歛，大中眼中淚光晶瑩，握手言別時更是依依不捨。那知那一別之後，他們兩人竟在熙靜開刀的那天下午，雙雙駕車去離家不遠的「假日旅社」同時仰藥自盡了。

大中會自盡，我們多少有些預料到，也耽心過。因為大中是絕對好強的人，他絕不願意長久成爲事事靠人的病人，何況他近來活一天，是受一天罪。他身邊各種安眠藥又多得很，所以我們爲這事常提心吊膽，但是亞昭會毅然和他同時自盡，却是沒有想到的。他們兩人之間，有「同生死」之約，是他們沒有向我們透露過的。事後想來，這也許是亞昭在大中病勢惡化之後，反而看起來更平靜安詳的緣故。有人懷疑她何以對兒子及孫女們那麼沒有牽掛，那是不然的，只是她和大中的感情和對他的痛苦的同情，蓋過一切罷了。他們逝世不久，他們的次子清華曾到舍下來談天，談起他雙親的往事。他說他的母親是從不在人前表露傷心或哭泣的人。他自己一生只看見他母親哭過一次。那就是大中病重之後，他和長兄一家都來綺色佳省親。大家圍坐客廳之中，人人心中沈重，話也不多，只有小孫女美德 (Dana)，是一個不知愁的天真活潑的四歲女孩，一個人自得其樂的在室中心又說又唱的玩着。她忽然間感覺到她祖母睇視她的眼光和平日不同，就擡頭問道：「Grandma! Why do you look so sad?」(奶奶，你爲什麼看着這樣傷心?) 一亞昭經她一問，更加傷心了，就勉強回答着說：「因爲你爺爺病重，不知再能看你幾面了。」說罷就忍不住跑到洗澡間去獨自哭泣了。外面父女三人，都低頭垂淚，不知如何是好，倒是長媳思潯腦筋靈敏，就跟美德說：「美德，你去勸勸奶奶不要傷心了。」那天真的孩子當真的答應一聲：「I go. (我去。)」就小腿蹬蹬的跑到洗澡間去，和他奶奶說：「Grandma! Don't cry! Maybe things will turn out better. (奶奶別哭啦！也許事情都會好轉的。)」這一勸反使亞昭更捨不得而抱着她傷心起來。清華說只這一次，以後再沒有看見他母親哭過。這時清華自己竟忍不住而泣不成聲了。

真的，綺色佳的朋友，除了熙靜以外，誰也沒有見過亞昭爲大中的病而流淚過。大家都不懂她怎樣有這樣的堅強鎮定。這大概是因爲她已有決心，故而心無憂懼的緣故。在她生命中的最後一天，她還從早就去了許多家熟朋友處，或送還借用之物件，或送一些小禮物，態度安祥和穆，誰也不疑有異。下午他們就僅僅拿着一個小提箱出門去「假日旅社」，去度永久的假期去了。他們自然知道這次出門就不再回來了。那幢掛着「海天仙侶」的匾額，可以憑眺嘉佑珈湖光山色的住宅，和那裏面自己多年來精心佈置的一切，就只好讓別人去享受了。可是最後走出家門之前，亞昭還把屋內打掃得乾乾淨淨，牀鋪都鋪得整整齊齊，然後鎖門而去。這又是爲着誰呢？這不過是她平素捨己爲人的作風之又一表現而已。我是他們出走以後，第一個用他們寄放在我處的鑰匙開門進去查看的人，當時頗爲屋內比平日居住時還整潔而驚訝不已。如今那幢房子已易主，另有人家在內居住，我們每過其門，都不忍多看。

他們的出走是梁達兄伉儷及王憲鐘兄伉儷首先發覺的。十四日傍晚我從羅哲斯德大學醫院回家後，聽說此事就給住在紐澤西州的壽華侄打一電話去問是否到他那裏去了，他說沒有，也不知他有要出門的計畫。當時頗覺不妙，就請當地警署派警到附近旅館去一一查詢。警局的人說：「他們兩個成人出門旅行一兩天沒有回家，不足爲奇，沒有理由就大事追查。」我們沒有辦法，於是顧慰華兄及梁達兄之長公子兩人，自告奮勇深夜駕車至各汽車旅社之停車場一一查看，看有沒有他們的汽車停在那裏，結果並無發現。最後還是壽華侄於十五日來綺色佳後再請警局幫助尋找，纔於十六日晨發現他們兩人遺體，並在旅館裏發現遺書數封，一封是大中寫給梁達、王憲鐘、沈申甫、顧慰華諸兄及我的信，一封是亞昭寫給以上各位的夫人的。另外還有一封是亞昭給內人熙靜個人的信，裏面還說：「你的病一定不要緊，希望開刀後多休養，少操作，我本想等等你的消息，但是大中實在不能再忍受了。吉人

天相，祝你早日康復。……」原來熙靜就是十三日那天開刀，是癌或不是癌，她還不知道，所以惦念着的緣故。

十四日那晚，我知道事情不妙之後，一夜心神不寧，不能安睡。次晨正在懵懵中，忽然看見有兩人一前一後，朝我走來，走到我前面之後只略一停留，似乎點了一下頭，又繼續向前方走去。我當時還糊裏糊塗，祇注視着他們的背影，忽然間，我覺得後面那人走路的姿態很像大中，接着又一想，那麼前面走的又是誰呢？難道是亞昭麼？想到這裏，立刻就驚醒了，那時已是天色微明的時分。這種噩夢自然可能是自己心裏所擔愛的事所引起的。十六日那天遺體被警察發現之後，立刻就被送到當地醫院去檢驗，下午才被送到殯儀館。壽華兄弟要求一瞻遺容時，殯儀館的人勸阻道：「現在天氣炎熱，他倆棄世恐怕已有三天了；還是不看的好。你們還是保留他們生前的記憶吧。」真的，大中決不願人家記憶他病重時的那種枯槁瘦弱的形容。他一定願意大家都記着他那「雄姿英發」「貞周郎也」的那種丰采的。在綺色佳的朋友們更會永遠的記着，他們是一對「才氣橫溢而肝膽照人」和「姿容絕世而捨己爲人」的「海天仙侶」的。

今年四月康乃爾大學同事梁達、王憲鐘、沈申甫、鮑亦興、顧慰華及我六人發起籌募一筆「劉大中先生伉儷紀念獎學基金」，每年以息金作獎學金頒發，以作永久之紀念，並將以華裔學生爲優先受惠者。籌募以來，迄今不到兩個月已募得一萬三千元，捐款者有與大中兄嫂只有數面之交或從不相識者，足見他們生平的爲人及事功實有令人傾心之處。國內諸君子如有願意玉成斯舉者，亦盼慷慨輸將，俾兩萬元的目標能早日達到。

## 追思大中先生伉儷

魯傳鼎

抗戰勝利之前，學術界已經開始估計我國平均個人所得的水準，以當時行政記錄的不完整，統計制度的不健全，國土的遼闊與人口的衆庶，這種國民會計工作的困難，殊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嘗試如此艱鉅研究的學者，確實令人欽佩。劉大中先生就是當時這少數學人中的一位，他發表了個人的估計數字，爲我國國民所得的研究開啓先河，所以國內知道劉先生的大名，已經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情。

劉大中先生在經濟學上的成就，早已馳名國際。他在華府國際貨幣基金工作的時候，就到巴爾的摩城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兼課。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大中先生原打算到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專心任教，後來改變主意到他的母校康乃爾大學擔任教授，恰好他的同事 Fritz Machlup 教授要到普林斯登大學接替退休的 Prof. Jacob Viner。同輩 Richard Musgrave 教授要轉往芝加哥大學，Evssey Domar 教授到波士頓城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執教。他們四位第一流教授的離去，使得教授陣容一向堅強的約大經濟系，聲望立刻一落千丈，這恐怕是當時經濟學界人事動態的要聞。

大中先生定居綺色佳城以後，我正好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作研究，我們偶然通訊討論一些問題。他給人的感覺是豪邁朗爽，樂於助人。他在教學研究的緊張之中，極能善加調劑排遣，生活多采多姿，這種突出的性格實在不易多見。紐約的華人有個平劇雅集，筆者大學時代的老同學亨德學院教授伍承祖兄，由於他的夫人杜天蕪女士是位鬚生名票，伍公館就成了雅集聚會的場所，伍大嫂與大中先生都是雅集彩排的主要人物。每逢紐約平劇公演，大中先生伉儷倍極辛苦的長途開車，準時趕到公演場所，或者粉墨登臺，或者充當武場，出錢出力，熱情過人。前幾年每與大中先生伉儷相聚，談起昔年

劉大中先生伉儷追思錄

舊事，仍然餘味無窮，令人神往。

書生報國，古有明訓，大中先生的愛國熱情，一向不甘後人，民國五十七年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成立，大中先生被政府徵召主持會務，他決心不顧艱辛，不計毀譽的全力以赴。六月十日我邀他到木柵政治大學為商學院的學生講話，他以「經濟學人對美國社會的貢獻」為題，發表一篇精彩的演說，既無辭藻修飾，亦無冗辭贅語，每一字每一句都打入聽眾的心坎，室內外的教授與學生，無不為之動容。但是我更能體會他的弦外之音，美國經濟學人能做到的，中國的經濟學人何嘗不能，尤其是他自己！

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到六十二年七月，政治大學劉校長季洪先生給我增添額外的任務，除了國際貿易系系務以外，要兼顧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的行政業務，中心座落在臺北市中心區的金華街金山街口，頗有一些特殊的條件，因此與大中先生主持的賦改會發生了不少關係。賦改會招考三十位稅務稽核人員，要施以半年以上的訓練，公企教育中心成了最合適的訓練場所。大中先生本可與我在電話中決定的，却囑請賦改會的執行祕書孫乾方先生和另外兩位職員前來我的辦公室，特別轉述大中先生的意思，借用場地及人力等有關事項的處理辦法



右起：劉大中先生、Machlup 夫人、Machlup 劉夫人、筆者。

，絕對不要因爲他與我私人友誼的關係，打破現有的各種規定。大中先生處理行政事務的慎密周詳，以及謹守公私分明的原則，實在值得很多人做法。

爲求增進國內經濟學術的研究氣氛，大中先生曾經邀請不少國際間著名的學者來臺作專題演講，其中有幾次就在我主持的公企教育中心大禮堂內舉行。手邊檢出一張照片（見上頁），是民國五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半，Fritz Machlup教授演講完畢，Machlup夫婦與大中先生伉儷及筆者在公企中心大禮堂門前所拍攝。每逢演講會座無虛席時，大中先生總是滿面春風悄悄的跟我說：「又是個爆滿！」

大中先生待人表裏如一，禮數極爲周到。一次當他在臺渡假期滿返美之前，他邀約徐育珠教授陪伴，開車來到指南山麓的蝸居辭行，提着兩大聽咖啡，在大雨傾盆中衣履盡濕。雖然是將近二十年的友誼，依然一絲不苟，禮貌週全，中規中矩，正是儒行篇所描寫的形象。

前幾個月內子淑敏曾與大中先生令姊戚思女士，函件往返談論大中先生伉儷生前軼事，現在大中先生伉儷辭世瞬已週年，歷數前情，真是說不盡的哀思！

# 輓劉大中先生

鄭彥荼

經濟仰長才，夙著勛勞匡黨國；  
民生猶浩劫，尚遺志業復山河。

## TA-CHUNG LIU, 1914-1975

Ta-Chung was always a prodigious worker. His enormous energy and productivity astounded all of us who knew him and was, we suspect, due in no small part to the great support and help which his wife, Ya-Chao, gave him throughout his career. Although Ta-Chung first studied engineering in China, and la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Cornell University, it was as a student at Cornell, that he encountered Professor Fritz Machlup whose influence, Ta-Chung once said, was responsible for his conversion to economics. Ta-Chung mastered his chosen field with extraordinary rapidity, and received his Ph. D. in Economics from Cornell in 1940. Much of his dissertation was later published b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 1946, and dealt with China's national income from 1931-1936. It was, as far as we know, the first attempt to construct national accounts for China. Concern with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China and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accounts for that country were themes which were to occupy him throughout his professional career. In 1959, he reported preliminary estimates of the national income of China from 1952-59, and these were later amplified and incorporated together with his earlier work, in his massive study with K. C. Yeh,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59*, published by Princeton in 1965.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concern with the basic data resulted in many other publications and statements before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67 and 1972. Few econometricians of his stature and high level of technical competence, have been as concerned as Ta-Chung was



with the basic data which are the raw material of econometric models, and to which he was often to apply the most sophisticated of econometric methods.

As econometric modeling spread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other developed market economies, to those of developing and socialist nations, it is clear that we know very little about the economy of China. Eventually, we can expect to have input-output and macro-econometric models for China that are the equal of those now being prepared for the USSR and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and it is certain that researchers who achieve success in this endeavor will build significantly on the deep work already done by Ta-Chung.

Although much of Ta-Chung's later work dealt with econometric models and methods, he had more general interests in 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and in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ffairs. He not only wrote several important scholarly papers in these areas, but also had considerable practical experie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ssistant Commercial Counselor in the Chinese Embassy and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to Bretton Woods, and he was, for ten years, an economis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 Washington, D. C., before taking a professorship at Cornell.

Beginning in 1954, Ta-Chung began a series of visits to Taiwan, which were to prove of the greates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at economy and which culminated in his Chairmanship of the Commission on Tax Reform (1968-70) and the award of the Order of Bright Star with Grand Cordon, Second Class,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His

first trip in 1954 was with Tsiang to study the problems of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s a result of their advice, Taiwan abolished an extremely complicated system of multiexchange rates and effectively adopted a floating rate. The expansion of Taiwan's exports and the accelerated growth of the economy were due in no small part to this reform.

In 1964, Ta-Chung once again journeyed to Taiwan, this time to assist in economic planning. As a good econometrician, he was quick to point out that sound policy must be based on an accurate aggregate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economy, and, typically, when he found the basic data were not sufficient or reliable enough for this purpose, he set to work to improve them and to construct for important variables series which had not existed heretofore. In the course of his work he not only built an econometric model for Taiwan, but he developed an inter-industry input-output table for the economy and improved the national income statistics.

Beginning in 1968, as Chairman of the Commission on Tax Reform, Ta-Chung took a more active role i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He was able to check widespread tax evasion through a series of reforms which also reduced the burden of low income taxpayers and increased the progressivity of the tax structure. Other reforms also encouraged more investment in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bstitution of a value-added tax for the previous haphazard system of specific commodity taxes.

Finally, in 1974, he led a team of experts which made a number of proposals for

establishing a free money market and for letting the exchange rate float to find its equilibrium level. Few econometricians have been so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or so influential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ny country.

Beginning quite early in his career, perhaps stemming from his interes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ncome accounts, Ta-Chung worked on a series of models of the U. S. economy and successively refined these models to apply to shorter and shorter time periods. In these efforts he was concerned, as alway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data, and he published estimates of national product components by month as early as 1951. His first annual model of the U. S. economy was published in 1955, and in 1963 he published an exploratory quarterly econometric model for the U.S. post-war economy. By 1969 he had published his first monthly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1974 a more refined and elaborate version of his monthly model was published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He was able to construct not only a national monthly model but one for New York State as well! His national model and data were entered in the calculations of the Seminar on Comparisons of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ame out very well in the final tabulations. In particular, Ta-Chung's monthly simulations compared favorably with those from the best of the quarterly models and looked especially promising when averaged into quarterly values.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could yet be achieved in the use of monthly models constructed along the lines pioneered by Ta-Chung.

Besides his concern with macro-econometric models, we should not fail to mention Ta-Chung's important book, with George Hildebrand, on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cross-section data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is study led to a great deal of debate and depe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s of estimating economic relations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

Ta-Chung's interests in econometrics extended well beyond the problems of model construction into the more esoteric realms of methodology. But, as always, he drew inspiration from practical problems, and his papers on underidentification, structural estimation and forecasting, the effects of aggregation over time, and testing for identifiability, concern problems which he encountered in his more practical work.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problem, he noted, quite correctly, that, in the spirit of the true Walrasian system, everything depends on everything else; therefore, the *a priori* constraints in the form of nil effects attributed to several variables in each individual equation of a complete model are, at best, suspect. These *a priori* zero restrictions are the principal means by which we identify our equations in econometric systems. If we reject these dubious restrictions, the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is basically underidentified and the best that we can hope for is to estimate reduced form equations. These ideas set forth by Ta-Chung led Franklin Fisher to generalize the concept of identification to encompass "near identification," where coefficients may not be zero but have only small effects on other variables in a given relationship.

Ta-Chung's career, cut short by his untimely death, was a remarkable one which blended an interest in basic data and sophisticated econometric theory with the practical concerns

劉大中先生伉儷追思錄

一〇六

of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and econometric modeling and, above all, with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He was, and is, an inspiration to all of us who knew him and his work.

L. R. KLEI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 NERLOV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 C. TSIANG

Cornell University

# 遙想公瑾當年

劉大中遺作

——閒話歷史、詩詞、小說和國劇中的周瑜

我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數千年來多采多姿的人物，不可勝數。三國時代的周瑜，雖然享有盛名，但恐怕還不能算是真正第一流的人物。在政治和武功上，周郎並未能輔佐孫權統一中國；在文詞和學術方面，他似乎沒有重要的創作遺留下來。但是周瑜有一個極突出的特點，在我國歷史上，竟沒有一個人能與他比。

周瑜這個特點，與我們的國劇有關。國劇在近百年高度發展的過程中，滋生了許多專行角色，「翎子小生」也是重要的一種。（其他的如「開口跳」、「架子花」等。）周瑜是「翎子小生」最典型的人物，恐怕無人能予否認。歷史上比周瑜更重要的人，似乎沒有一位能在國劇中取得類似的光榮。以諸葛丞相為例，他在歷史上可能比周瑜重要（主要是因為諸葛比周活得長些），但國劇中，卻沒有「羽扇老生」這麼一個專行。

筆者幼時不喜讀書，大學畢業後，才稍肯研讀，但所學的又不幸是庸俗的實用之學，對於歷史和詩詞的知識淺陋，本無資格寫歷史和詩詞上的周瑜。但我自小酷愛國劇，對於國劇中的周瑜稍有一些認識。近月來病眼，割治後醫生不許看書，甚至不許用腦思索，在家靜養却煩悶不堪。從同事好友梁達、沈申甫、蔣碩傑三兄處，借到幾本以前看過有關周瑜的書籍，請內子亞昭擇要念給我聽，並且每天寫幾個關於周瑜的斗大的字（小字醫生不許寫），兩月來湊成這一篇拙文，就正讀者。

## 一、我國正史中的周瑜

劉大中先生伉儷追思錄

我國有關一朝的正史，例由下一朝的史臣去寫。周公瑾活躍一時的三國時代的歷史，是晉朝著作郎陳壽所寫的三國志。晉雖是篡魏而立，但究竟是自魏演化而來，所以陳壽的三國志重魏而輕蜀吳；稱曹操爲曹公，對劉備和孫權則直呼其名。三國志中的「魏書」詳、而「蜀書」和「吳書」簡。雖是如此，但從三國志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中，仍能看得出一位文武兼資、孤忠奮鬥、倜儻不凡的周郎來。

我國正史上的周瑜是怎麼一個人物呢？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下列特色。

周瑜的從祖和從父中，有兩位官至主管兵權的太尉，有一位作到太守。他的父親作過洛陽縣令。周瑜是一個文武傳家的世家子弟。

周瑜彬彬有禮，涵養極深。與曹操赤壁鏖兵時，周瑜是正帥，比他年高資深的東吳大將程普是副帥。程普不服他，但周瑜對程仍是尊敬退讓。程普在看他調兵遣將後，終於心服。程普對人說：「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周瑜的風度，是這樣的可愛。周瑜最大的成就，是他的「莊敬自強」，遇到人數衆多的敵人，絲毫不懼。曹操滅了劉表以後，率領號稱八十餘萬的大軍（實際不會到此數），指向東吳。那時東吳文臣多半主降，武將多半主戰，而對孫權真正有影響力的周瑜說，他只需五萬人，就可以破曹。這是多壯大的膽識，多堅強鎮定的意志。赤壁之戰，曹操大敗，周瑜和魯肅的功勞最大。那時劉備新敗，往投劉表之子劉琦。劉琦是個庸碌之才，劉琦、劉備不過有潰兵萬餘人，他們對赤壁之戰，貢獻很小。三國演義和國劇力捧孔明，說他借了東風，燒了曹兵，真是荒謬絕倫。關於火燒戰船一事，陳壽的三國志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並未提到孔明一字，更不用說「借東風」了。

赤壁之戰，發生在冬天，風向西北，何來東風？筆者也曾問過康乃爾大學「熟知天文地理」的同事。他們說，冬日雖多西北風，但氣壓氣流變幻無常；冬天也會起東風。周瑜精於水戰，必熟悉江東

氣候，知道到冬天必間有東風。事前準備妥當，東風一起，立即火攻，與孔明何干？這一次曹操的經驗不夠，並且太大意了。

周瑜雖是資兼文武，但他既非書呆子，也非一介武夫。他還深通音樂。音樂家演奏時，稍有錯誤，他就用目示意。有些人以爲「顧曲周郎」是指周郎喜聽音樂，解「顧」字爲「到」（去聽音樂）或「照顧」之意；其實這個「顧」字，是指音樂家演奏有錯時，遭周郎的白眼而言。

周郎美丰姿，與孫策分娶江東美女大喬、小喬。周瑜是一個幸運英雄，可惜他三十六歲就去世了，不然的話，三國時代的歷史，可能要重寫。

## 二、詩詞中的周瑜

筆者不學，未見周公瑾有重要的文字詩詞遺留下來。後人對周郎的詞頌太多了，但以蘇東坡的「赤壁懷古」（念奴嬌）爲最好。原詞很短，不妨全錄下來：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

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這首詞和杜甫追念孔明的詩，真是「一時瑜亮」，同歸不朽。但是蘇老先生酒飲多了，這首詞中的地理和歷史，都是問題，却絕不影響這首詞的文學價值。蘇東坡所遊的赤壁在黃州；周瑜破曹的赤壁在湖北嘉魚縣。蘇東坡說，周郎大破曹兵是「小喬初嫁了」之時，好像周公瑾在度蜜月時，就把曹操打敗了。其實周瑜和小喬結婚在建安三年，那時周瑜廿四歲，赤壁之戰是十年以後的事了。這些地理歷史問題，我想博學如蘇老先生，不會不知道。不過詩人有隨意發揮的特權，若不稍加點綴，何能



流傳千古？

蘇詞中又說，周郎穿着「羽扇綸巾」，戲迷朋友覺得蘇老先生把周瑜寫成諸葛亮了。（空城計孔明上場引子中有「羽扇綸巾」詞句，這可能也是國劇把諸葛亮幾乎扮成牛鼻子老道的原因。）其實「羽扇綸巾」不過是指家常便服而言。蘇東坡說周郎穿着便服在「談笑間」就把曹操打敗了，這又是大詩人偏愛周瑜。當時周瑜攻取曹操極不容易，周郎晝夜籌劃都來不及，不失眠就不容易了，「談笑間」破曹是辦不到的。這些都不相干。重要的是，蘇東坡才大眼高，獨對周郎傾倒不已，周瑜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其他關於周郎的詩詞似乎反都是畫蛇添足，大可不必提了。

### 三、小說中的周瑜

羅貫中所寫的三國演義，是一部「翻案」小說。陳壽的「正史」以魏爲正統；三國演義則以蜀漢爲正統。劉、關、張、諸葛，以及趙雲、馬超、黃忠都成了活神仙。這部小說對於魏吳都不够客氣，對於周瑜雖也還恭維，但在很多的地方，把周瑜寫成了一個喜怒哀樂全操在孔明之手的人物。按三國演義的說法（可能根據前人的筆記），周瑜下決心抵抗曹操，竟是因為孔明告訴他曹操要搶他的夫人小喬。周瑜去攻曹操，就非孔明草船借箭和借東風不可。最後諸葛亮還把周瑜活活氣死。

三國演義對周瑜的描寫，只不過是「姿資風流，儀容秀麗」（第十五回），雖然對周瑜在東吳的重要性有相當的敘述（如第二十九回及四十五回），但實在過於簡略，不盡不實。實際上，三國局面的造成，周瑜是最具決定性的人物。若是沒有周瑜的堅主破敵，孫權和劉備都可能被曹操解決。

三國演義雖然對周瑜不公平，但是這本書的淺近文言，非常流利，對於許多個性不同人物的描寫，十分生動，確是一部傑作。回想我小時也讀過不少文言書，上過不少國文課，但是今天還勉強能寫

淺近的文言，恐怕還是小時候多次讀三國演義的結果，不能不對這本小說有甚高的敬意。

#### 四、國劇中的周瑜

國劇中關於周瑜的戲，不多也不少。做主角的如「羣英會」，做配角的如「回荊州」，做半主半配的如「黃鶴樓」。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羣英會。

羣英會把周瑜捧成「翎子小生」的典型，同時也把三國演義的周公瑾變本加厲的搬了過來。這齣戲的內容是按三國演義寫的；甚至於有許多段道白是把三國演義的文言一字不易的用了上去（這些文言應改成白話或刪去）。這可把演周瑜的人難壞了。若按「雅量高致」的周瑜性格去演羣英會，則與劇情戲詞都格格不入；若全按劇情戲詞中的周瑜去演，則實在對不起周公瑾這樣一位相當偉大的歷史人物。惟一的解決辦法，還是須要「折中」。羣英會算得上是齣好戲。戲是藝術，不一定要完全合乎歷史；但是扮周瑜的演員，一定要曉得周瑜是怎樣的一個人，不可把他演得太偏激急躁，必須要維持他儒雅英斷、彬彬有禮的風格。

聽說清朝末年的徐小香和程大老板（長庚）合演的羣英會，是一齣絕唱。我生也晚，不要說徐程，就是譚鑫培也未趕上。我所看過羣英會最好的一次，是約在民國十四、五年的一次堂會戲（地點好像是在故都聚賢堂）。程繼仙的周瑜，余叔岩的魯肅，蕭長華的蔣幹，侯喜瑞的黃蓋，裘桂仙（盛戎之父）的曹操，鮑吉祥的孔明，自蔣幹過江至打蓋為止（據我的記憶，余叔岩從未唱過妖道式的孔明的借東風）。像那樣搭配齊全的羣英會，我以後就未看過。程繼仙的羣英會，我看的次數不少，但是同時由余叔岩飾魯肅，和蕭長華飾蔣幹的搭配，我祇記得看過這一次。民國十年後的數年中，楊小樓、余叔岩和荀慧生、侯喜瑞在北平新明戲院，和梅蘭芳、王鳳卿、尚和玉、郝壽臣在開明戲院，每週

週末唱對臺戲。楊余班中的丑角是王長林；蕭長華是在開明梅蘭芳班中。所以余和蕭在普通營業戲中不容易湊到一處。王長林是文武全才，只是飾方巾丑却要讓蕭一步。

我看程繼仙（長庚之孫）戲的時候，程大約已五十左右了。民國初期的中年人，似乎顯得很老。那時程繼仙已是牙黃、嗓啞、背駝的老者，但他所飾周瑜的清雅瀟灑，「帶戲」而不「火」，不急躁而不「溫」，確實是高明。故都的堂會，臺下向來是亂糟糟的開席喝酒。程繼仙和余叔岩的嗓子都不好，羣英會一上場，臺下就鴉雀無聲了。程余的對白、神情和身段，真能使人如醉如癡。程所扮的周瑜，不是一個心胸狹窄、暴躁的人，而是一個才華外露、少年得意的英雄（其實周瑜比孔明年長）。余叔岩的魯肅是一位忠厚長者而不是一個傻子。場面上掌鼓的是杭子和，操琴的是李鳳卿。這種戲以後不用想再看了。程的武功很好，到我看他戲的時候，像探莊、伐子都一類的武小生的戲，他已不演，我沒有趕上。但我在新明看過一次程與楊小樓的鎮澶州（程與余叔岩也演過，但此戲余絕不及楊），靠把身段確是漂亮利落穩重。周瑜雖非武小生（梅派的周瑜升天，亂跳亂打，不能算是國劇），但不能演武戲的小生，是絕對演唱不好的，因為周瑜一出場就必須又要英武又有書卷氣。

與程繼仙大約同時或稍晚的小生，如朱素雲、姜妙香（青衣出身，改小生後，多年不敢唱羣英會，只能與梅蘭芳配寶玉一類的戲而已）、金仲仁、王又荃，或更年輕的高維廉等，都演過羣英會，但是一言以蔽之：「全不行。」不是過「火」，就是過「溫」，或是氣質不夠清雅。

程繼仙會用心教過一個內行學生，那就是富連成社長葉春善的兒子葉盛蘭。（在票友中，老友趙世輝曾從程繼仙學過羣英會，世輝兄現在紐約，有時也還演出。）我和葉盛蘭倒也有些緣份。我和他年紀差不多，我們第一次見面就是同臺演戲。大概是我在北平滙文中學讀初中的時候，學校舉行同樂晚會，我作提調，用的是富連成的班底。倒第三是葉盛章的時遷偷鷄，倒第二是我和亡友李寶甫的捉

放（我那時嗓子未全倒，有時還唱老生），末齣是名淨郝壽臣和葉盛蘭的忠孝全。以後我和他不時見面。但那時大班的好戲太多了，富連成的科班我不常看。後來葉拜程繼仙爲師，不久我就到美國讀書去了。

抗戰勝利後，民國卅五年冬，我自我國駐美大使館辭職回國。到上海轉船回北平，到清華大學教書。不想葉盛蘭也剛好在上海唱完戲回北平，和我同船。那時已十多年未見，彼此已是卅歲出頭的人了。因嚴冬冰凍，船到大沽口外不能進港。半夜船上失火，船既不能開動，救火的船也不能來。葉哭着對我說：「我的行頭都在這船上，這一次全都燒光了。」我笑着對他說：「你命都沒有了，還顧什麼行頭？」葉也不禁破涕爲笑。幸而後來火被救滅了，葉和我都能生還北平。

民國卅六年，我在清華教書時，還進城看了一次葉盛蘭的羣英會。葉的扮相極漂亮，武功極好，嗓子也不錯，就是臉上沒有戲（他小時臉上就沒有戲，而他師父最大的長處就是臉上有戲）。當他聽說孔明笑，他不能陸戰時，他混身發抖，盔頭上的絨球抖的發響，實在太「火」了。程繼仙當初演到此處時，也是表示生氣，但他從未抖得這樣厲害；一直要到打黃蓋，周瑜要拔劍殺孔明時，程才有限的發抖。一生氣就發抖，還算得什麼周大都督！從那次以後，我就再未與葉見面，算起來快三十年了。以後在美聽到葉盛蘭十年多前所灌羣英會的錄音，四句引子每句都有倒字，一開口四句搖板，又都每句都有倒字，現在許多人唱羣英會，都學葉的唱法，真是可嘆。

羣英會是一齣好戲，但是也有許多地方不妥當，必須修改。以下不過舉幾個例子。

周瑜出來報名後，自稱「水軍都督」，那麼攻曹操的陸軍歸誰指揮呢？資治通鑑說：周和程普分任「左右督」，並不是專管水軍。就是三國演義也說孫權命周作大都督，程普作副都督，魯肅作贊軍校尉（即參謀長，戲中稱魯爲「大夫」，也很費解）。其實周瑜隨孫策打出東吳半壁江山，陸戰遠多

於水戰，周瑜是水陸戰兼長的。

周瑜在戲詞中說孔明的「計畫機謀，在我之上」。頗爲自豪的周瑜，萬不會有這種想法或說法。戲詞中周瑜居然問魯肅：「北軍水軍何人掌管？」這是笑話。羣英會時，周瑜已佈陣江邊，靜候東風火攻，難道還不知曹軍的水軍是何人掌管？周郎英明，那能如此糊塗！

國劇的劇本，口傳筆抄，錯誤不少。周瑜和蔣幹飲酒時的唱詞，有兩句實在費解。周瑜在冷笑後唱「暴酒難逃三江口」；又一次冷笑後唱「順流而下東海瓢」。這兩句唱詞實是不知所云。這是在蔣幹說「白酒性暴，有些難飲」和「順流而下醉得快呀」，周瑜聽到冷笑後唱的。也許可以解爲蔣幹用暴酒比曹操的兵力，隱勸周瑜降曹，所以周瑜才冷笑。原唱詞或可改爲「北軍難逃三江口」，和「順流而下破奸曹」，表示周郎直接了當的挑穿和駁回蔣幹。這些修改，都還不够理想，但比原詞，似乎較爲合理。

這齣翎子小生戲講究的地方很多，此處不能全寫出來。譬如孔明不過是新敗的小同盟軍的軍師，周瑜對之應恭敬（周瑜對魯肅也應恭敬），但見面時大都督不能一躬到地。蔣幹是「同窗舊友」，周瑜接見時必須一躬到地，以客禮相見，否則自曹營中來的人，就該殺頭了。多數演員在周瑜初見孔明明和蔣幹時，都是用翎子小生特有的一躬到地的身段，這是不妥當的。

## 五、結語

正史上的周瑜，和國劇中的周瑜，恐怕是很難完全「協調」的了；但是似乎也沒有完全協調的必要。戲劇是藝術，藝術可能總須有若干幻想和渲染；但是歷史劇中的渲染，總還須要有些限度。以羣英會爲例，扮演周瑜，總還是要「不火不溫」。然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尤其是看過好戲，而

自己所受的訓練不可能太高的票友，一定是「眼高手底」，不會太好的。如果不能做到「不火不濫」，還不如稍微偏「火」一點，使演出較有精神。但切不可把周瑜演成混身發抖、瞪眼吹氣的石秀，那就太對不住一代英傑的周公瑾了。

（六十三年四月病中寫於美國綺色佳城望湖樓）